

# 目 录

## 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 一、厄内斯特·杰尔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3
- 二、对斯大林迷信的终结……………15  
——詹姆斯·坎农 1956 年 3 月 9 日在洛杉矶“星期五夜讲坛”上的演说
- 三、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29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956 年 4 月通过的决议
- 四、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43  
——詹姆斯·坎农 1956 年 6 月 15 日在洛杉矶詹宁厅集会上的演说

## 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 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 五、厄内斯特·杰尔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  
次代表大会……………54
- 六、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  
二次代表大会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  
(1961 年 11 月)……………73
- 七、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77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1 年 12 月 5 日的决议
- 八、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建立纪念碑……………92

——《第四国际》(法文版) 1961 年 11 月号社論

- 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危机…………… 101
-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1 年 11 月的声明
- 十、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給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信 (1961 年 11 月)…………… 107
- 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 109
- 巴西《工人陣綫报》1961 年 11 月下半月号評論

###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新綱領及其他

- 十二、厄內斯特·杰尔曼：苏联共产党的新綱領…………… 118
- 十三、威廉·瓦尔德：从列宁到赫魯晓夫…………… 158
- 十四、湯姆·甘普：官僚們的藍本…………… 180
- 十五、湯姆·甘普：八十年代的共产主义…………… 184
- 十六、厄內斯特·杰尔曼：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間的苏联…………… 188
- 十七、厄內斯特·杰尔曼：苏联农业的新改革…………… 206
- 十八、厄內斯特·杰尔曼：赫魯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 225

# 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

——厄内斯特·杰尔曼

苏共二十大无疑会作为重要事件载入苏联和战后时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史册。每一个人现在都认识和理解这一点，但当然不会像我们第四国际那样理解得深刻，也不会是由于和我们相同的原因。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观察家毫不迟疑地作出结论说，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确“击毁了偶像”，而且甚至还要“在偶像的残骸上面跳舞”；它在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其他一些人谈到这次大会时说，“这十天的大会已经使斯大林主义发生动摇”，他们还强调指出它对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深远后果。

我们第四国际运动曾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估计，曾对上次大战爆发以后发生的客观形势的发展作了分析，我们在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我们对这次大会的“惊人的”性质并不感到惊异，同时我们是最能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意义的。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我们会不断地、可以说是天天都在注意苏联的发展，我们观察到的发展形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工作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证实，而且还有所扩展。

苏共二十大基本上是由目前苏联形势产生的国内政治性质的各种因素和考虑规定的。对二十大报告人和发言人论述的一些重要论题作了分析，就可证明上述看法的正确，这些论题是：批判斯

大林和“个人迷信”，“集体领导”，对群众作经济的和政治的让步，而且这一切都是从“回到列宁时代”这个新的基调来考虑的。

苏共二十大的确击毁了斯大林的偶像，斥责了他的极权统治。但它当然不是以真诚坦率的和政治的方式，而主要是官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的。它只让人可以看出，而有时也是明白地说出来，斯大林本人应对他的统治时期发生的党和国家的独断独行、伪造历史、对革命的反对派的罪恶行为等极端恶劣事件负责。此外，它还毁坏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典作家”的名声。

斯大林的最著名著作《联共(布)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他逝世以前一直被奉为圣书和斯大林主义者教堂的圣经，现在却被认为是“有缺点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列入禁书书单。这些书被胡乱地批判一通，批判时没有明确的观点，这种胡里胡涂的非政治的批判方式当然是彻头彻尾斯大林主义式的。在这样的一种谴责以后，人们就不好再问，还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有效的。

在苏共十九大和二十大之间斯大林所遭到的从最高的声誉一降而被人忘却和受人蔑视，而且是受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蔑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苏共二十大使最高负责人斯大林的形象在万恶的贝利亚的阴影后面突出。这次大会让他作替罪羊，要他对他统治时代党的生活和活动里的一系列严重恶劣事件的后果负责。而且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

斯大林被人从他的纪念像的基座上推下来以后，现在继对他的个人迷信之后来了一个“集体领导”迷信。但这次大会上和各国共产党报纸对大会发言人的歌颂具有另一意义。它一方面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一切尝试造成不利气候。另一方面，

它意味着官僚机构最高統治阶层内部民主的真正扩大。当赫魯晓夫看到有必要提一提“国际歌”的一句歌詞：“沒有救世主拯救我們”，这絕對不只是为了修詞而用的一句空話。他想借此表明，他不过是“忠誠地”扮演整个集体的工作报告人的角色，至多不过是整个集体的领导人的角色。

这次代表大会还提供另一些更重要的証明，証明“集体领导”的存在以及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民主的扩大。無論在政治方面或組織系統方面，这次大会的結果並沒有使某一派系单独获得胜利。曾經举行几次非公开的會議来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討論。目前看不出会有完整的綱領的趋势，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发表这些不同观点的人不会馬上就照正統的斯大林主义的方式受到整治。

赫魯晓夫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政治決議(更为明显)反映領導集团里占主导地位的中派主义的、妥协的傾向，反映官僚机构里存在的并且实际上已經表现出来的各种偏右和偏左的意见之間的中間路綫。这点我們在以后进一步分析时将詳細論述。主席团的組成人員不会变更，发表偏离观点的人不会因此就被逐出主席团。

赫魯晓夫曾对各种偏离的观点进行批評，揭露出在哪些問題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他曾提到“某些同志”，他們“对国家保安机关的同事表现出有点不信任”。他还批評“很多干部在某些明确的、党早已解决了的問題上制造分歧和混乱……在个别干部的发言里有着这样的一些表述錯誤，說我們目前还只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最后还有哪些人，“他們处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問題时陷入另一极端：这些干部把逐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論点理解为在现阶段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原則的号召。”“某些头脑发热的

人断言，社会主义建設似乎已經全部完成。”<sup>①</sup>“出現了一些沒有根据的建議，說什么有必要加速通过直接产品交换来代替苏維埃商业。”最后“还有这样的一些‘聪明人’，他們开始把輕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断言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是在苏联經濟最初发展阶段才是必要的……”

我們不应低估这些意见分歧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也不应假定这些意见分歧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是沒有一种共同邏輯互相連系起来的：这是这样一种傾向的邏輯，在苏联已經建成社会主义基础的前提下，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提出社会主义的經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說，社会主义在苏联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事实，尽管所有这些意见从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判断，是微不足道的，但同斯大林在世时代的做法比較起来，却是真正的革命。

**什么是这些变化的动力和前途呢？**随着官僚統治上层民主的扩大，已經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細小的派系，这种民主的扩大有两种发展可能：或者它会向党的基层和群众扩大，或者它会遭到野蛮的打击而停止，在一个短期的“民主”时期以后，一个派系和它的領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这个問題是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切問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問題。这个問題部分地已經由**向群众作出的或答应各种經濟和政治的让步的程度而获得解答**。这些让步表现出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的压力，表现出群众和官僚机构之間的力量对比以及这种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

---

<sup>①</sup> 在赫魯晓夫的科学里，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經“建設起来”，但这项建設尙未“完成”。这在他說来不只是詞义色彩問題。这样說是有根据的，因为他的“建設起来的”社会主义只是（建設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

关于消费品生产问题和工资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照“馬林科夫一米高揚”路綫的精神，而不是照“布尔加宁—卡岡諾維奇”的路綫作出决定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赫魯晓夫的中派主义的演說和大会最后決議在这两个問題上表明是有利于迅速增加消费品和提高低工资职工收入的一种妥协<sup>①</sup>。

工作日的縮短、退休待遇的改善、答应頒布新的劳动法以及改善工厂企业的伙食，这一切都是向同一方向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官僚机构看到有对待遇恶劣的工人阶层答应让步的必要，因为他们們现在正在对官僚机构施加极强大的压力。集体农庄农民一向都是人民中居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对他们們提出的各项措施也同样是这样趋势的表现。

在农业政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似乎也正在作出根本性的改变，采取和正統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原則上不同的政策。它想采取下列措施来巩固集体化，来給农业鋪平真正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它不但給集体农庄提供大量机器装备，而且还要迅速提高給集体农庄农民的报酬，給他們在集体經營上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主动性，提供給他們大量价格低廉、品种繁多和质量优良的商品。它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集体农庄农民自願放弃私有經濟的經營，全心全意为集体生产努力来保証集体生产的不断增长。

这次大会答应采取的一些社会和政治措施同样是很重要和具

---

<sup>①</sup> “今后在繼續保持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的同时，我們能够而且必須扩大消费品的生产。……现在，既然我們已經拥有全面发展的强大的重工业，我們就能够迅速地促进生产資料和消费品的生产。”——赫魯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9—50頁。

“共产党认为绝对必要的是，今后繼續保証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同时代表大会也认为，社会生产现在所达到的水平不仅使生产資料的生产能够迅速发展，而且使人民消费品的生产也能迅速发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決議》，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1頁。

有特色的：取消學費，普遍實施十年制義務教育，宣布制訂新刑法和進行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重點首要是尊重“蘇維埃國家法紀”。此外還多方強調（特別是在米高揚和伏羅希洛夫的講話里）通過蘇維埃和工會等等的民主化，讓群眾可以有效地參加經濟和國家管理工作的必要性。這一切表明，官僚機構感到不但必須作出經濟讓步，而且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同樣也要作出讓步。

當然，我們不應把這些聲明的實際意義看得太大，同樣我們也不要將在這個意義上所能實現的事情以及官方報告人和一些討論者在許多問題上顯出的分歧看得太重。總的來說，大會作出的許諾、措施和會上的分歧明白地證明這一根本事實：官僚機構在許多方面受到力求掙脫斯大林主義鎖鏈的蘇聯社會的壓力，它的領導階層在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的影響下開始發生分化。群眾的壓力、群眾的直接行動和官僚機構內部的派系鬥爭之間的相互影響將決定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還只處在這個發展的開端。如果認為這個發展必然是實踐進行的，必然會迅速導向蘇聯無產階級民主的恢復，在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必然會“回到列寧的時代”，把事情想像成這樣，那是錯誤的。這個過程必須達到這樣的階段，就是進而採取直接行動的群眾的政治積極性配合上更為尖銳的分化，在向前邁進的革命派和官僚機構里越來越孤立的熱月政變派之間發生真正的分裂，才能得到這樣的結果。政治革命的高峯將是官僚統治的崩潰和蘇維埃民主的恢復。

但是從今以後我們必須知道，這兩個過程是有相互作用的，而且內部和外部的客觀條件現在都很有利。保守的官僚機構方面會進行反擊，甚至會發生後退現象，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想要取消已經給群眾的或答應給群眾的一切，回到暴

力政治和正統的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方法，从现时在苏联以及国际范围的力量对比看来，如果不說是絕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說是极不可能的。

\* \* \*

我們強調指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是由国内政治性质的各种因素和考虑规定的。因此，进步的面貌目前只在苏联国内表现出来，而在“人民民主的”卫星国里要在将来才会表现出来。但是苏联的官僚机构不是由于真誠地想回到列宁主义的傳統而进行自我改革的，所以它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政策是另一种面貌，正是傳統的面貌：**利用国际工人运动来制止住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三大“革新”，“战争的可以避免性”、“和平共处”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三个論点是邏輯上互相联系着的。这些論点是用来論証各国共产党同欧洲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中“反美的”和“爱好和平的”一翼进行階級合作这个政策的正确。苏联官僚机构把群众的压力同它的外交的灵活性相結合，它希望借此来制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来保持**现状**，并在“和平”的气氛里来巩固“社会主义世界”已經取得的地位。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及其对国际工人运动发生的全部影响的理論，将运用到现在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帝国主义的最終崩潰将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世界”在和平竞赛<sup>①</sup>中巨大优越性的表现的結果，这个“社会主义世界”在清除可恨的斯大林主义

---

<sup>①</sup> “我們相信，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們迟早会上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赫魯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5頁。

的敗类以后,现在将会更自由和更全面地发展。

这次代表大会在分析資本主义现状时,断定資本主义不久就会爆发經濟危机,这样,上述論点就更有效力。在这样的一种发展前提之下,加上这次大会所假定的另一前提,即資本主义目前不可能在战争中找到出路,于是邏輯上就会有資本主义“自动瓦解”这样一种結果,用不着在国内和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更强大的斗争。

现在战争已經可以避免的論点,由于国际现实中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战争准备,天天成为疑問,因此这个論点是有条件地提出的,这样,后退的門永远是敞开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现在是存在的,并且“拥有强大打击力量的手段来束縛住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手脚”,但当然还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一旦侵略者胆敢尝试发动战争,就有充分准备来“給予侵略者以毁灭性的还击”。

苏联官僚机构力图完全在现状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共处”。它向帝国主义提供的交换条件只不过是放弃在資本主义国家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革命道路来夺取政权。这个建議是这样一种交易,拿“社会和平”来换取苏联官僚机构和帝国主义之間的国际和平。

这次大会上所說的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那些話,一点也不不是那末新鮮。这些話很像 1945 到 1947 年間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新民主主义”的代言人所发表的議論,再就是也很像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取得胜利以前和胜利以后初期发表的議論。此外,过去几年各国共产党的实践也沒有离开这条路綫很远,现在这条路綫經過这次大会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它已被提高成为“理論”。

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力量对比会使阶级斗争和內战的尖銳性减少,会使资产阶级的抵抗力量削弱,这是可以承认的。革命和革

命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特点，各国可以并不相同，这点同样是可以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曾一直强调指出这一点。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对真正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却避而不谈，米高扬比别的人在这一点上更为狼狽。

**同资产阶级合作能够取得政权吗？取得政权以后可以使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无须把它击毁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吗？**这些是构成列宁主义的国家革命学说的本质的真正问题。无产阶级同真正代表资产阶级（不是同作为例外的傀儡性质的资产阶级）的一翼联合而取得政权，历史上并无例子；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革命完全实现，历史上同样也没有例子。米高扬用来论证他的关于“新的道路”的观念和“对改良主义作斗争”而列举的例子，是要制造一种表象，仿佛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对报告人（赫鲁晓夫）的论点进行胆怯的批评。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作为“和平过渡”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例子，这是愚蠢的废话。

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某些国家，创造了非常的条件，迫使（在战时已经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和平地”放弃他们的地位。而且甚至在这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特殊的例子里）也需要开展议会外的武装工人运动。

各国共产党将毫不迟疑地把苏共二十大批准的这些“新的道路”解释为彻头彻尾是修正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在它的对待社会党人摩勒的政府和对待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的政策，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只有同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党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建成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领导的工人政府的前景，只有工人政府才能开**

始实现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綱領和倚靠統一战綫和工人委员会，现在人們不是采取这样的統一战綫的政策，而是热中于适应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級政策，而且甚至还要适应这样的资产阶級政策，在欧洲各国是由孟戴斯—弗朗斯所体现的资产阶級路綫，在印度那样的一些国家里是由尼赫魯派所体现的资产阶級路綫。

这样的政策当然絕對不能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实现。尽管有如此有利的客观条件，它只会使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和后退。甚至遭到挫折。但是，这个政策一定要被群众所唾弃，群众要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现实迫使他們走的唯一道路：通过革命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

\* \* \*

第四国际对待苏共二十大的各項事件的态度，不是从主观考虑作出的，而是从这些事件对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客观上有什么意义来作出的。不管苏联官僚机构领导是否恢复托洛茨基派人士的名譽，不管它是否繼續把他們同“资产阶級民族主义者及其他力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們”同等看待，这既不能影响我們的判断，也不能使我們放弃我們的原則。我們知道，苏联官僚机构已經感到必須恢复大批革命人士中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譽，重新审查革命历史、苏共历史和第三国际历史中的伪造事件。它是在群众的极强大的压力之下，是在它自己的行列里对这个压力最为敏感的那些派系的压力之下才做这些事的；而且它是以折衷主义的、間接的和不完全的方式来做的，并不是十分重視这项工作，也决不会发表坦率的声明。

现在还不能說，这些势必要做的恢复名譽的工作将按照怎样的次序和在多大的范围里来进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苏联官僚机构力图維護的最后壁垒，就是那条它为反对托洛茨基和他所奠

**立的第四国际运动而筑起来的壁垒。**因为忠实地恢复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运动的名誉，就会是承认他的路线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维护真正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忠实地恢复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名誉，就等于是承认我们不但有权利批评苏联斯大林主义者的堕落，批评他们毁坏国家、党和工会里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批评他们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就已出现的经济政策的反反复复和错误，而且还等于承认我们有权利发表我们的观点，指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遵循这个理论的第三国际的全部政策的反动性质。恢复托洛茨基派的名誉事实上等于是真正地 and 完全地回到列宁时代，但是，不消灭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始终还存在着官僚制度，不消灭官僚制度的特权，不重新建立由工人来监督和领导生产的制度，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这点是无从设想的。

因此，第四国际虽然是不带宗派主义偏见地来欢呼苏共二十大发生的事件，但它却并无幻想。它知道，为真正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第四国际已经证明，它并不缺乏顽强持久的战斗精神。

我们满意地注视决心要击毁斯大林主义专制制度的锁链的苏联群众革命高涨的初步成果。我们了解这些最终会击败斯大林主义的事件的深远意义。我们将加强我们的决心，并以更大的注意力研究我们预见到的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发展和重整队伍的工作。但我们不会冒失地把序曲里出现的歌剧的曲调当作歌剧本身，这个歌剧只会在将来演出，而且是在不同于官僚制度的另一个指挥下演出。已经可以看到的和具有重大分量的事，就是我们的方向受到越来越多的革命人士承认为工人运动中合法正确的方向。对于今后的一切，我们对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具有信心，这些胜利将会帮助他们认识托洛

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綱領是他們的意願、他們的目的、他們的战术和战略的表现。

从今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将出现新的更紧要的和更自由的气候,在这种新的气候里,尽管必然会有使斯大林主义“复活”的中派主义的混乱进行干扰,第四国际的思想会比较容易地打开前进的道路而取得胜利。

(译自《第四国际》德文版 1956 年 5—6 月号)

## 二、对斯大林迷信的終結

——詹姆斯·坎农 1956 年 3 月 9 日在  
洛杉磯“星期五夜讲坛”上的演說

三年前，杀人魔王、革命的叛逆、謀杀革命者的凶手、“人类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不幸寿終正寢。两周前，斯大林亲手挑选出来的继承人、他的猙獰暴政的受惠者和他的同謀犯，利用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时机，譴責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宣布斯大林二十年的专制統治是錯誤的。

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东西，就其本身來說，是真实的。这是三十多年来出自莫斯科的第一次由官方发表的真相。真理是迟迟才显示出来的。馬克·吐溫說过：謊言传千里，真理才出門。但是，謊言易破，真理是持久的；它終究会超越謊言。甚至在莫斯科，真理也已重新日趋彰彰。

根据新聞报导，在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們正式宣告唾弃和埋葬对斯大林的迷信之后，他們唱“国际歌”来結束代表大会。但是我想，他們在歌唱时一定是吐詞含混的，因为歌詞中說：莫不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是新社会的主人。代表大会主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說，曾一度是“新社会的主人”的斯大林从此以后是一錢不值了。“国际歌”所預言的，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被倒轉过来。对斯大林的迷信正好挡道，于是就被輾压过去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死去了，絕不会还魂了。

美联社駐莫斯科的一位記者报导說，他問了一位大会代表，现

在該怎样处理那些立在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各地的斯大林的石膏塑像。那位代表回答說：“塑像可以立在那里。”但是他錯了。这些塑像是站不久的，只要誰要是想出一个苏联迫切需要的筑路計劃，然后再看看所有那些毫无道理地到处立着的石膏像，他就会說，这些石膏像應該放到压石机里，輾成混凝土材料。这就是斯大林塑像終将得到的下場。

甚至还有謠傳說，列宁通过一个精灵的媒介給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你們知道斯大林一死，他的后继者由于一时的冲动就錯誤地把他葬在紅場正是列宁的身旁。謠傳說，列宁請求代表大会将他移出那里；他說，因为“我不願意同斯大林躺在同一陵墓里”。

在莎士比亚写下列詩句时，他必然是預见到了今天：

就在昨天，凱撒的一句話，

可以反抗全世界；现在他躺在那儿，

沒有一个可怜虫会向他致敬。

甚至連可怜的美国的斯大林分子，也不再向斯大林致敬，而他們已經是差不多可怜到无以复加了。我注意到了《工人日报》上一篇关于美国的斯大林分子的头子和主席威廉·福斯特七十五岁寿辰的文章。不久以前，福斯特出版了一本題为《从布賴恩到斯大林》的自传，当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事情。在《工人日报》关于福斯特的成就的文章里，这本书並沒有被收入他的著作之列。

这篇文章說，福斯特站在反对洛夫斯东的“斗争的前列”，也站在反对白劳德的斗争的前列。文章就談到这里为止，沒有說福斯特同白劳德、洛夫斯东携手站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前列，也沒有說他是迷信斯大林主义的促进者。相反，文章却說：“福斯特同志一直为党内的集体领导而斗争。”这句话确实可笑，而且也一定是在印出了校样和得到了从莫斯科代表大会发回来的报告之后才加

进去的。沒有提斯大林，也沒有提福斯特对斯大林的效劳。

对斯大林的迷信，肯定已經一去不复返，对此毫无疑問。甚至連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紀念日，苏联报刊也都置之不理。《紐約时报》駐莫斯科記者那天报导：“苏联的报刊、电台和大多数人民，今天对斯大林逝世三周年都沒有作任何評論……好像只有外国人知道今天是三周年紀念日。在同一个会讲英文的苏联公民談話时，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所得到的反应只是点点头而已。”

美国斯大林分子的报刊也忘記提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紀念日。緘默的毛毯也盖沒了中国。《紐約时报》刊載的 3 月 5 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說：“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对斯大林保持了謹慎的緘默。新华通訊社和北平电台对这个紀念日都沒有表示什么。”

我提及这些新聞报道，既不懊伤，也不憤怒。苏联代表大会的这一行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为他的继承人所唾弃总是个大消息，好消息——是三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的最大消息，最好消息。我們可以承认这点，而不夸大代表大会这一行动的意义，也不对这行动的目的自欺欺人。

### 在列宁的名义下

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或国际范围内的終結。远不是那样。会集在代表大会上的官僚們是这种可恶的制度的产物，特权分子的代表，他們想扔掉斯大林这个包袱和唾弃与斯大林的名字連結一起的可憎的迷信，而保持斯大林主义。但是唾弃迷信也許很可以是終止这种制度的开始。

斯大林的后继者对待斯大林的名字，同斯大林认为需要怎样来对待列宁的名字是多么的不同，这点是頗饒趣味的。斯大林这个騙子，表面上非常尊敬列宁的名字。他自称是列宁的最好的学

生。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反对列宁遗产的反革命的反动东西，但却假冒是列宁主义的延續。斯大林在列宁的名义下背叛了列宁綱領的真諦——国际革命。

所有这些騙人的对列宁的假尊敬都是必要的，因为列宁已成为伟大革命的化身活在俄国群众的心中，群众热爱他的名字。但是对待斯大林的名字，是多么的不同啊！会集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官僚們是斯大林的真正的继承人，他們是受到了斯大林的宠爱才得以有今天的地位的，现在他們都已感到羞耻，不敢表示尊敬他。他們觉得在这个暴君死后三年在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上唾弃他的名字是必要的，得策的。

他們这种行动，有着深刻的道理，而这一道理正是解这个謎的关键。我觉得现在是清楚的了，正如托洛茨基經常說的那样，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对特权官僚的迷信。对斯大林的迷信，从来沒有得到苏联工人群众的信仰。尽管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統治了这么多年，尽管伪造了这么多历史，作了这么多歪曲誑騙的宣传，怎么样压制言論自由，怎么样的恐怖，这么多的誣害和謀杀，用了这么大量的官方誹謗来埋葬被謀害的斯大林的敌手，尽管官方把斯大林奉若神明——尽管这一切，对斯大林的迷信还是从来沒有在苏联工人中站住脚。他們从来沒有相信对斯大林的迷信。

这一点，现在已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所默认。代表大会被迫唾弃斯大林的这一簡單事实，証明了苏联群众感情上的强烈激变，反对与斯大林的名字有連系的一切东西。群众反对斯大林的名字，反对紀念斯大林，这种感情的激变，乃是代表大会后面的群众压力。现在群众这种真实感情已有了“合法”的依据，这种压力将日益强大，并将产生比这个第一次的正式行动远为巨大的反响。

## 让步的邏輯

我們每天都看到這樣的證據，即最高法院在法律上取締美國公立學校中種族隔離的決定激勵了黑人全面地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因此，我們可以同樣地期待，莫斯科代表大會的行動將鼓勵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的工人不但要求許諾，而且要求落實。

毋庸置疑，長期遭受壓迫的蘇聯工人得到關於代表大會的報道時，似大喜臨門，充滿了希望。人們在工廠里歡呼喜躍，在強迫勞動營的街道上舞之蹈之。蘇聯數以百萬計的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犯，現正期待着他們長期苦痛的結束。無疑，蘇聯的群眾將會緊抓住代表大會發表的這些東西，作為他們的旗幟為結束在斯大林主義名義下的警察國家暴政的長期惡夢而鬥爭。

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被迷信的人死後來得如此之速的對迷信的唾棄，除非是在這個暴君死時發生了革命。不錯，對墨索里尼的迷信，是與他同日死去的，死於意大利革命游擊隊在廣場上倒懸這個法西斯巨魔的同一個絞環上。斯大林逃脫了他應遭到的墨索里尼的命運。斯大林不該這樣死，這樣使得對他的迷信未能同他本人一起埋葬，時間稍微耽延了。但是這個矛盾終於解決了，只經過短促的三年，對斯大林的迷信就繼他之死亡而消逝。

唾棄對墨索里尼的迷信是徹底的，無條件的，包括了他執政時與他的名字有連系的一切東西。這是可能的，因為墨索里尼是為他的敵人意大利的革命群眾所處決的，而革命是不會姑息的。而斯大林的朋友和繼承者對斯大林的迷信的唾棄，則是有限度的。目前他們只願意說斯大林生前二十年的政權是錯誤的，而不列舉斯大林主義在這長時期內的令人發指的罪行。

## 莫斯科审判

他們现在唾弃和否定的二十年，包括 1936—1937 年这一时期。他們所說的他的統治是錯誤的年代，正是老布尔什維克們——所有历史上最高貴、最英勇的一代——遭到斯大林誣陷和謀害的年代。他們的話还没有說得这么具体，但可以推論，他們把所有那些誣陷和謀害都否定了。他們甚至已經开始为一些在清洗中受害的人恢复名誉，具体提出了名字。

我看到一則电訊說，現在已經正式承认，在一次清洗中死去的匈牙利領袖孔·貝拉是被誣告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称頌他的文章，似乎什么也沒有发生过一样。现在还发现，清洗的另一受害者，乌克兰人科西耶尔，是在大清洗中被誣告和受到陷害的。1938 年被开除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在事情发生了十八年之后，现在也被宣布为是受誣害的。

党代会宣告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是虛假的，必須重写。这是目前否定斯大林主义最后二十年的决定的必然結果。但还有十年沒有得到解答——斯大林政权在反对托洛茨基捍卫列宁遗产的政治反革命中得到巩固的生死攸关的头十年。

他們在发誓要消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时，沒有具体指明并唾弃在这个迷信的名义下所犯下的具体罪行，沒有否定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全部理論和实践。对于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劳工运动中长久以来的駭人听闻的历史，他們还没有談到些什么。

### 他們为什么这么做？

这部历史包括 1926 年出卖中国革命和 1933 年出卖德国工

人，后者使希特勒得以胜利，并因此给德国工人阶级和欧洲人民带来了种种可怕的后果。他们一点也没有谈到1936年对西班牙革命的出卖和奉派到西班牙去的斯大林主义武装匪徒暗杀西班牙革命者的事情。他们还没有提到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斯大林—希特勒条约。

他们没有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同苏联结盟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所采取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我国无耻的斯大林分子投拜在帝国主义老爷门下，成为保证不罢工的主要鼓吹者和最积极的破坏罢工者。他们为斯大林效劳，对我们194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受控（这是第一宗根据“史密斯法”提出的起诉）而欢呼喝采，并且吁请工会不要资助我们诉讼所需的经费。

莫斯科党代会没有提起战后初期对欧洲革命的出卖。法国和意大利游击队原掌握着权力，但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使他们解除了武装。斯大林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使共产党的工作者们丧失了斗志。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帮助他们稳定政权，扼杀革命。

他们还没有否定斯大林主义在美国的另一典型表现。那就是共产党现行的如下政策：劝说工人们成为好的民主党人，加入民主党，同银行家、实业家和南方民主党人在一起，为了克里姆林宫那一伙人的外交利益而投民主党的票。

他们已经否定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还没有否定斯大林主义及其罪行。这有点像一个职业罪犯，承认在人行道上随地吐痰有罪，而希望因此可以逃脱谋杀案的审判。

莫斯科的官僚们已开了一个头，这不能否认，也不能忽视。他们供认了一些，但供认得还不够。他们已说了“A”，但说“B”时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可是在政治字母表中，“B”是接着“A”之后

的，我們可以深信，它在适当时候也会被說出来。倘若斯大林的繼承者們由于害怕說出“B”会否定他們本身而还不能說“B”的話，那么，对于斯大林政权下每一件事情的回忆都抱有强烈仇恨的工人們已逼使这些人供认了一部分，他們将为这些人說出“B”，并反对这些人。

莫斯科党代会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否定是在最高級官僚集团中呈现出的一个不祥之兆，它預示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政治革命。在那里，非有一个彻底的政治革命不能解决問題。必須否定和推翻的不单是斯大林个人，而是作为政治制度的斯大林主义；而这只能由苏联工人的革命来实现。

这个革命的目标是无条件地废弃引起一切罪行和背叛的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重申列宁—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綱領；在苏联推翻斯大林主义的警察国家，恢复苏維埃民主；废除特权階級；对誣告的审判和清洗全部予以重新审查，为受害者伸冤。这些，就是苏联政治革命的要求和綱領。

莫斯科党代会并不像僂子和叛徒所說的就是这样的革命，或是預兆着苏維埃民主的恢复；但它却是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的一个事件。莫斯科党代会上的言論真正要标志的是：苏联上层对于来自下层的强烈的革命冲动的一个犹豫、迟疑的反映；允諾对警察国家政权进行改革，口头上作些撫慰的姿态，以求阻止风暴的来临。莫斯科党代会想做的，只此而已。

但是这种姿态和改革的諾言所产生的結果，可能与党代会上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們預想达到的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一个由于新的客观情况的出现而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过时的独裁政府，可以因为作出并不足够的让步和采取无效的恐怖措施而加速自己的垮台。为求避免发生大规模反抗而答

应进行的改革，可以由于暴露了畏惧和软弱而激发反抗。苏联事态的新发展，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果。

党代会对斯大林迷信的否定，是由俄国内部情况而不是外部情况引起的。杜勒斯硬说是他的胡言乱语引起了莫斯科这个变动；全世界都嘲笑他这种说法。所谓否定对斯大林的迷信是在华盛顿帝国主义者逼迫下做出的，或说他们对这件事有什么兴趣，或说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他们还能逼使莫斯科集团和殖民地人民作出什么重大让步——这些说法，也的确足以使全世界感到可笑。世界上除了杜勒斯之外，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而杜勒斯也不相信它，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

### 一种潮流的四个迹象

不，党代会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否定，是由国内原因决定的。它是作为对苏联群众的一个让步，也许部分地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里具有民主思想的工人们和殖民地群众的让步，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政权下警察国家的恐怖具有反感。它最主要还是以一种对卫星国工人让步的姿态，希冀以改革的诺言来避免正在形成的风暴。

党代会采取的行动，并不是预示这个风暴的第一个迹象。据我看来，斯大林死后，在苏联群众中已出现了表明一种真正思潮的四个迹象，其中两个出现在上层，两个在下层。

第一个迹象来自上层，目的在于抢先防范群众。这就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一上台之后就许下的改革政权的诺言。他们在埋葬这位暴君之前，就许愿缓和斯大林主义恐怖。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宣布，指控犹太医生的巨大案件已真相大白，是个诬告，不能成立。

改革政权的第一批诺言的后果有二。它不但鼓励了苏联群众

和卫星国的工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也在我們队伍里助长了关于苏联官僚机构“自我改造”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并为在《美国社会主义者》上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主义表示投靠的一小撮可怜的叛徒的投降变节鋪平了道路。

苏联工人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自动进行自我改造的背叛性的說法欺騙。他們真实情緒的第二和第三个有力迹象来自下层。东德工人在1953年6月起米反抗。接着，由此引起了在1953年7月沃尔庫塔强迫劳动集中营的大规模罢工。无疑的，这些重大的行动，像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前的闪电，是由斯大林之死和他的继承者們关于改革的第一批諾言所引起的。东德工人的反抗和沃尔庫塔强迫劳动集中营囚徒的罢工，都是极为严重的革命行动，是未来的伟大事件的光輝前奏。

苏联群众中反斯大林主义情緒的第四个迹象，以及对这种情緒的承认，表现在现在上层在二十大所作的一系列新的諾言上。这些諾言，比原先在三年前提出的諾言要彻底得多，效果也会大得多。我們必須从正确角度来看待这些决定，把它們看做是在下层的行动和上层的姿态两者之間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又一事件，看做是加速苏联走向彻底政治革命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能的以至很有希望的因素。

### **資本主义能夠得到好处嗎？**

在苏联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将不会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复辟資本主义的梦想。相反的，这是一次反对資本主义的国际革命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是和这个革命相符合的。随着斯大林主义的消灭而来的是資本主义的毁灭。

斯大林主义是历史上从沒有过的对工人运动的巨大曲解。它

一直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資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是世界劳工运动革命的主要障碍。但是，现在斯大林主义的寿命不长了。它的产生和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經根本改变，并且还在按照同一方向改变着。俄国工人們——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新的事实——今天已不再像 30 年前那样是一些屈从于斯大林主义恐怖，被汪洋大海的农民所包围的和只有几百万人的軟弱、分散的群众了。

那时，他們的队伍在革命中、在长期的內战和紧接着的干涉战争中死了很多人，幸存的人也由于他們的超人的努力而精疲力尽了。他們当时曾經指望能够給他們提供帮助和支援的国际革命，已經全綫被打敗和击退了。世界資本主义經過第一次大战后的动乱，获得了一次新的稳定，年輕的苏联被資本主义列强孤立和包围起来。斯大林主义的可怕现象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中成长起来，成为适合于这些条件的民族改良主义。

用恐怖方法进行統治的斯大林主义，使市儈之徒和一知半解的观察家們感到很有力量。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在 20 年代之所以能够起家，是由于苏联的削弱了的地位和資本主义的包围，以及国际舞台上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失敗。斯大林主义是促使国际革命失敗的最重要因素。它是依靠这些失敗而繁荣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主义是革命低潮时期的反动思想。

那时有利于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的旧有条件，现在都已經改变。托洛茨基闡明的不断革命的规律，証明比斯大林的恐怖和叛逆更加有力。尽管有斯大林主义，但由于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孤立的、落后的农民俄国，已經变成世界上第二个大工业强国了。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和它的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但由于苏維埃制度扩展到东欧和中国，資本主义的包围已經被冲破了。

殖民地的革命到处在高涨。西欧的劳工运动已强有力地組織

起来,并且具有战斗性,仅仅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約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才沒有举行革命。今天只是因为該咀咒的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障碍,才使得欧洲工人沒有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受了斯大林主义欺騙和迷惑的伟大的革命工人群众,也正在改变,也正在要求一个不同的政策。

我順手拿起这份《紐約时报》星期日版。在第一頁上,有这么一則报导是关于意大利斯大林主义政党内部的革命发展的。标题是:“意大利赤党分裂集团抗議党的‘軟弱’路綫。”前头两段是这样写的:

“羅馬3月3日电:600名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但却是反叛的共产党人,戴着布制帽子和紅領巾作为标志,今晨在羅馬的大街上游行,叫嚷抗議反对他們党的領導。他們指斥該党領導愚鈍,缺乏勇气来領導意大利无产階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

“声称代表着一百万共产党人的600名游行,来自意大利各地,是参加自称为民主共产党人的會議的代表。这是一个旨在引导共产主义回到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运动。”这是紧接着俄国的好消息而来的意大利的好消息:

### 俄国工人和美国工人

当斯大林主义最初得势时,美国工人还是个烏合之众;除了人数不多的熟练工人阶层当中之外,甚至沒有工会組織。而现在,这些美国工人已經从一无所有之中站起来了。由于他們自己在30年代举行的半革命,他們已經組織了一个拥有一千七百万人的伟大的工会运动。他們正处在下一步进入政治觉悟和階級觉悟的前夕。

在工人階級和殖民地人民陣营当中发生了所有这些有利变化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正在日益深陷于无法逃脫的危

机之中，日益削弱。

整个世界局势的这种根本变化是下述二者的客观基础：首先，在口头上对斯大林迷信的正式否定，其次，在行动上对斯大林主义实行革命推翻。使这个程序实现的力量，是存在着的。

今天的苏联无产阶级，是一个拥有四千八百多万人的新兴的年青阶级。它的队伍，在斯大林主义最初兴起以来的三十年中扩大了十倍。它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的伟大成就之中壮大起来的，并且是具有自信心的。这四千八百万苏联工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考虑到他们的全部力量，在下一项日程上的伟大的事件中，他们也许是比美国工人阶级还要巨大的一支力量，因为他们为过去五十年间三次革命的回忆和传统所鼓舞着。

过去革命胜利的传统，增强了这个阶级的力量和潜力。经过长期的镇压和长期的恐怖之后，一旦他们重新开始行动，他们就会再次震撼世界，正像他们在1917年所做的那样。强大的苏联无产阶级作为国际舞台上—支独立力量的出现——这是现在已经清楚地预示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阶级关系的质变，使之有利于工人和殖民地人民。

正像在1917年一样，俄国工人会又一次鼓舞美国革命运动的再生。美国工人政治化将是第一个结果，继之将是在国际范围内增加提供社会主义胜利所需要的一切。再加上已经在成熟中的其它力量，这将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重新组织的开始。

我们面前的前景是激动人心的。这些前景并不是一个暗淡的、遥远的未来，而是就在我们现在生活和进行着斗争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因为我们伟大的同盟军。打破了斯大

林主义監獄、再次走上了国际革命行动的道路的俄国工人，伟大的中国和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在这里，在这三种力量中是不可战胜的“三角联盟”。它能够改变世界，統治世界，使世界确实获得自由、和平和社会主义。

成为世界革命发展一部分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的結束，标志着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开始。他的革命发展論，在一国接一国的世界事件中得到証实，而现在又一次在俄国得到証实。他所預见到的、向我们——他的弟子——說明的一切，正在生活当中被証明为真实的。我們，在他的旗帜下长期战斗的我們，今天再一次向他的光荣的名字致敬。我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确信我們是正确的。我們越发有理由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綱領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我們越发有理由对胜利充滿信心。

我們的胜利将不仅仅是一个派別或一个政党的胜利，因为派別和政党的斗争从来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托洛茨基主义的恢复名誉和它的胜利，同时将是——并充分表达了——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剝削者和斯大林主义叛徒、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重新組織的斗争的胜利。

### 三、 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和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956年4月通过的决议

在俄国革命继续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曾经在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在政治上遭受剥夺的以及尝过它的野蛮统治将近三十年的苏联群众显然又一次活跃起来了。他们已经迫使统治的官僚主义制度作出了深远的让步，可以预料将有更多的让步。巨大的国际上的反响仅仅开始。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正确性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当中的关键问题。斯大林主义这个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面临死亡前的痛苦。现在正在出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整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而大的可能性，从而解决曾使革命的无产阶级陷于瘫痪的“领导权危机”问题。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敲响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的丧钟的简短含意。

#### 东德和沃尔摩塔

在将斯大林的遗体供人瞻仰以后，这位独裁者的继承人企图以斯大林的名义，并以他们曾经出力树立起来的迷信的祭司长身分来进行统治。但这种情况已被证明是短暂的。为了争取巩固他们的摇摇欲坠的政权所需要的时间，他们感到不得不对群众作出实际的让步，而且答应给予更多的让步。这些让步中主要包括给

予工人較好的生活条件,放松清洗制度。但是,这些让步对由于曾經以流血和恐怖統治了苏联約三十年的險惡的独裁者的死去而已感到有了新的希望的群众來說,起了鼓舞的作用。

后果之一就是罢工运动遍及苏联的东欧地区,最終导致了1953年6月东德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暴动鼓舞了在克里姆林铁蹄下的其他地方的工人。集中营里到处发生騷动,这是很明显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沃尔庫塔发生的罢工,在那里二十五万名奴隶劳工放下了工具。东德的暴动和沃尔庫塔的罢工这两起事件使克里姆林胆战心惊。这两起事件反映了工人的情緒,以及統治阶层和苏联群众之間的鴻沟。

### 对工人的让步

結果是决定作出一个真正巨大的让步——至少是在斯大林本人的問題上。这个让步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成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外也作了其他一些让步——真正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答允縮短工作日,增加社会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結束非法的独裁統治,恢复被斯大林陷害的人的名誉。但是最大的让步是答允回到列宁的道路以及有意地毁坏人为地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偶像。这使得各种不可避免地会超越官僚主义制度控制的力量活跃起来,因为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宣判将成为群众大步前进、彻底在苏联清除被人憎恨的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旗帜。它使群众要求結束斯大林主义和回到列宁的道路成为合法。群众将会懂得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个重大的让步。因此,代表大会标志着在苏联开始了一个新的、深刻的革命阶段。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作出让步的直接原因是群众的明显的压力。这种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官僚主义阶层估計,简单地使

用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扫蕩性的清洗办法是不能鎮压住的，而屈从这种压力以冀避免为压力所击破倒是更为有利的。

苏联国内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是較为深刻的事物发展的后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是世界力量的对比不利于资本主义。軸心国的被击潰以及伴隨而来的計劃經濟的扩展到东欧，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迄今未能复原的一个打击。

虽然斯大林犯了罪行，但对德帝国主义仍然获得巨大的胜利这点，对于在规模上和技术上已經成长为世界上第二重要力量的苏联工人阶级起了鼓舞作用，使他們具备了新的自信心。美帝国主义未能把德国和日本重新建立为强大的軍事威胁这件事，使官僚机构失去了侵略的幽灵，而官僚机构数十年来曾使用这个幽灵来分散人們对它本身的注意力，求得人們对其独裁統治的抑郁的臣服。战后席卷殖民世界的革命和暴动的浪潮，首先是在中国出現的 1917 年以来最大的胜利，已开始促进苏联群众的革命情緒。斯大林之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情緒。中国人和北朝鮮人一起在制止美国軍事威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生动地表明了力量对比的轉变是多么剧烈。资本主义结构的客观削弱还在客观上削弱了苏联官僚机构，而这个官僚机构是在工人国家结构之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铁托的成功挑战已經暗示了这种情况。因此，正是当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看来达到其最高峰并拥有大片新的領土和統治着众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致命的内部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又一次从深处崛起的俄国革命已开始击破官僚主义的外壳。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魯晓夫这一伙并没有作出任何足以被解释为回复到列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让步。事实上，他們公开修正了列宁，宣称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通过純粹的議會道路取得。这些修

正表明，並沒有改变斯大林所遵循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外交的惯例来看，这种修正等于是通知西方国家：提出回到列宁的道路的口号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压力。这些修正主要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政治家们重新保证：所有外国共产党决不会恢复列宁的政策，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或者只是为了讲给群众听听。

### 新的背叛

同时，宣布这些修正旨在便于外国各共产党对列宁主义作出新的背叛。莫斯科把这种背叛看做是有助于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方法。正如在斯大林时代一样，克里姆林的所谓“和平共处”意思就是同帝国主义执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相互政策，或者是在镇压、颠覆和挫败工人和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方面相互支援。法国共产党目前执行的支持法国帝国主义政府反对进行叛乱的北非人的政策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并企图挫败工人阶级为取得独立的政治活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政策。

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企图把对斯大林的迷信的结束说成是由于国外的压力，那是虚假透顶的。帝国主义者在同斯大林打交道当中从来未曾有过什么伤脑筋的事。他们在适合自己的意图的时候甚至帮他建立迷信。同样，社会民主党人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迷信是同斯大林分子联合和合作的障碍。在过去三十年间，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之接受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更加证明了决定粉碎这种迷信是由于威胁官僚统治的内部压力。

这些压力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的，这一点为下列简单的事实所说明，即：官僚主义分子为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而答应做的正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这是他们所能作的最得人心的、也是设想最能抚慰冲击官僚主义制度的力量的允诺。回到列宁的道路意味着

保持計劃經濟，但要恢復列寧時代所存在的工人民主。因此，“回到列寧的道路！”這個口號是個群眾必然會以他們自己的革命社會主義內容來充實的無產階級的口號。

當然，這種事情不會是朝夕之間就發生的。工人也還沒有被組織起來。官僚機構在接近其末日時是會作垂死掙扎的。整個過程還將會有周折，甚至會有逆轉。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已經開始，而且最終將證明這一過程是不可抗拒的。

### “集體領導”

官僚機構的上層人物正在設法建立他們稱之為“集體領導”的堅固障籬。他們希望穩定自己享有的特權，以結束在斯大林的清洗制度下存在於他們隊伍中的不穩定和恐懼的心理。但是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集體主義”方面意見的差異是可以看得出來的。由於群眾的壓力採取更為直接和公開的形式，這些差異預料會加深，並且會在國外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分子中得到反映。正如歷史上所有其他類似的組織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官僚主義階層日益削弱的地位將表現為內部分歧的加劇，而在這些分歧中，可以預料到某些官僚主義分子將投身於工人的革命運動。這種分裂的重要性同蘇聯工人及共產黨隊伍中革命潮流的出現相比，當然是次要的。

官僚主義制度內部的分歧會在具體問題上爆發，包括那些涉及讓步應該讓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每一個新的讓步都將在官僚主義制度的上層人物中引起新的震動。

每一個新的揭示都是對他們參與斯大林罪行的新的控訴。這些罪行可追溯到 1923 年，如：粉碎左翼反對派，摧毀工人民主，屠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整個一代，謀殺千百萬的農民，建立奴隸勞

动营，在战争前夕杀掉红军的人，依赖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保卫苏联，使千百万的士兵无谓牺牲，破坏科学机构，劫掠苏联的收入，在工人阶级中一再进行血腥的清洗，将极权政权强加于卫星国家，破坏共产国际和谋杀国外工人阶级的领袖，接二连三地背叛革命，从背叛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开始，背叛本来可防止希特勒崛起的德国革命，本来可制止佛朗哥的西班牙革命，以及最后背叛了战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巨大革命变迁。赫鲁晓夫等一伙人是不甘愿承认他们在这些罪行中是有罪的。

### 他们能够走多远？

撇开作为整体的官僚主义制度的主观方面的问题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工人是能够迫使官僚主义分子承认许多事情的），让步不可能让到消灭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地步。如果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意味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那就是说，结束寄生阶级的统治，代之以通过复新的苏维埃、工会和工人政党来行使的真正的工人民主。首先，这意味着构成官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的特权的结束。在这方面，即在其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方面，苏联的官僚阶级类似统治阶级。基本的冲突在于有组织的官僚机构和设法推翻这个机构的工人阶级之间。

赫鲁晓夫这一伙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正在谴责斯大林的同时，也颂扬他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清洗。他们企图把斯大林统治的初期——即迷信已经建立，官僚主义阶层已巩固其统治的时期——说成是有道理的。而《真理报》已经开始谴责“腐败分子”，这是指这样一些工人和他们的发言人，他们要求超过官僚主义阶层所希望保持的狭窄范围来结束对斯大林的迷信。通过部分地把已故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这些罪行确

实是由于整个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产生的——交付裁决的做法，斯大林的继承人希望保持住他们协助斯大林建立的、目前他们正在领导的这个制度。这个目的就规定了他们将作出的让步的最终界限。

于是，在对斯大林的迷信问题上向群众作出让步的同时，官僚机构将会发现自己处在更糟的境地中。群众在欣慰愉快地接受了这种让步之后，将提出更多的要求。每一个新的让步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自信，并使在苏联爆发政治革命的决定性的火线更加接近。现在官僚机构如果企图回复到使用像在斯大林时代使用的野蛮镇压手段的话，这种企图能够促进行将到来的会推翻官僚机构统治的政治革命。因此，不论是让步或镇压，都不能长期地推迟苏联群众再一次建立一个代表他们意志的政府。官僚主义阶层面临无法逃避的矛盾。

### 托洛茨基得到申雪

官僚机构不打算恢复托洛茨基的名誉，也不打算允许苏联公众阅读他的著作。尽管他们这样打算，但托洛茨基保卫俄国的革命成果，反对斯大林主义蜕化的斗争，正在一点一点地得到辨明。所有那些看来已经载入历史的问题现在世界公众舆论重新在审查，好像这些问题都是活生生的新鲜事件一样。这就是当真理超越谎言的时候总要发生的情况。

一旦克里姆林开始承认在斯大林统治的后几年中确有诬控事件时，历史上的重新审查是不可避免的。在试图抚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约四千万人损失的苏联人民时，克里姆林已经被迫回复到不名誉的莫斯科陷害审讯的关键时期。承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红军将领以及约五千名的军官在一次陷害中被斯大林屠杀的

这件事，証实了托洛茨基当时所說的話。承认斯大林政策为苏联的国防而付出的吓人的代价，証实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主要指控之一。由于这些事实得到了承认，1937年杜威調查委员会关于列昂·托洛茨基和列昂·賽多夫同斯大林提出的指控无关和莫斯科审讯是陷害的裁决，就得到了新的效力。

在苏联，对托洛茨基的整套毀謗必須同目前正在被砸得粉碎的斯大林石膏像同归于尽。托洛茨基提出第一个五年計劃，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提出工业化，不顾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反对提出集体化，提出与农民結成友好联盟、重工业品和消费品生产平衡、在国外繼續实行推进世界革命的列宁政策，反对以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为掩飾，阻止世界革命的斯大林政策。这些主张的真相将开始在群众中传播。托洛茨基将作为参与列宁在1923年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并在被斯大林的斧子打下去以前一直忠于这个斗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英雄而出现。

这种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苏联工人对于斯大林的罪行是由于他秉性偏执狂妄所致的解释是不会满意的。官僚机构过去把苏联一切好事都归于斯大林非凡的品性，如今想使这种迷信轉到其反面，把一切官僚主义統治的坏事都归于斯大林凶暴的品性，那是不会成功的。从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怎么能够解释一个嗜杀成性的狂人会在苏联成为个人独裁者呢？这个问题现在在苏联应该水落石出了吧。馬克思主义要求分析一下使这样的现象成为可能的社会力量。托洛茨基主义已經提供了这种分析，正如托洛茨基主义目前正在提供結束对这个狂人的迷信的力量的馬克思主义分析一样。那些我們还不知名的苏联群众中的馬克思主义者肯定在进行自己独立的分析，指出俄国革命的蜕化是由于使斯大林当权的寄生阶级的形成。一旦他們的声音

为人所聞，这种声音就将証明是俄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声音，新生的俄国革命的領導人的声音。

自从斯大林篡权以来，由于計划經濟的力量，苏联得幸免于包圍着它的資本主义的压力。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由布尔什維克党建立起来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已被証明为比諸抱有巨大信心的苏联創始人所能梦想的形式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虽然存在着斯大林主义蜕化，管理不善，但計划經濟仍然使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大陆的征服者德国帝国主义的全部压力下取得了胜利。这个国家已經从孱弱的沙皇俄国变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唯一能够利用自身的資源来发展原子能的国家。新的所有制形式已証明比斯大林主义蜕化远为强大有力，因为斯大林分子他們虽然有着自己的意图，但被迫用軍事官僚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这种形式。

### 自觉的因素

这段漫长而痛苦的阶段现在正在結束，自觉的因素活跃起来了。这种因素可以在群众对官僚主义阶层施加的压力中看到。革命的自觉性正在苏联重新提出合法的統治。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革命的社会主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如在那时还没有这样发生的话）以一种像共产国际初期那样的群众政党的形式再次出现。社会主义觉悟的力量这一次将被証明在以优越的社会主义秩序取代資本主义的斗争中是决定性的。

对斯大林迷信的結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次伟大的胜利。不可能犯比抹煞和低估这次事件的重大意义更糟的錯誤了。公正的迪威委员会的裁决在消息灵通的公众輿論的心目中，污辱了斯大林；而就是这个不公正的官僚主义阶层的裁决在世界各国共产党

的队伍中間污辱了斯大林。这就为消除斯大林主义的障碍和把托洛茨基綱領帶給现在在思想上正摆脱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工人开辟了完全新的前景。

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每天层出不穷的新鮮事物証实了我們对苏联的整个立場。从历史观点来看，可以看到我們的运动自从托洛茨基第一次組織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左翼反对派的时候以来就在为这个伟大的轉折做准备。

相反，整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却处于一团混乱和狼狽不堪的境地。它的思想意識有什么不該修改的呢？它有什么書籍不該变成紙浆呢？甚至还有什麼小册子不該变成紙浆呢？所有的历史都得改写；只要他們还攻击托洛茨基主义，新的历史仍将值得怀疑。所有的決議和宣布的文件都必須撕毀，对于民众的全部教育必須承认滿是謊言和对真理的曲解。

斯大林主义圈子內的任何集团都不能逃脫这些毀灭性的后果。譬如說，抱有不同意见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还留下什麼呢？除了吹嘘一套对狂妄的劊子手的典范的忠誠之外毫无东西。

现在可以看出那些假装要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然而經常設法結束对清洗和陷害的贊同和虛假的供认的那些人是些什麼样的人了——他們是些无知的受騙者，要不然就是对一个现代恐怖的伊凡大帝暴虐罪行的自觉卫护者。

### 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胜利

那些断定托洛茨基主义已为历史所唾弃、而且认为未来的潮流属于斯大林主义的集团，现在由于每一个引起世界注意到托洛茨基是唯一一道出关于斯大林主义真相的力量这一事实的新的让步而狼狽不堪。对于这些集团來說，把背叛的政治归納为与最坏的

斯大林主义的亡命之徒竞相把官僚主义制度合理化，把在群众压力面前恢复名誉的最后的努力描绘为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而把官僚主义制度看成似乎是一种合理的自治力量的忽视苏联群众的想法，现在却成了最适合于支持赫鲁晓夫煽动家集团的思想。

結束对斯大林的迷信，在理論方面給予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中，有两点是突出的。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必然繼續的論点，现在已为它的創作人——斯大林亲手遴选出来的政治流氓所唾弃。他們被迫承认托洛茨基一开始就坚持的看法：斯大林不是列宁的繼承人而是他的反对者。那些也想把斯大林主义說成是列宁主义的繼續的资产階級理論家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若要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被貶黜，列宁的旗帜为什么又被举起，他們就必須說明两者之間的分歧。目前他們宁可对这个題目保持謹慎的緘默。

另一种遭到现在正在展开的俄国革命的新阶段的致命打击的理論是“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根据这种理論，計劃經濟在超过資本主义时就变成了史无前例的一种新型統治階級的經濟基地。这种新型的統治階級就是通过其对国家的控制剝削工人階級的“官僚主义的集体”。这种观点是对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論結構的修正。所以馬克思主义把全面和合理发展的計劃經濟作为未来的无階級社会的根本的和充分的經濟要素。

計劃經濟具有抵消那种有助于解决所有过去的階級組織的置乏現象的能力。苏联的經濟局限于一个国家，并在发展中受到一种寄生性的官僚主义階級組織的妨碍和曲解。这种階級基本上是不适合于計劃經濟的，并不像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理論所认为的那样是附属于計劃經濟的。这种階級具有寄生性而沒有剝削性。因此这种階級缺乏成为一个真正的統治階級的穩定性。

## 催眠术破产了

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由于计划经济显示了巨大的潜力并以一种新的空前的速度提高了工业水平，计划经济的发展将会破坏这个阶级，而不是加强这个阶级；它为推翻这个阶级创造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的条件。因此他预言，苏联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基本不稳定性现象。与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新理论相比，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现已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证实，因为苏联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中的第一次骚动打垮了三十年来一直把官僚主义阶层束在一起的中心思想。此外，官僚主义分子本身也被迫承认他们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地位，因而更加生动地证实了这个阶级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的不稳定性。

与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者和其他抱有类似观点的人的失败主义路线不同，托洛茨基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同样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证实。苏联工人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而获得的新的自信，国家所有制和计划性后来向东欧的扩展，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了今天作为推翻官僚主义制度和恢复工人的民主统治的先声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的摧毁。

整个斯大林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最深刻的思想危机的袭击。神圣的克里姆林的文件被扔进了垃圾堆。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正处在震惊之中。蒙蔽普通的斯大林分子耳目的催眠术破产了。现在他们被迫要去思考。他们开始提出严厉的问题。确实，他们中间许多人，特别是老一代的人意志消沉下去，掉队了。傲慢的死硬核心将像过去他们效劳于老的克里姆林的主子们那样继续为新的克里姆林的主子们效劳。但是斯大林的青年们将日益愿意和托洛

茨基分子进行討論，他們中間的优秀分子是能被爭取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这面来的。他們已經深感愧疚地抛弃那些他們过去像机器人一样学来对托洛茨基分子使用的渾名，諸如“希特勒特务”、“法西斯疯狗”、“一大堆鉄托式的渣滓”等等。造成自吹坚如磐石的斯大林主义机器中的深刻分歧的一切因素都存在。像法国和意大利——那里有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那里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分子在支持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在玩弄新花样——机会是特別有利的。

### 抓住机会

但是，要利用这些机会，就需要托洛茨基分子予以最大的注意。对这项工作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将是无益的宗派主义。我們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現在我們必須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必須用运动的方式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信条传给全体共产党员，我們的新聞界必須全力轉向这项任务，密切注視俄国革命新阶段中的发展，肯定使馬克思主义的解釋一直为全体共产党人所注意。这意味着，必須不渝地爭取他們，使他們注意我們丰富庫房中的小册子和书籍，这些书籍闡明了现在由于斯大林牺牲者名譽得到恢复而正在全世界报刊上和成百万人的意識中重新活跃起来的过去发生的事件。能够而且必須使全体共产党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真相；能够而且必須使他們懂得第四国际为保持列宁主义的傳說所作的頑强斗争的真相。

不能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个短期的提議，而必須看作是一个持續的主要是教育性质的努力。它的目的必須是要博得共产党员贊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綱領，而不抱有絲毫要改革一直腐敗了二十五年多的机器的幻想。确实有些人会一直唾弃斯大林主义的；但

是，这个机器中的大部分人——他們的双手沾滿了他們帮助斯大林踐出的鮮血——将迟早会像他們所侍奉的主子那样不光彩地、被人鄙視、被人憎恨地离开舞台。但是由于认为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党而参加它的全体党员将从他們的經歷中吸取痛苦的教訓，并将由于现在对斯大林的迷信的死去而成为可能的重整队伍中的主要干部。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所赢得的伟大胜利应该有助于鼓舞这整个运动蓬勃发展地跟上。猛烈地推倒斯大林的偶像并迫使斯大林的继承人作出让步的俄国革命已再一次証明了它的生命力。现在，我們必須証明我們自己有能力抓住在其他的国土上为革命社会主义所开辟的机会。这就是在苏联工人和斯大林主义制度算最后总賬时帮助他們的最好的办法。

## 四、赫魯曉夫所作的关于 斯大林的报告

——詹姆斯·坎农 1956 年 6 月 15 日在  
洛杉磯詹宁厅集会上的演說

主席同志和同志們：主席方才說过，你們中間很多人也知道，对我來說，作一次关于苏联的演說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事实上，从 1917 年以来，我一直在作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說，而且始終持有同样的观点。

今天晚上，我首先要向各位重申一下，自从三十九年前苏联在革命中誕生以来我一直对苏联所持有的意见，說明一下我再一次来談論在苏联最近发生的新的伟大事件时是代表着怎样的观点——而据我了解，各位是像我一样对苏联友好，而且像我一样相信国际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命运是同苏联的利益和命运密不可分。

我們托洛茨基主义者把 1917 年俄国革命看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分界綫。以此为界，上升的世界資本主义停止了，遭遇了它的头一次失败，进入了它的沒落时期。俄国革命标志了人类向更高、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軍的真正的起点。现代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从 1917 年 11 月 7 日开始的。

我們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們一向不把俄国革命看为終点，而是把它看作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因此，从这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場出发，我們从 1917 年起一直拥护和捍卫着苏联以及产生苏联的俄国革命。

从这个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我們一直热烈关心苏联演化三十九年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在此期間，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和采取的每一行动，不論是頌揚还是批評性的，都遵循着一个准則：什么是对革命有利的，对捍卫苏联有利的，对发展世界革命有利的？

在最初的困难年代中当帝国主义各国联合起来企图在搖籃里扼杀革命的时候，我們就是根据这一准則捍卫了革命。

1928年我們根据这一准則第一次支持了俄国党内左翼反对派在党内反对斯大林领导下官僚主义的革命蜕化的斗争。左翼反对派在“苏維埃民主和工业化”的伟大口号下进行了战斗。他們主张采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来保卫苏联。

在三十年代，我們根据同样的准則——什么对苏联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有利——指責莫斯科审讯为誣控，并且抗議对这些审讯的受害者老布尔什維克們的处死。

我們根据同样的准則，对苏联的同样的基本观点，来考虑现在在莫斯科所透露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滔天罪行。我們是作为苏联的拥护者和捍卫者来討論这些罪行的。以上是我的引言，为了說明我今天晚上演說的中心思想。

从苏共二十大所传来的新聞代表了一切方面的进步。

首先，那些經濟报告說明了苏联生产力，包括軍事潛力的巨大发展。由于革命，由于革命所創造和促进的国有财产和計劃經濟的新的社会制度，苏联已經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它仅次于美国，它的生产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

其次，二十大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即革命已經扩展到东欧和中国，在那里废除了資本主义所有制，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而同时在世界資本主义陣綫中出现了无数的弱点和脫节。这些情况

的湊合已經大大改善了苏联相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由于革命的这种扩展，苏联不再是孤立和被包围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苏联显然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力量而起着领导的作用。苏联的力量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敢进行军事进攻的孤注一擲，虽然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它們世界計劃中的中心内容。

最后，二十大的发展代表了进步，是由于說出了长期以来在苏联内部所发生的，破坏着和危害着苏联的真相的一部分，这部分真相是头一次在二十大透露出来的，而真相永远是进步的同盟者。

**在新透露的情况和有待透露的其他情况中，我們看到了苏联群众中一种深入的运动在苏联官僚机构上层中的被歪曲了的反映。我們看到苏联革命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一个进步的阶段。苏联群众开始动起来了。而这就是上层动摇的原因。**

在斯大林已經令人放心地死去三年才出现的对斯大林的全面揭露和譴責，虽然已很聳人听闻和产生深远影响，但还仅仅是个开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全部說出。还远沒有。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和同謀者所作的初步揭露，已經开始了一个他們将无法控制的过程。

这个过程将不会停止，直到真相全部大白，直到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残余被苏联群众清除得一干二淨，直到这种丑恶的病症从国际工人运动中被根除掉。真理已重新开始行进，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了它。真理永远是进步的。真理是革命的。

我們今天晚上所要談的題目，就是2月24和25日赫魯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會議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稿子落到了若干外国的外交代表手里，在两个多月以前就被世界报界自由自在地引用了。

美国国务院在6月4日把这篇二万六千字的报告向报界发表

了。第二天《紐約時報》把它全文刊載，而并未引起克里姆林的否認或譴責。最近一期《戰鬥者》，一個星期以前付印，現在各位已經看到，在四頁的附頁中轉載了這個赫魯曉夫報告的全文。現在連紐約《工人日報》也在它上個周末的一期中轉載了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全文，絲毫沒有懷疑它的真實性。因此，當我們來討論上述各種報刊所刊載的報告時，我們完全可以假定，我們所討論的就是實際上作過的報告，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工人日報》說，它發表這個報告是為了幫助“探索團結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美國人和促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它接着說：“我們還希望共產黨人，本報讀者和其他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美國人會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中貢獻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運動所面對的各項問題的想法。”

我同意《工人日報》所表示的這種精神。我假定關於讓“其他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美國人”參加討論的邀請也包括我在內，我希望我沒有判斷錯誤。我今晚的講話可以算對《工人日報》發出的邀請的一個回答，雖然老實說我要承認這次集會的籌備是在工人日報周末版付印以前就已經進行了的，而且即使沒有發出參加討論這一親切邀請，我大概也會作這個演講的。

### 羅斯特的問題……

《工人日報》在社論里說：

**“國務院認為斯大林時代的禍害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這是絕對錯誤的。事實上，那些禍害的發展造成了對社會主義的威脅。冤屈、誣控、酷刑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粗暴的違反。”**

這裡《工人日報》提出了一個很好的供討論的題目。這是《工人日報》周末版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這番話。我們的意見一直就是這

样的，现在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改变。

赫魯晓夫报告中的新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斯大林对苏联、对国际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的一部分现在是由斯大林最亲密的合作者、他亲手挑选的門徒、这些罪行的同謀者所承认和証实了。赫魯晓夫的报告是专家的証詞。赫魯晓夫是知道內情的人。他曾亲自在場！

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长期历史包括了过去三十三年中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問題。在这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写过許多文章、小册子和书，它們是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每一方面。說清这样大的問題，需要作許多次的讲演。今晚我只想談到和引用赫魯晓夫关于斯大林对付誠实的、革命的批評者和反对者的方法所作的証詞；就是关于斯大林怎样消灭整一輩的列宁的同伴們的問題。这是所有其他問題的中心。这是所有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段史实，因为被斯大林謀杀的列宁的同伴們确实是人类的先鋒队。他們是史无前例的最崇高和最优秀的人物。我們为这些被屠杀的伟大革命的圣人哭泣。

三个月前，二十大的最初几个报告发表的时候，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试图把整个事情掩藏起来。三十年来頌揚着斯大林的一切罪行的这个斯大林的老工具在工人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再次出来为斯大林进行了辯护。那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最近我們还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話。但是三个月以前他要对那些报告感到震惊的年輕共产党员不要着急，等待我們从莫斯科得到官方消息。他說斯大林做过許多好事，不要把他“撕成政治上的碎片”。小錯誤可能是有一些的，但是不值得大惊小怪。接着他装做天真的样子——似乎他不知道內情似地問道：“难道在清洗中有过冤屈

嗎？”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得到福斯特說他在等待的官方消息了。現在我要原原本本地引用赫魯曉夫對福斯特這個問題“難道在清洗中有過冤屈嗎？”是怎樣答復的。

在我引用的時候，請記住這不是托洛茨基在講話。這是赫魯曉夫在講話，他在重復二十年前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務殺害之前所說的話。

### ……赫魯曉夫的回答

我現在讀一下從赫魯曉夫報告中的直接引語：

“斯大林不是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人合作，而是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原則，要求別人無條件地接受他的意見。

“凡是反對他的這種做法的人，或者是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構，接着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

這是赫魯曉夫所說的話。他還說：

“斯大林創造了‘人民公敵’這個概念。這個名詞自動地使參加爭辯的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所謂思想錯誤根本不必要加以證明；這個名詞使得有可能對凡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橫施最殘酷的鎮壓，而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

“‘人民公敵’這個概念實際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個問題，哪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實際上在大多數場合，定罪的唯一證據就是被告的‘自供’，這是違背現代法學的一切準則的；而後來的檢查表明，這種‘自供’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而逼出來的。

“採用‘人民公敵’這個公式的具體目的，就是為了消滅這些個人。

“事實上，很多後來被作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處決的人們，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

赫魯曉夫談到清洗、誣控審訊和假供詞時又說：

“在 1937—1938 年时被控为‘敌人’的許多政府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实际上从未會是敌人、間諜、破坏者等等，而一直是正直的共产党人。

“他們只是被加上了这样的烙印，而且往往由于不能忍受野蛮的酷刑而給自己加上了（在伪造案件的审判員的授意下）各种各样的严重的和不可思議的罪名……”

假供詞是怎样取得的呢？这里我再从赫魯晓夫的报告直接引用一段：

“现在当調查了某些所謂的‘間諜’和‘破坏者’的案件后已查明，所有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被逮捕和被控犯有敌对活动的許多人的口供是用残酷的和非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赫魯晓夫还不止作了一般性的发言。他还举了若干具体的事例，这些事例你們自己可以从翻印的他的报告里讀到。

“但是他們招供了，不是嗎？”当我們在 1936 和 1937 年为反对莫斯科审讯而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們曾听人一再这样说。《工人日报》曾經一天接一天趾高气揚地吹嘘說，“他們招供了，不是嗎？那就証明他們是有罪的。”而现在赫魯晓夫對他們的招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說：

“一个人怎么可能招供他所从未犯过的罪行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采用用刑逼供的办法，以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这样就取得了‘招供’。”

方才我从赫魯晓夫报告所引用的只是赫魯晓夫証詞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証詞你們可以自己去看，而他的整篇报告还只透露了全部真相中的一小部分。

苏共二十大所作的这些駭人的透露提出了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在問的問題，他們今天一有机会就在共产党的每一个會議上提出这些問題。

### 三个恰当的問題

一、由历史上最正直、最民主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革命所創造的苏联，在它的国内怎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誣控和謀杀的罪戾政权呢？

二、誰曾經反对和抗議过这种墮落，他們碰到了什么遭遇？

三、一切被共产党机关报纸蒙騙过的人正在問的头号問題是：过去为什么沒有把这事告訴我們？

赫魯晓夫对这最后一个問題“过去为什么沒有把这事告訴我們？”的答复，与其說是答复倒不如說是自辯，他說：公开說出来很危險，他們担忧自己的性命。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革命者只是在生命安全的时候才讲真話呢？像在沙皇时代布尔什維克所做的，在任何情况下革命者必須对人民讲真話的原則，跑到哪里去了呢？反对暴政和說出它的真相，在任何时候总是危險的。沙皇时代布尔什維克处在危險的境地，但这並沒有堵住他們的嘴。他們依然說了真話，冒着許多人遭監禁和处死的危險——他們組織了地下运动，最后导致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在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人認識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性。而且他們还讲了真話，从三十三年前的 1923 年开始他們就領導了对这种危害性的斗争。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組織者，恰恰就是組織和領導了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同一批人。第一个用书面形式譴責斯大林并要求将他撤职的人是列宁。第二个是托洛茨基。正是領導了伟大革命的这两个人，領導了反对斯大林統治下的官僚主义蜕化的斗争。

1922 年 12 月 25 日，列宁在病床上写了他給党的遺囑。列宁在遺囑中說，“斯大林同志在就任总書記职务以后独攬大权；我沒

有把握他会永远懂得以足够的审慎来利用这个权力。”这就是列宁的第一次警告，日期是1922年12月25日。

当列宁最后一次患病只得躺在床上时，斯大林采取了行动来巩固他的权力，那时列宁着慌了。两个星期以后，在1923年1月4日，他在遗嘱后面又加了一段话。他是这样写的：

“又，斯大林过于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身为总书记的人身上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任命另一个各方面都比他强的人，即更有耐心，更忠诚，更有礼貌，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等等。”

列宁在他给党的遗嘱里就是这样写的。

在同死亡进行着挣扎的列宁，当时曾向托洛茨基呼吁，建议同他结成同盟向党和国家机器中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同意了。在列宁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结成同盟向官僚主义蜕化进行斗争。1924年1月列宁死了，在此以前的一整年中他没有能够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托洛茨基继续了这个斗争。

这就是反斯大林主义斗争如何在苏联开始的如实的说明。现在这一点全都明白了。从一开始到最近的事态，都有文件为凭，现在不能再加掩盖了。

### 托洛茨基曾说过话

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敢于说反对斯大林的话，同志们，这不是真实的。列宁和托洛茨基说过话。老布尔什维克说过话。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他们依然进行了斗争，因为这是他们的革命天职，而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托洛茨基在1940年遭到暗杀，就是由于他揭了斯大林的底，而不是由于别的。在苏联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屠杀，就是由于他们说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话，而不是由于

別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它留下了最丰富的文献。真相载于文献中——见于书籍、小册子和无数的文章和油印刊物。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宝库，一切想知道真相的人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如果赫鲁晓夫这一伙曾经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而由于恐怖手段不能公开说话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种地下运动，而且留下关于他们反对立场的印刷的记载，让现在可以作为佐证呢？他们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记载，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证，因为他们不是革命家，不是他们现在所谴责的政权的反对者。事实是，他们乃是斯大林亲手拣选的同谋，他们是靠斯大林及其政权而发迹和获得特权的。他们现在想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对任何社会制度作这样的解释，是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斯大林政权，像其他政权一样，有其社会的基础。斯大林乃是苏联官僚主义制度的代表。有许多人，包括赫鲁晓夫这一伙，在斯大林统治下就曾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在斯大林统治下他们越来越兴旺发福。他们乘小汽车，住别墅，享受了英雄的苏联工人阶级的一切劳动果实。那时就是他们支持了斯大林，他们对斯大林政权曾经十分满意。而且他们支持过那时的一切罪行。

在苏联从斯大林政权得益的特权分子有几百万人。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几百万人同斯大林政权有联系而且在当时兴旺起来。他们在苏联全体人民中占少数，可是仍然有几百万人。这个特权少数形成了斯大林政权的社会基础。

赫鲁晓夫的说法说明不了实际发生过的事。今天官僚主义者所用的方法还是同他们昨天用过的方法一样，不过颠倒了一下。

昨天斯大林被描繪为不可能犯錯誤的全能、仁慈的領袖，苏联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一切进步和胜利都归功于他。今天同一个斯大林却被描繪为全面的罪犯，一切錯誤都由他个人負責，他单枪匹马地把苏联带到了毁灭的邊緣。

**伟人的理論被魔鬼的理論所代替了。魔鬼已經死了，可是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还活着。他們仍旧在苏联掌着权，这一点你們不要忘記。而他們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繼續掌权和保留特权，同时使我們所关心的苏联劳动群众为此作出牺牲。**

为什么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在斯大林死后三年开始說話，开始說出关于那个可怖政权的部分真相呢？难道是因为他們突然变誠实了，不再畏惧了嗎？有的人要求你們相信这一点，但他們是說謊者、騙子。有了一些让步和改良——这一点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斯大林統治下建立起的少数享有特权而多数过着艰难岁月的官僚主义政权并沒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官僚主义阶层仍然拥有一切的特权。工人沒有权利，沒有自由。如果誰說他們有权利，有自由，他就是在說謊。在赫魯晓夫統治下，苏联沒有任何自由的工人，这一点跟斯大林統治下毫无二致。要看到自由的工人还有待于将来。工人們必須为自己去爭得自由。

## 五、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

——厄内斯特·杰尔曼

一次“沉闷的”代表大会，一次“同二十次代表大会适成对照的令人失望的代表大会”，一次“不关紧要的”代表大会，一次“纯粹技术性的会议”——这些就是西方观察家对于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在苏联首都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评语。所有这些评语都包含着真理的内核——但也只是内核而已。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有声有色的大会，大会的最高潮是谴责对斯大林的迷信和提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就不像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样惊人了。苏联官僚集团在1956年10月到11月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已经取得了严酷的教训，因此特别致力于重新加强它对整个帝国的政治控制。赫鲁晓夫不能不同意，揭开任何“轰动一时的”非斯大林化的新阶段，都会直接威胁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而且，也正是在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及其同伙作出这一让步以后，“反党集团”对于他们取得多大胜利，似乎作出了错误的估计；1957年6月，他们在政治局中发起攻势，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不过，“反党集团”虽然失败了，却仍然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保持着优势。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重新谴责斯大林；他的名字也仅仅提到一两次。

另一方面，这次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言论和措施也不足以使人相信这样的假设：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本身也受到了修正。相

反地，报告人本人和許多发言者都坚持說，“破坏苏維埃法治的现象”和“危害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现象”已經被完全地和确定地消除了。因此，看来，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似乎在政治方面认可了和巩固了“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主要趋势，但是又沒有越过官僚集团从1956年年底起规定的限度。

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七年計劃。赫魯晓夫的报告就对这个計劃作了长篇累牍的闡述。我們已經在上一期中分析过这个計劃的主要方面<sup>①</sup>；因此，这里就不再加以研究了。我們要加以比較詳細的研究的是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討論的其他問題。这些問題，不論是资产阶级的报刊或斯大林主义的报刊都沒有賦予足够的注意，然而这些問題却足以揭示苏联政策和苏共政策发展中的重要趋势。

### 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对“反党集团”的譴責，仅次于七年計劃，成为代表大会上全体发言者的第二个共同主题。而且，他們又使用了怎样的措詞啊！

像一次拜占庭式的連禱一样，官僚們相继走上讲坛，千篇一律地彼此雷同地痛斥“反党集团”的“可耻的”、“无耻的”、“不光彩的”、“罪恶的”、“分裂的”阴谋。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同列宁主义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大不相同，就是同斯大林主义时期初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也大不相同。因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初期，布尔什維克的传统和干部还没有被摧毁。在那里，至少还展开政治性的爭論——虽然这种爭論是虛伪的，煽惑性的，甚至是誹謗性的。在这里，却連政治爭論的影子也沒有了。在这里，只有介乎开除教籍的檄文

<sup>①</sup> 參看本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間的苏联》一文。

和密探报告之間的“譴責”。在面貌方面，苏联共产党似乎还没有克服“个人迷信”，也没有克服“国家的敌人貝利亚的罪恶活动”的后果。

不过，如果我们更細心地研究一下的話，我們还是可以从这种沉悶的連禱中看出一些有趣的事实来。首先，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苏联人总共有八十三人，其中有六十人譴責了“反党集团”，有二十三人沒有譴責“反党集团”。这二十三人都是些什么人呢？我們将会发现，除三人外，其中包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全部来自基層的工人和农民，还包括全部科学院院士和学者。

这是值得注意的。八十三位发言者分成了两派，一边是六十四位党和国家的官僚（其中包括唯一的一位軍方代言人馬利諾夫斯基元帅），一边是十九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在六十四位官僚当中，有五十三位参加了例行公事式的“譴責”，有七位沒有参加。在十九位“基层”代表当中，只有三位代表（一个工人，两个集体农民）攻击了“反党集团”；有十六位代表沒有参加攻击。

这一事实虽然发人深思，我們当然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意义。在沒有参加攻击“反党集团”的官僚当中，有丑名远揚的謝米恰斯內伊。他是赫魯晓夫的女婿，在代表大会开会时，又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書記（后来就被解除了这一职务）。謝米恰斯內伊一向以“坚定的”超級斯大林主义者聞名；他曾經把帕斯捷尔納克比做“弄髒了自己的烂壁（藍笔）的蠢猪”<sup>①</sup>，因而“大出风头”。此外，他也不大可能是莫洛托夫的盟友，因为他的飞黄騰达，完全得力于赫魯晓夫。他所以表现得“缺乏正統观念”，只能用一时失察来解

<sup>①</sup> 原文是 a hog that dirties his own pen. pen 一詞文意双关，既作“畜栏”解，又作“笔”解。——譯注

释，再不然就是他想要表明，共青团“不参加政治”。

至于沒有攻击“反党集团”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官方文件只是告訴我們他們是工人。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真正的工人呢，还是工头，监工或管理人員。

尽管如此，发言者的这种奇怪的分野仍然是值得強調指出的；这尤其是因为赫魯晓夫在答复时，直呼其名地提到某些发言者作了“出色的”闡述——而这些人除少数外也正是那些沒有攻击“反党集团”的发言者！

不但如此，对“反党集团”的攻击还有程度之分。大多数发言者都滿足于重复上面提到的形容詞，但是，到了代表大会快要結束时，攻击就愈来愈粗暴，愈来愈值得玩味了。

例如，鄂木斯克共产党领导人科卢申斯基就談到了“阴謀家集团”。茹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断言，如果中央委员会当初不把这批“罪恶的阴謀家”“解除武装”的話，共产主义事业在苏联就会受到“决定性的削弱”。計划委员会首脑庫茲明更进了一步。他指責別尔烏辛和薩布罗夫不誠实地（因而是存心不良地？）減緩了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大力推广固体燃料热电厂，而不是推广液体燃料热电厂。他提出的这项罪名差不多已經接近破坏了！斯大林格勒党的领导人，一位叫做切加林的人也提出了这种指責，并且加以扩大。一位来自薩拉托夫的名叫杰尼索夫的官僚甚至指責“反党集团”居心要減緩苏联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速度。

这一切罪名，按其性质來說，都使人想起司法部长魯金科在上一届最高苏維埃會議上提出的“人民公敌”的公式。然而，赫魯晓夫在答复时却沒有附和这些指責。“反党集团”的成員也沒有被开除党籍；別尔烏辛和薩布罗夫甚至沒有被赶出中央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改組固然不在議程之上。但是，庫茲明发起这个运动无疑

是希望采取“极端”措施。这种措施终究还是没有采取。庫茲明自己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也被解除了职务。这难道不是领导集团想叫官僚和党员群众安心的征候吗？领导集团的确曾经保证避免采取新的“极端”措施，但是党员群众当然难免担心对“反党集团”的攻击也就是指示各地采取这种措施的号令。

我們說过，这次代表大会的面貌接近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各次代表大会，而不接近于 1923—1927 年的几次代表大会，更不要提列宁所参加的各次代表大会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所公布的代表大会的組成成分，以某些可怕的细节，具体地证明了我們的論断。在参加代表大会的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代表当中，只有八名——再說一遍，只有八名——是老布尔什維克，即十月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在当时，布尔什維克党已经有二十四万名党员，其中有几万人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他們今天的年龄当在六十二岁到七十二岁之間。許多人在內战中死去了，但也有几万人活下来。此外，在內战結束时，即 1921 年 3 月，布尔什維克党已经有党员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人。其中肯定有三分之一在三十五岁以下（今天当在七十三岁以下）。可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出席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却只有四十五人——我們再說一遍，在二十万人当中只有四十五人。

单单看看这一数字，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在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中进行了多么可怕的大屠杀。我們难道还需要其他数字吗？

更有意义的是，赫魯晓夫自己也是到 1917 年 10 月以后才参加布尔什維克党的，虽然在革命时他已经二十三岁了。在革命胜利以前，就有几万名和他年龄相仿或比他更年青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青年参加了党的队伍。赫魯晓夫并不在这些优秀青年之列。

我們还应该指出，在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代表当中，现职的工人

和集体农民只有三百九十九人，现职的知識分子只有五十人；其余的八百二十名代表都是官僚。因此，官僚們在大会代表当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二，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虽然比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略有减少。

### 消除“破坏苏維埃法治和民主的现象”

有許多代表在发言中討論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取締破坏苏維埃法治和民主的现象”的決議。这是代表大会上大体上普遍談到的第三个主题。

在这个問題上，許多发言也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也有几个发言值得注意。

例如，赫魯晓夫自己就說，今天苏联已經不再有任何政治犯了；任何人都不再因为政治见解而受迫害了。米高揚也就这同一問題作了相当詳細的发言。他具体地說：

苏維埃民主已經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我們愈是向前迈进，这一演变也就愈是彻底，同时，我国的社会秩序也愈是巩固和完善。我們每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說服、社会影响，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社会成員的自觉紀律的作用也就愈加重要，而强迫手段的使用也就愈加有减少的趋势。今天，在我們中間，已經不再有为了政治原因而对公民进行报复的现象了。

在这里，米高揚的調子和他的所有同僚的調子是不同的。在发言者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說“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有机发展”。人們不能不感觉到，在这里講話的是一个不同的学派。事实上，米高揚就是 1917 年 10 月間已經入党的八名大会代表之一。这从他的話里也可以感觉到。更有趣的是，米高揚說，党和群众之間的联系从来沒有像现在这样巩固。当然，这种老一套

的論調在布尔什維克党过去历次代表大会中也可以找到。但是，或許这應該和“强制职能的消亡”联系起来看吧？或許，他們今天要承认，当国家和警察不但不消亡，反而像在 1934 年到 1954 年那样取得某种不得而知的全面力量的时候，这种情况难以証明社会很巩固，相反地只能証明社会内部四分五裂，难以証明公民們热情地团結在国家周围，相反地只能証明公民們反抗——即令只是默默地反抗——国家吧？

由于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开始逐漸得到滿足，毫無疑問，这种反抗已經不像过去那样激烈了。然而，新的警察首脑謝列平仍然觉得需要指出，治安部队(政治警察)在限制自己的职能的同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他还在事实上駁斥了所謂治安部队專門針對国外的說法。他說，他的对象是：

容易〔1〕落入敌人罗网的少数叛徒、墮落分子、醉鬼、泄密者。

如果真的只有这样一些例外，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还需要維持一个費用浩大、极端臃肿的机构(虽然像赫魯晓夫所說的那样，这个机构已經大大縮小了，而且赫魯晓夫所說的无疑也是实情)。事实上，虽然这几年来苏維埃社会的团結已經有所加强，我們距离一个“无階級的社会”还是非常遥远。“針對国内的鎮压机关”所以繼續存在下去，秘密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不过，誰要是想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就不免使人們对“社会主义社会已經建成”的論断发生怀疑。

赫魯晓夫和謝列平都坚决认为需要把以前由国家机构执行的某些职能移交給社会团体。謝列平列举了大量提交法庭处理的少年犯罪案件(附带地說一下，这种少年犯罪案件同这个“无階級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和諧”是十分不調和的，因此很可以說明这是怎样一种“社会和諧”)。他十分正确地对这种现象表示痛心，并且要

求让工会、青年組織和工厂集体用友好的方式来改造和感化青年，而不是把他們交給法院和感化院。赫魯晓夫則建議由工会来管理职业教育訓練班，把体育設備移交給体育团体，并且由慈善团体（特別是业余剧团，业余管弦乐团等等）来主持各种文化活动。

这一切情况都是值得欢迎的，而且还說明，在苏联，社会关系方面的紧张状况现在毫無疑問已經緩和下来。但是，某些西方辯护人——尤其是德国的“工人政治”集团——却因此大談起“国家消亡”来。这是一种接近荒謬的夸张。照这样來說，在实行資产階級民主的社会中，“国家應該早就消亡了”，因为我們所指出的这一切办法在那里已經实行了几十年了。只有当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厂的管理工作，工人团体自己起来执行大市政机关的管理职能，而且公民团体主动地出来在苏联各地出版**政治性**日报的时候，才談得上列宁所說的那种“国家消亡”。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化的工人国家，由于和自己的公民日益融合，已經既是国家又是消亡中的国家了。

可是，在今天，苏联的行政机构仍然是世界上最臃肿的行政机构，苏联工人們在政治上和管理上的主动性同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相比，仍然极其有限。因此，在那里侈談“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存心要无耻地欺騙群众——除非是存心欺騙自己。

什維尔尼克說，“所有沒有真凭实据而被判罪的共产党員都已經被重新接納入党。”他又說，这些措施同“党、国家、經濟和軍隊的領導干部〔！〕”特別有关。苏斯洛夫說，这次代表大会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历次會議的記錄都要予以翻印。毫無疑問，伪造历史的丧心病狂的行徑在苏联的确有“消亡”的趨勢，但是，人們也並沒有去客观地探求真理，至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並沒有这样做。

安东諾夫—奧夫謝因科的《回忆录》的序言以及約翰·李德的

《震撼世界的十日》的序言和注释（这是近年来苏联最轰动的出版物中的两种）都說明，非斯大林化运动停留在大“清党”前夜的水平上。他們还要利用政治污蔑繼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不过，这已經是 1926—1932 年的污蔑，而不是 1936 年的污蔑了。这一演变在客观上不能不造成这样的結果：使得青年人和誠实的研究者有可能通过独立的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今后，这方面的确大可乐观！

苏联政治生活的“自由化”不但是对广大群众的让步，而且是对大批官僚的让步。这些官僚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受到排挤，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力，并且时时刻刻有无緣无故地丧失自己的特权和生命的危險。我們曾經一再表示，我們坚信事实确是如此。在这方面，我們还着重指出，苏联目前的领导集团想要扩大独裁統治的基础，想要吸收愈来愈多的官僚参加行使权力。

經濟分散給我們提供了一个足以証实这一論点的明显例証。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我們又找到另一例証。那就是基里欽科的发言。据他說，在中央委员会的各届全体會議上，在中央委员会为了就重要問題作出决定而召开的各种會議上，

被邀請的有国内最进步的〔1〕人士，党和国家机关、經濟机关（即大工厂和集体农場）的领导〔1〕人員、学者、工程师、技术人員等等。

这种列举說明了很多問題。官僚集团内部的民主显然正在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會議愈来愈成为整个官僚机构的代議制議會。不过，基里欽科却忘記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細节：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工厂工人或許不在国内“最进步的人士”之列吧？邀請他們出席會議，无疑地純粹是由于失察。

### 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

除了七年計劃，对“反党集团”的譴責以及“恢复苏維埃法治和

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问题以外，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第四个基本主题是稳步地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几年的成就无疑是惊人的，虽然常常并不是所有的诺言都实现了，也不是所有的诺言都在预定的目标日期以前实现了。<sup>①</sup> 许多代表举出数字来证实已经取得的进展或未来几年的预计的进展。我们希望这一切计划——特别是其中最惊人和最迫切的计划，住房建筑计划——能够真的实现；我们也希望苏联人民在几十年的可怕牺牲之后，能够终于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是，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尽管第一次可以提出确实的论据来为苏维埃政权辩护，仍然不免采用了方便的荒谬的煽惑手段；坏习惯实在太难摆脱了。

例如，在比较苏联和美国的食糖消费量的时候，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者举出了目前的产量数字和今后七年到十二年的预计产量数字，但是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美国消费的食糖大部分并不是国内产品，而是进口的古巴糖；还有一些发言者比赫鲁晓夫更激进。他们轻率地断言，到1970年，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将超过美国工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我们已经分析过，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谎言。<sup>②</sup> 赫鲁晓夫自己还断言，苏联的医疗事业在世界数第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未来七年中的公共保健开支达三千六百亿卢布之多。可是，按全国人口细算一下，原来每年每人平均所得也不过二百五十卢布，还不到英国政府每年用于保健事业的开支的一半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

许多代表都坚决要求“绝对优先地发展重工业”。米高扬又和这些人不同。他特别强调七年计划的特点：

① 参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一文。

② 同上。

在比我們以往的經濟計劃大得多的程度上，七年計劃的特点在于，它一方面建立在重工业的巨大成就及其今后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规定要比以往快得多地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福利。

这段話既是一个綱領，又是一份供状，而且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我們决不能怀疑这个諾言，因为它是真誠的（虽然要全部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也同样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供状。它給了官僚机构的仆从們，特别是它在西方的仆从們，一記响亮的耳光。这些仆从們总是竞相掩飾或縮小苏联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蒙受的牺牲，把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說得美妙无比，从而侮辱了苦难深重的人民。另一个发言的代表基里欽科作了更进一步的供认。他証实我們用同一論据来批評斯大林最新的經濟著作，做得很对<sup>①</sup>。他事实上說：

人人都知道不多〔1〕几年以前我們的农业生产处在怎样的情况中。当时，小麦是太少了。肉类、牛奶、黄油、食糖、蔬菜和其他重要食品都非常缺乏〔1〕。

不但如此，还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順便指出，同样悲惨的匱乏情况直到今天还在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存在着。詩人特瓦尔多尔斯基就指出，今天要想在商店里找一个书架，都非常困难。另一个代表，列宁格勒造船的工人戈尔布諾夫說，现在就連大企业都很难买到鉄釘、螺釘和各种小工具，以致不得不花很大成本自己制造。这再一次說明官僚主义的鉛盖子怎样妨碍着計劃經濟的順利执行，又怎样不断地給它带来巨大的損失和浪費。

### 官僚主义的計劃工作的缺点

在这方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証实了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二十

<sup>①</sup> 《苏联經濟問題》，第四国际出版社出版。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指責——这清楚地說明了在前两次代表大会以后实行的改革根本没有消除恶习的根源。

例如，部长會議副主席薩西亚德科就說，截至 1959 年 1 月 1 日为止，苏联沒有完成的建筑工程項目不下三十二万項(!)，冻结在这些建筑項目中的資金达一千七百九十亿卢布之譜。这一情况大大地減緩了經濟发展的节奏。阿里斯托夫說，单单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就有六万台工作母机和一万五千台成套机器已經制造出来，能够使用，然而却沒有装配起来。这又是一个損失的根源。

原料和零件的不間断的正常供应，也远沒有能够保証。我們前面提到的工人戈尔布諾夫說，在列宁格勒造船厂，不需要額外投資，只要供应正常化，就可以使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大声疾呼地說：“在我們的工业中，还有一些潜力沒有挖掘出来。”情况的确是这樣；馬林科夫早就指責过同一情况……那可是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

另一个发言者科茲洛夫相当詳細地談到由于金属废料留下过多而造成的損失。他說，这种損失每年达到四百五十万公吨，价值二百五十亿卢布。

各方面的发言者接着談到工业分散的某些有害后果——在别的方面，工业分散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理所应当的贊揚。发言者們強調指出，地方主义和工厂或地方的利己主义抬头了，供应合同不被遵守，产品的品种被任意加以改变等等。

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还宣布了一些官方前此沒有公布过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到现在为止在苏联进行的投資項目，其成本并沒有經過核算比較。例如，薩西亚德科就把各种炼鋼厂工程項目加以比較，把投資收回率估計在內加以核算，看看从长远来看它們是否合算。他說，如果一个工程項目的投資收回率是百分之十

六,另一个工程項目的投資收回率只有百分之七,就應該取前者而舍后者。的确,苏联計劃人員今后在选择各种投資項目时,看来还要把利息支出考慮在內(核算一下按貨幣計算是否合算,而不是只考慮物质生产力的提高)。

发言的代表們,尤其是談到电站問題的各位代表还強調指出,各单位的生产成本极不平衡。塔吉克斯坦的一位代表——他后来被解除了职务——建議修建一座每度电的成本只有十分之三戈比的水电站(这是对赫魯晓夫的隱蔽的攻击,因为赫魯晓夫曾經要求集中力量修建使用煤气或石油产品的热电站)。据电力工业部长諾維科夫估計,大型电站每度电的平均成本是八戈比。但是,除了这些大型电站以外,还有一些小型电站,它們的电力生产成本却是一卢布到二卢布!不但如此,諾維科夫还透露,这些“小型电站”共有十万座,其中集中的人員占苏联电力工业全部人員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它們所提供的电力却只占苏联全部电力的百分之十。

可以肯定,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后将在苏联經濟的許多部門中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們效率不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分散”。

### **最后的一段时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問題**

虽然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首先是一个实际的、而且甚至是实用主义的大会,但它不能对一系列日益复杂和矛盾的理論問題保持緘默。这些理論問題已在官僚制度的理論家以及所有馬克思主义理論家自身面前被提出来了。苏联现在正經歷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是什么?它在达到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前还需要經過哪些阶段?这种发展必然会引起哪些政治、經濟和社会的变化?

这些問題使官僚制度的理論家感到相当头痛,因為它們全都直接或間接地觸及到官僚制度本身的問題。因此,官方理論家只

能躡手躡脚走到这个“未知的領域”的門前，抬头探望一下，便却步而退了。多年来許諾向我們提出的苏共著名綱領，至今仍然未制訂出来，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位发言人提出建議，主张用赫魯晓夫的报告作为拟訂这种綱領的启示，这决不是偶然的：

苏共第一書記甚至在理論方面也表现一定程度的勇气，这是沒有疑問的。他自己已投身于理論方面，好像这只是开垦处女地和规定种植玉蜀黍的新技术这样的問題。不幸的是，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并不是一块未垦地，即使斯大林竭尽所能，也不能使它成为未經开化的不毛之地。至于赫魯晓夫虽然应被认为提出了某些問題，但也只能提供一些陈腐的答案，他的党徒們迫不及待地把这些答案吹捧为非凡的成就，如果說虽然不是的确表现了天才的話。

赫魯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获得完全的和肯定的胜利；許多发言人选用了“胜利”这一名詞，他們认为这个名詞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新創造。我們对此应该怎样看待呢？

在距今大約十年以前，当中国革命胜利不久的时候，我們的运动便已肯定了力量的对比肯定地正朝向有利于反对資本主义陣营而不利帝国主义陣营的方向发展。从那时以后，沒有发生任何事情表明能修改这一估計；正好相反，事态的发展已完全証明这种估計的正确。力量对比的这种**世界性**发展——中国革命胜利以及殖民地革命和苏联經濟发展不断取得进展的結果——无疑地已使苏維埃政权加强到在 1941 年前所未料想到的程度。然而，却很难从这里看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理論已經得到証实。因为难道不正是革命的**国际扩展**改变了全世界階級与階級之間的力量对比嗎？

当赫魯晓夫說可以认为在苏联复活資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時候，我們可以同意他的这种意見。这种复活只能是国际上反革命

力量重新强大到超过革命力量的結果。这样一种强大在不久的将来还很难看到。

不幸的是，正如我們已在过去所說过的那样，克里姆林宮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高估計帝国主义的力量（这是斯大林时代的战略特点）走向危险性不下于前者的过低估計帝国主义力量。如果說，当赫魯晓夫表示資本主义不可能在苏联复活，我們同意他的意见；但当他說“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是确定不移”的时候，我們就不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忘記了这里竟然有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說法，即：美国和苏联在一場核战争中同时毁灭。

认为苏联經濟的基地不可能遭到这样重大的毁灭，也就会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不再可能发动一場世界大战。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发言人多少也談到这一点；但是我們在这里所看到一种极端危险的幻想。但是，根据苏联每年庞大的軍費开支看来，这种幻想似乎沒有影响苏联武装部队首脑們的行动。

能不能像赫魯晓夫那样（仿效他的导师斯大林）进一步肯定說，社会主义已在苏联“确定不移地实现了”呢？这种說法立刻表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資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它的特点是社会不再划分为各个阶级。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預见只須在今后七至十五年中就超过美国資本主义的生产水平，而社会阶级的消失——特别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农民之間的差别——却被赫魯晓夫自己拖延到一个比較捉摸不定的未来。

因此，下列这种說法比較合乎邏輯和更为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們在苏联仍然只见到一种处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过渡性社会。但这个社会正在接近它的目标，因为生产力的高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的“工业化”，使这个阶级的主要矛盾可以得到解决，用不着再去推翻官僚制度的专政，虽然有一

点点民主化以及重建充分和完全的苏维埃民主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赫鲁晓夫为共产主义社会规定的一些特点，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例如，在生产力、生活、卫生和文化水平等方面达到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水平。因此，如果赫鲁晓夫以一种比较令人惊奇的态度——可喜的是他对斯大林的(观点)作了修改——宣称“共产主义”不会单独在一国建成，而只能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它超过全世界面积的三分之一，即使是认为在今后几年这个阵营不会进一步扩大)建成，那么，他实际上是承认(也许是不自觉地承认)历史已确定不移地抛弃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无疑，如果不是更多的国家，至少也会有十多个国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起消亡。

### 共产主义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作为共产主义问题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问题，那么，哪些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被称为共产主义阶段的高级阶段这两个阶段曾加以区别。他列举了下面的这些特点：

一、在低级阶段——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价值和交换都已经不存在。剩下的是每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出的劳动实际尺度；因为正是这种尺度决定消费资料的均等分配。

二、在高级阶段——我们现在称之为共产主义阶段——在每人消费的尺度消失的同时，每人劳动的尺度也会消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规律将付诸实施。我们将会掌握极大丰富的物资，其所以可能是由于：

(一) 生产力的惊人发展;

(二) 在前一阶段对一切基本需要的自动满足所引起的心理上的革命, 因而使希望个人致富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机的愿望归于消失。(原作者此段引語, 我們未查对原文——編注)

只要看一看这个簡明的結論, 就很可以了解, 共产主义問題——从均等的分配过渡到极大丰富的分配的問題——现在还很难認真地在苏联提出。

三十年来——在斯大林以前、在斯大林当时以及在斯大林以后——一直是苏联的官方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維狄亚諾夫院士, 认为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 商品生产和商品——貨幣的关系将会消失。他还认为, 由于有了电子计算机(!), 直接測量每一个人的个人劳动的社会劳动時間, 将是可能的。

混乱是明显的。在过渡时期, 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 商品、价值和貨幣将要消失, 并让位于計算每人工作的劳动時間的會計工作。既然奥斯特罗維狄亚諾夫坚持不仅在苏联国内, 而且也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中大大推广商品、价值和貨幣的范畴, 那么, 不管他自己的主张如何, 他就提供了最有力的証明, 表明苏联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遙远。

赫魯晓夫的下列这种說明就正确得多: 在共产主义社会, 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将会消失, 这也包括用“电子计算机”来測量消費品的分配在內。他說, 剩下的将只是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把现有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中去。这样我們就十分接近雅罗欽科的著名公式, 斯大林在他逝世以前不得不和这位年青的經濟学家有一場交鋒: 在共产主义社会遺留下来的唯一經濟問題将是生产組織問題。

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結論，赫魯晓夫不得不借用斯大林著名的荒謬公式，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式，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指导分配产品的公式。在馬克思主义的任何經典著作中都找不到这个公式，这完全是一种粗糙的捏造。但好处是：这一公式的确掩盖了苏联分配标准中的**資產階級**性质，这个定义符合整个馬克思主义的傳統，根据赫魯晓夫的说法，它近来已由“某些学者”再度提出来。

“共产主义問題”的討論就必然要回到“社会主义問題”的討論。这样一来，便引起对苏联仍然在經歷着的过渡阶段的**实质問題**的分析。这种分析和下列事实正相违反：在官僚制度內目前所流行的一整套定义都具有辯解的性质。但是，苏联的青年已如此强烈地攻击官僚制度的**实际問題**，也不会不同时提出这些理論問題的。

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期刊《新領袖》在它 1958 年 8 月 18—25 日的一期上面刊載了苏联青年移民戴維·柏格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他在 1957 年以前一直在美国学习。他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目前苏联非正統派的知識青年的主要思潮之一的“新布尔什維克思潮”：

“新布尔什維克”正在寻求一种“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现在，普遍存在着对苏維埃建立以前时期和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怀念情緒。今天，苏联青年常常表示反对現政权，他們拿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的鏡子和当前的现实对照。在他們看来，1937 年的清洗消灭了革命的真正領袖。他們拿法国大革命（或譯七月法国革命）同十月革命相比較……。

……他們把十月革命理想化，要求回复到列宁主义的原来理想，他們认为他們可以在列宁的一些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找到这些理想。他們經常談到政权的“官僚主义墮落”和一种占統

治地位的特权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官僚政治已成为对人民的专政。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旧革命党的传统，并赞成采取积极战斗的激烈方式。

他最后的结论说，新布尔什维克人认为“官僚制度只是一种有害的发展”，应该动“手术”加以消除，以便“一种基本健全”的社会有机体得以“正常地发展”。

这位青年，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越来越从产生我们的主张的同一源泉中吸取养料。尽管赫鲁晓夫悠然自得，青年一代将会准备并施行他们的“手术”的。

（译自《第四国际》英文版 1959 年春季号）

## 六、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

(1961年11月)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与列宁一起创立了苏维埃国家的人，红军的创始人列昂·托洛茨基在1937年说了这些话反对斯大林：

“莫斯科的清洗和可怕的审讯的主使人将饱尝羞辱，苏联人民将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起纪念碑。”

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他开始扯下继秘密警察筹划的暗杀基洛夫事件后犯下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罪行的帷幕。

但是斯大林及其合作者们罪行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成千成万忠于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名战士。他们之中，还有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最光辉的名字，列宁最忠实的同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利科夫，比亚达科夫，拉科夫斯基，克里斯坦斯基，斯米尔加，比勒奥贝拉让斯基，托姆斯基，拉德克等同志，特别是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就是他们的名字应该用金字刻在为斯大林的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应该首先恢复名誉的，就是他们。

这些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被罪恶地杀害了。不止于此，他们还受到无耻的毁谤。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曾卑鄙地重复和支持这种毁谤并且把它说成是名正言顺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要求全部的，严肃的公开重新审查这些案件与控訴。这不是一件只关系到苏联共产党人的事，而是一件关系到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事。

我們要求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下列人員組成：你們党的代表和国际工人和革命运动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波兰統一工人党的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日本工会总評議会的代表、英国工联大会的代表、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智利工人統一工会的代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代表、国际工人运动一切大的派系的代表，其中包括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書記处要求这个委员会听取它作为见证人和作为唯一从一开始就了解和揭发所有这些罪行的共产主义派系而要讲的話。第四国际書記处曾不倦地为维护和恢复你們在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要为之建立紀念碑的这些受害者的名誉进行了斗争。

我們要求把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战士们所犯下的全部罪行真相大白于世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同謀行为。我們和娜塔丽亚·托洛茨基同志一起要求弄清暗杀列昂·托洛茨基事件的真相并公开揭发与制裁主使和从事这一罪行的人。

同志們：

超过二十大并且較之更为深入的二十二大会上的异乎寻常的揭发并没有結束“清除可耻的过去”阶段。而是又一次开始了一个把有关共产主义綱領、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全部关键性問題重新提出来討論的时期。

你們公开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全部恐怖行为。但是，你們在对那一时期作解释时依旧归罪于所謂的个人迷信。二十大后，这种解释沒有使任何人感到滿意，而在最近的揭发之后，这种解释更加不能令人滿意了。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如此广泛的现象不能用

別的，只能用社会因素来解释。当赫魯晓夫宣称斯大林为了保証官僚階級的特权（这一階級是当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陷于孤立时强加在他們身上的）而篡夺了权力并把对国家和經濟的控制集中在自己手里时，使用了托洛茨基曾經用过的字眼：“篡夺者”。

托洛茨基主义者多年来曾一直提出这种看法。他們揭发了由此产生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但仍繼續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虽然人們對他們犯下了种种罪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同意这种解释的。可是大家都感到必須对这个问题进行討論。二十二大的揭发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討論，無論如何它将会开展起来。

为了本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在政治上进行一次澄清，必須在各国共产党內自由地展开討論，首先就在苏共黨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派別：中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国际都必須参加这种討論。这一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理論問題的討論必須公开进行，就像列宁时代的討論那样。那个不应公开进行这些討論的原則是完全违反布尔什維克的实践与原則的。

在討論中，必須讓人們了解受斯大林之害的那些共产党人的綱領和他們編写的書籍与文章，首先就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和布哈林的文章，我們要求在苏联出版这些文章。

我們的組織要求把这种討論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当前正在辯論的所有重大問題上去，特別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間討論的問題。当前的这种沉默只能对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有好处，它使各种流言蜚語和捏造的新聞渗透到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相反地，对于这些分歧进行公开坦率的討論将会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苏联和所有其他工人国家之間的必要的团結。

今天，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已成为战无不胜的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只有当这个事业的旗帜洗尽了血迹和泥污，只有当篡夺权力的官僚阶级被赶走，只有当苏联的民主完全得到恢复，只有当无产者在民主选出的苏维埃中管理国家和经济，只有当共产主义的旗帜重新成为国际的旗帜，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时，这个事业才将取得胜利。

我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胜利地捍卫了并且使其免遭不幸的列宁的不朽遗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譯自意大利托派刊物《紅旗報》1961年11月号）

## 七、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1 年 12 月 5 日的决议

### I

苏共二十二大已经在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中打开了一个特别尖锐的局面。作为教条的大集成，斯大林主义是已经完蛋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任何人再在行动上十足表现为旧式的斯大林主义者，因为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至少打破了两条被斯大林主义视为天经地义的惯例，即：无条件忠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曲折的策略路线，绝对不公开议论苏共的官方领导。可是，斯大林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毋宁说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和政策的歪曲，并且它是为那在苏联篡夺了政权的官僚阶层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虽然经过非斯大林化的过程还依旧存在，只要这个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仅是苏联官僚拚命想要维持权力的一种努力，以抵抗在苏联本国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日益抬头的争取苏维埃民主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官僚阶层不由自主地给了一切革命力量以一种新的动力，这些革命力量逐渐削弱官僚阶层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治。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个尖锐的新局面采取两种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特殊形式：

(甲) 超过二十大的秘密揭露的做法，这次公开地揭露斯大林

的罪行；揭露斯大林从列宁逝世以后违反了早經确定的民主原則；公开揭露基洛夫遇刺案的煽动性；把“个人迷信”的开端放在 1933—1934 年——赫魯晓夫由于作了这些揭露，已經为从法律上推翻莫斯科审判和从法律上恢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全部布尔什維克老近卫軍的名誉这两件事提供了有力的論据。毫无疑问：在苏联本国和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內，要求恢复那些被誣告的人的名誉的呼声将日益高涨；在决定由法院对基洛夫遇刺的詳情进行查究时，苏联的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难以逃避那种使这些人恢复名誉的責任，因为为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受害人树立紀念碑和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紅場的陵墓这两件事已經为受害人的恢复名誉作了准备工作。

官僚阶层的努力现在将集中在拒絕从政治上恢复布尔什維克老近卫軍、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名誉这方面。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頻繁地面对人們要求由公众公开討論反对派的思想、重新出版他們的著作、根据过去的形势审查他們的观点的呼声，而所有这些都將把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政治的阶段。

(乙) 由于把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并且經過这场冲突又把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赫魯晓夫已經在各国共产党之間促成了一次新的和迅速的分化。目前，除我們的流派以外，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內部可以看到的三种不同政治流派：赫魯晓夫派、中国派和南斯拉夫派。在这几种流派的內部，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分化，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流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流派有所不同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流派，以及 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經過长期的“衰退”已經开始重新出現的波兰共产党的流派。法国共产党已經公开地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古巴

共产党为它的关于古巴国家性质的见解辩护，它的见解同其他共产党的见解不同。公开分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印度共产党的多数派公开地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最近边界事件的问题上反对中国共产党。

这些分化只会加剧。

## II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一尖锐的新局面，归根到抵只能用工人国家本身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过程的加速以及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的加剧或加强来解释。

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当权以来，政府除了受到消费者的压力之外还第一次受到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人们由于同官僚阶层的统治部分暗中或公开发生政治争论而掀起的自发性示威运动增多了；敖德萨发生了一次罢工；在“争取和平的进军者”抵达时学生举行了示威；发生了以诗人叶甫图申科问题为中心的示威；党内产生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反对那种时时刻刻禁止组成派系的统治；人们要求继续进行非斯大林化等等。这种压力不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是强有力的，而且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很厉害的。

在那些从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运动中，和平共处的幻想，关于“戴维营精神”的空谈，苏联官僚阶层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外交总方针，它同法国共产党一样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抱的消极态度，埃及和伊拉克共产党由于执行克里姆林宫命令的灾难性政策而遭到的悲惨命运，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或古巴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两次重大革命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拒绝利用殖民地革命的巨大潜力以

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这些企图限制甚至阻止这种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努力，已經在这些党和国家内部引起了种种議論和日益高涨的不滿，而对这些党和国家來說，中国党已經在某种程度上起了解释者的作用——这些都对苏联官僚系統的統治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这个官僚系統所控制的国家的内部，甚至在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殖民地国家学生的勇敢的反帝活动也屡次导致了同官僚机构、甚至同警察发生小冲突，例如最近一次在法国大使館門前要求释放本·貝拉的示威运动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苏联国内的革命高潮、世界革命的演变和这双重的發展对苏共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影响之間的相互作用，现在使斯大林主义危机越来越显出是一个持久的和爆炸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地向前发展并且容易产生聳人听闻的变化。不論官僚阶层作出怎样的努力想要像在二十大以后那样来阻止这个过程，他們获得成功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了。

### III

为什么赫魯晓夫要冒很大的危險在二十二大作那些揭露并公开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生冲突呢？即使承认他的个性在多数場合下表现出一种冒险主义的气息，我們也只可能用克里姆林宮现在的主人发现自己所处的困难的政治局势，来解释这种对苏联官僚說来充滿着严重危險的策略：他发现自己陷于双重反对的夹攻之下，其中之一代表苏联社会和各国共产党内精悍的、进步的、年輕的革命力量的反对意见，另一种代表官僚阶层中越来越激烈地反对赫魯晓夫在許多領域内所规定的革新方案的那部分最保守、最倒退的力量的反对意见。

正是这种双重的压力，无疑地再加上軍事阶层的压力（它最近

几年一直不接受削減軍事預算和兵力的建議),迫使赫魯曉夫作孤注一擲,以便阻止他的敵人聯合起來反對他。持續的農業危機,尤其是他所創議的“生荒地”試驗的相應的失敗,助長了敵對者的聯合。他的政策主要有兩個部分: 在國際方面加劇對帝國主義的緊張關係(柏林危機、恢復核試驗、五百萬噸級炸彈),其目的在於使那些譴責他對華盛頓讓步的人喪失批評的根據; 在國內政策方面則重新發動一次非斯大林化的運動,因為這個策略最為合適,一方面可以保證他獲得廣大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可以把他的國內和國際的敵手或多或少地說成是斯大林罪行的“同謀犯”,或圖謀恢復蘇聯群眾希望不惜以任何代價加以避免的斯大林主義方法的一黨,從而使他們處於孤立的地位。可是,由於採取這種大膽的行動從而使他的權力能夠繼續維持下去,赫魯曉夫也就同時打開了筑在蘇聯官僚階層的權力和特權周圍的一系列堤壩。通過這些缺口,革命批評的洪流可以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找到一條在蘇聯群眾中間引起強大共鳴的途徑。固然赫魯曉夫暫時總算在群眾面前扮作非斯大林化的英雄,可是不久以後,對馬林科夫在亞美尼亞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卡岡諾維奇在鐵路工人中間進行清洗時所扮演的角色的指責,將促使人們頑強地提出責問: 烏克蘭的清洗是誰組織的……

在掌權以後,赫魯曉夫所以能夠在二十大達到的高度上遏制蘇聯的革命浪潮,主要是由於他所開出的提高蘇聯公民生活水平的支票(而且一部分已經兌現)。他最初的打算是想通過保證在二十年內解決工人的一切問題……這一辦法把二十二大時期的壓力抑制在同樣的水平上。這就變成了一項條約,其交換條件是: 蘇聯人民在“建設共產主義”的整個時期必須容忍官僚的統治。

可是群眾的壓力十分強大,不是能夠被抑制在這種水平上的。

所以就有必要扩大缺口，繼續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赫魯晓夫无疑地正在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緩冲手段。他会成功嗎？无論如何，看来他不可能得到像 1956—1961 年那样的五年喘息时期。在国际革命压力的帮助下，苏联无产阶级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迅速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最后一定会把作为統治阶层的官僚机构推翻。

#### IV

苏联官僚机构把它的种种罪行完全推在斯大林身上并用单纯譴責“个人迷信”这一借口来模糊人們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經濟批判，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已經可以认为是失败了。在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內，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問題：这些罪行怎么会发生的呢？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才开始譴責这些罪行呢？在波兰統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最近一次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奥斯卡·兰格提出了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个人迷信”的問題，并且他要求“苏联同志”提供解释。哥穆尔卡提到了苏联的孤立和它的落后状态。在意共書記处的文件里，也同样強調有必要提供解释，并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61 年 11 月 22 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論，其中一部分专门用来駁斥那种在意共不同成員中、特別在青年中事实上已經完全公开談論的关于“苏联的蜕化变质”的說法，这就証明在苏共本身的内部现在也已經开始进行这种辯論了。目前这种辯論的展开所采取的方式，使第四国际可以充分利用它的經驗和它对于苏联的性质所抱有的馬克思主义革命态度来参与辯論。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唯一能够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科学标准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只有它的分析才能看出斯大林主义的现象

是一个可以用苏联社会的矛盾来解释的社会现象。

《真理报》的社論只同那些认为“苏联的蜕化变质”意味着在那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人論战，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論据不难駁倒。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人們根据十月革命所推行的新的生产方式，来解释苏联已經发生的那种同热月反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間的做法一样的政治上的反革命，那么，苏联的官僚阶层除非承认这是恢复旧制度的行动，就不大容易把他們駁倒了。相反地，《真理报》的社論作者却断言单独一个人无法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承认：对于千千万万人的暗杀，对于所有布尔什維克老近卫軍的清洗、对于紅軍领导人員的清洗、种种使苏联受到可怕損害的事件、种种具有社会规模的事件（从而表现出社会的矛盾），不过是莫名其妙地发生的“个人迷信”的结果，不过是“值得遺憾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极端的蜕化变质、其性质已經昭然若揭的一种蜕化变质的产物呢？

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苏联政权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分析，将越来越引起人們的兴趣，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工人国家和苏联本身的内部找到越来越多的共鳴。这将是我們对于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討論的主要貢獻，这个貢獻将有力地反对关于共产主义原則的任何修正主义和失敗主义的傾向，保持全部馬克思列宁主义遺產的完整，并給予现阶段在工人国家中提出的所有那些問題以一个原則性的和富有政治內容的答复。

## V

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国家”的思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如磐石”的思想——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已經提高到教条水平的两

种显然是修正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现在已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变化。它们已经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愈来愈迅速的和混乱的分化，引起了离心倾向的发展；只要人们还经常否认党和国家之间应该有所区别和差别，这些离心倾向就要冒一种使工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遭到威胁的危险。在缺乏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的情况下，由于所保持的结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的爆发——这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是绝对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会迅速地造成统一行动的破裂。由于缺乏健康的内部生活，由于各种不同倾向享受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这种讨论结果只会造成各国官僚阶层之间、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对立，而每一个官僚阶层则竭力宣扬它自己党内“坚如磐石”的神话。虽然现在的一些思潮似乎在规模上是国际性的，并且所有重要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乏这些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窒息各国党内的一切少数派，并使必要的国际讨论呈现出国与国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争吵的有害的和危险的局面。只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肯彻底地和老老实实在地恢复实行列宁主义的原则，这种局势就只会加剧。这些列宁主义的原则包括：

1) 废除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代之以包含组织各种倾向的权利在内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重新规定完全的讨论自由；重新规定各国共产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除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开辟公开讨论栏以外，定期出版内部通报，以便按时展开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真正的讨论。

2)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过去和现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组织一次国际性的讨论。让一向被排斥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之外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特别是首先谴责斯大林的罪行的第四国际有

組織地參加這個討論。在蘇聯和各個工人國家出版蘇聯國內的對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左派對派以及布哈林的對派的一切材料和綱領，並在各國共產黨內部傳播。

3) 準備召開一次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代表大會，以便為重新組成一個以民主集中制和無產階級民主制為原則的共產國際打下基礎；各國黨和各個共產主義派系無一例外地均可參加這個世界代表大會。

4) 承認在各國共產黨的任務和義務之間存在着明確的區別這一原則；在兄弟黨之間進行坦率的公開討論，以便共同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切工人國家之間、特別是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必要的聯盟。拋棄對南斯拉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尔巴尼亞共和國實行經濟制裁的一切歧視性措施。

在為這個綱領進行辯護時，深感其自身責任重大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採取的行動，不是為了保衛狹隘的派系立場，而是為了共產主義、工人國家和整個世界革命的事業。

他們所提出的組織討論和解決世界共產主義危機的建議，是僅有的一些建議，這些建議一方面給予蘇聯的官僚階層和各國的官僚階層以決定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要維護和鞏固工人國家間的團結，加強而不是削弱工人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行動。

## VI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展開的討論的動力，有助於提出一切問題來重新檢查所有的教條和審查斯大林主義政策的各个方面。我們這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可以鼓勵大家進行一次規模盡量大的、盡量廣泛的討論，這種討論不可動搖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

为基础，使任何疑問、任何奥秘、任何問題都不致在“爆炸性太强”因而不宜討論这一借口下得不到探討。全世界几代年輕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革命是没有什么东西要隱瞞他們的。

这次討論将提出共产主义政治的一切基本問題。它将由于这个事实而大大地超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間的辯論、赫魯晓夫集团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間的辯論，因为这些辯論比較帶有危机的性质，內容也比較偏于共产主义綱領的一个特定范围。所以，虽然并不排斥主要在各国共产党本身内部有可能結成策略性同盟以便在某些具体問題上取得优势，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却首先是在这次辯論中拿出他們自己的对于一切有爭論的問題的綱領性解决办法。

他們所以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目前各种思潮在意識形态上的多样性，这些思潮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界限，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把对某些問題的非常进步的观点同对另一些問題的保守的和落后的观点混合在一起。說得更精确些，今天苏联官僚阶层和中国官僚阶层所以对非斯大林化問題抱有相反的看法，是由于这两个官僚阶层所遭到的压力不同，正如中国的官僚阶层关于殖民地革命抱有一种比較进步的看法一样。中国的官僚阶层特別受到这种革命的压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它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在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严重紧张局面的恶化的客观情形中間接地體驗到的，这些形势的性质不可能鼓励一个官僚阶层走上非斯大林化的道路。

相反地，赫魯晓夫却受到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大的压力，这个无产阶级在人数和資格方面占世界第二位，在一般文化和政治水平上无疑地占世界第一位，它的全部力量在这位苏联领导

人被迫作出让步时把他推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1) 关于赫魯晓夫派，我們要批判地支持它实行非斯大林化以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但同时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应当公布全部事实真相；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加以揭发；必須从托洛茨基本人起，全部地公开恢复受害人的名誉，不让留下一件悬案。与此同时，我們决定对这一流派进行革命的批判，譴責苏联国内的权力和特权，保卫苏联国内反官僚主义政治革命的全盘綱領（成立工人委员会，重新建立并扩大一个真正的苏維埃政权，承认种种苏維埃政党有存在的权利，以民主方式改組計划工作，规定党员薪金的最高限額，等等）。我們也必須对那来自赫魯晓夫集团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孟什維克調和主义政策繼續进行革命的批判。我們必須繼續以革命的态度批判赫魯晓夫的策略，因为他的策略以虛妄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并不是沒有冒险主义的搖摆不定——在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斗争中沒有強調要动員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并且归根到底是沒有強調要在資本主义的主要根据地推翻資本主义。

2) 关于毛澤东派，我們像过去一样給予批判的支持，因为它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抱着比較激烈的态度，因为它真正地支援正在进行的革命（阿尔及利亚、老撾），特别是因为它抛弃斯大林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阶段論”的整个观点，根据經驗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不断革命的理論。同时，我們也保持革命的批判态度，反对它不可容忍地和无原則地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辯护，而且那种制度同中国共产党本身在1956—1957年所采取的某些立場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批評它在中国制度中的一些显著的官僚主义，我們要求它坦率地和充分地恢复无产阶级民主，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制度，以及在該党党内恢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內部所爭辯的一切問題的普遍而自由的討論。我們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减少对华經濟援助这一不可容忍的政策之公正批評(1960—1961年,这两个国家之間的貿易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同时也批評“大跃进”的过分急促的节奏,要求它根据最近两年的困难情况,以列宁主义的精神和用民主的方式批判地检查目前的經濟方針,检查中国人民在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道路上能够忍受多大牺牲这一整个問題。

3)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我們像过去一样,在有关工人委员会以及一般經濟的比較民主的管理問題上給予批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批評該党的明显的官僚主义化、它的外交政策的机会主义、它对殖民地革命特别是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并且也要求該党恢复列宁主义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方法,根据那种承认各个派系和苏維埃政党有存在权利的真正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来組織一个不折不扣的苏維埃国家。

4) 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只要它提倡非斯大林化,在取得政权后确实使各党各派的权利合法化,我們就支持它的某些在客观上起积极作用的立場,另一方面則有力地批評它在國內政策問題上所表现的机会主义,批評它未能指出一条现代意大利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完全拒絕它的“多中心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我們所主张的則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基础的共产国际。

5) 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苏联的莫洛托夫集团,我們一方面抨击这些流派的极端官僚主义的性质,因为他们已經犯过官僚主义的罪行,或者可以說他們在阿尔巴尼亚还在犯着这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他們公布他們的文件和綱領——特别是莫洛托夫写給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那封信——并提交国际討論。我們现在反对并

將繼續反對以行政手段排斥這一流派的做法，正如我們反對以這種手段排斥工人運動中的任何一種流派一樣。我們現在反對並將繼續反對任何外國進行政治—軍事的干涉來決定恩維爾·霍查集團的命運。他的遭受排斥，只能由阿爾巴尼亞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本身的迫切而必要的反官僚主義政治革命來實現。

我們必須在國際範圍內到處盡量廣泛地宣傳一個共產黨對任何具體問題所採取的正確立場，以便推進斯大林主義危機的總的發展。我們必須到處保衛列寧主義原則，以便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列寧主義的最有原則性的、最負責的、唯一的繼承人，是能夠全面解決現階段國際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問題的唯一流派。

## VII

我們對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討論以及斯大林主義危機的干預，必須根據每一國家的條件、根據共產主義運動是否已經着手討論以及討論已經達到什麼程度等情況，把注意力特別集中在問題的特定的方面。

一般說來，恢復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名譽，糾正歷次莫斯科審判，恢復國家政治保安部在蘇聯境外暗殺的一切受害人（安德烈·寧、列夫·塞多夫、伊納斯·雷斯、魯道夫·克萊門特、艾爾文·沃爾夫以及在西班牙的許多受害人）的名譽——這一切已經在我們插手干預的第一個方面佔據最重要的地位。它們在法共或英共這樣一些共產黨內將繼續起重要的作用，因為這些共產黨還沒有明確地承認有必要“依法恢復名譽”，雖然意共實際上已經這樣做了。可是意共的明確承認並不能代替一次法院的重審或一次正式的關於恢復名譽的宣告。

然而，随着討論的展开，比較帶有根本性的意識形态問題和比較清楚的政治問題将超过我們干預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些問題显然有以下几种：

1) 以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个人迷信”、即苏联官僚阶层的蜕化变质，并討論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自 1923 年以来所坚持的政治立場。

2) 具体规定关于殖民地革命(为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在殖民地革命中(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

3) 具体规定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以及对那向人类前途投下阴影的核武器的特殊威胁进行斗争的列宁主义政策。

4) 根据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客观形势以及对它們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形势的正确分析，规定推翻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

5) 保卫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保卫我們关于以各国共产党为一方、以各工人国家为另一方的关系的列宁主义看法。

6) 重新确立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組織派系的自由。

7) 保卫我們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斯大林的衰落》这一文件中概括說明的在工人国家重新确立和扩大苏維埃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綱領。

国际書記处号召第四国际的一切支部、全世界的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爭取继承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的战斗中，在这革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以无上的勇气、热心和热誠进行活动。我們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大的可能来取得我們思想的胜利，巩固我們的各种組織，把这些組織同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先鋒队、同一些庞大的工人先鋒队联合起来。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

須堅決地參加到運動中去，以便有效地利用這些機會。他們應當為 1962 年的一次體現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革命大團結的大規模世界代表大會作好準備，因為這次代表大會對於正在提出一些問題而只有從第四國際才能得到有條有理的、令人滿意的和革命的答案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千千萬萬共產主義戰士來說，是一個真正能夠吸引人們的興趣的中心。

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

1961 年 12 月 5 日

## 八、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 建立纪念碑

——《第四国际》（法文版）1961年11月号社論

“（苏联的政治）革命将要打开所有全部的秘密档案，平反一切审判，替受辱者恢复名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刽子手将永被咒罵。做为革命的掘墓人和历史上最阴森可怕的形象的斯大林由于他的罪孽深重将消失于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所說的話，当时正是基洛夫被害引起的莫斯科审判案阴谋达到顶峰的时候。

苏共二十二大决定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竖立纪念碑并决定把斯大林驅逐出紅場陵墓，这表明苏联社会中正在成熟的东西。这还不是托洛茨基所宣称的那种政治革命，但它是这种革命的征兆之一，它表明这种革命的动力已开始在这个三十多年来已不再懂得什么是政治生活的国家中有了某种政治上的表现。

我們虽然还未掌握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但已可肯定：这次代表大会表现赫魯晓夫这几年来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已經用完，他企图把苏联社会中上升的力量做一次有利于自己的整頓的新尝试。在二十大时，他是在一次秘密的会议上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并強調不要把事情泄露出来和家丑不可外揚。但是家丑是太丑了，而家丑又太大了，以至到二十二大时，他不得不把事情公諸于全世界。这个人并非是为原則理由而行事，而是受到环境和自己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所触动，使他去进行巨大的賭注。

在苏联，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虽然当前有许多缺点，但物质方面的前景是实际改善的前景。另一方面，专制和恐怖是消失了。但是苏联社会还有其他需求，它从未有过政治制定权，始终还不懂得苏维埃的民主。这就是官僚政权将要在这上面摔跤的一个问题。

几个月前，当赫鲁晓夫的领导机构开始筹备代表大会时，它曾把重点放在《纲领草案》上，该草案实质上向苏联人说：二十年后你们将生活在幸福之中，只要你们把官僚政权交给我们（关于加强党的那一章特别有这种意思）。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领导机构就不得不改变方向了。筹备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通过一些揭发事件（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我们已看到的那种局势，迫使领导机构不去谈二十年后的幸福了，而去谈其他问题。《纲领草案》合理地提出“个人迷信”的问题，但是对斯大林的过去却保持了沉默。在代表大会上，二十年后的事情很少有人谈及，而二十年前的事情却占了大会讨论的统治地位。

为什么会如此呢？不是苏联人不关心未来的远景，而是更被当前的问题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在历史上不会重演了，但仍有急迫的现实意义：要继续前进，就要把使每个家庭都经受过恐怖的过去清洗干净。再者，官僚主义政权——过去的遗产——即使不再犯过去的罪行，仍继续大大妨碍着苏联社会的呼吸。1938年托洛茨基为苏联所写的行动纲领中就谈到公开重新审查反动官僚机构制造的政治案件。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证明，揭发斯大林罪行是鼓舞苏联社会的头号政治问题。赫鲁晓夫看到了这一政治方向，并为了从中吸取好处，他就重新展开并加以扩大他五年前进行过的阴谋。赫鲁晓夫在追述开除“反党集团”次日和卡冈诺维奇的电话谈话时，向苏联人民说，我们不会再像斯

大林时期那样办事。但是不再犯罪的诺言远未成为一种政策，也不能使那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与赫鲁晓夫有政治分歧的人感到满足。

\* \* \*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领导不再从肉体上来消灭人，可是它还保留着斯大林时代一整套方法的遗产，特别是这方面的艺术：混淆政治问题，捏造在政治问题上的讨论。

很显然，在苏共党内，在苏共领导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之间都存在有分歧。和赫鲁晓夫领导有意见分歧的人并不都属于同一倾向，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此外，除阿尔巴尼亚人以外，很少有人能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不但没有让每人用自己的论点说明各自的立场，在讨论中保证使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阐明，而它做了什么呢？它采用斯大林所喜爱的把问题混淆一团的方法，把一切反对者和所有的观点混搅一团，使人只能知道一些严加挑选的立场的残余，而且把所有的一切都扣上一个共同的称号——一个对赫鲁晓夫最方便的称号：“个人迷信”。在政治讨论方面，官僚主义的黑夜虽然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浓厚，但是昏暗仍是严重的。可是，政治生活开始在苏联恢复它的权利，磐石般的团结一致和盲从主义已死亡了，从今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再使它复苏。

对磐石般一致的最严重的打击是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的公开化。不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扰乱赫鲁晓夫昼夜不宁，如果赫鲁晓夫决定公开提出阿领导人的事情，那是他别有所指，更明确地说，是指的中国人。我们记得，去年召开的八十一个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会议实际并未解决政治上的分歧问题，会议对于不同意见制定了一种协议，商定不要把分歧搬到大庭广众中去，而采取关门讨

論的方式。从这以后，虽然分歧意见偶然也出现，但大家仍沿守着休战的諾言，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以外。这个党的領導形成一种家族形式，采用着堪称斯大林式的和前巴尔干暴君式的方法，它以一些与中共所維護的立場很少有关的理由来支持中国共产党。赫魯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攻击是企图迫使中国人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处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周恩来避免从政治上維護阿尔巴尼亚人，但他用了相当激烈的詞句指責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的攻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徒然——受到惊动的官僚主义者是害怕在工人国家和有力的共产党之間进行一場会摆脱官僚領導机构控制的公开討論的。

中苏之間存在的分歧——从 1960 年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出来——在代表大会上既未得到闡明，也未进行討論。除了对霍查集团的攻击引起的事件外，1960 年八十一一个党會議所締結的休战虽在形式上沒有破裂，但受到严厉的打击，以至要在二十二大之际立即趁热召集一次各国共产党領導會議成为不可能。周恩来向斯大林遺体的獻花——这是他可能在莫斯科进行的最后一次拜謁——和中国总理在閉会前就动身回国，都表明分歧的跃进程度。即便這場斗争不至声势浩大地公开进行，也必然首先在各领导机构中加剧，客观条件将供广大的共产党群众都知道已发生的爭論，他們都通过对斯大林的新貶黜和所进行的真正揭发而觉醒了。

此外我們还可指出，人們对莫洛托夫就《綱領草案》致中央委员会信件进行的指責中，还指責了企图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混水中摸魚。

这封信的存在是超过了写信人个人的意义。事实上，从 1927 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和所有左派反对派以及譴責他們只能作为非法形式出現的



在討論中，人們提出“結束无产階級專政的問題”，在這個問題後面，表現出保守主義傾向和擴大個人權利的傾向，要求使這種權利得到合法的和組織上的保證。

但是，這些問題通過幾十年來都未見過的一系列的示威遊行而具有了它全部的意義。我們在本刊第 13 期已經談到今年夏天敖德薩的罷工，這次罷工不是由於經濟要求，而是為了保衛猶太工人同他們在國外的雙親通信的權利。人們也看見了一位叫葉甫圖申科的青年詩人攻擊至少是受當局容忍的反猶太主義，其次，人們在莫斯科看到第一次爆發的自發性的示威遊行。首先上街的是殖民地國家的大學生，他們終於戰勝了警察的禁令。然後，蘇聯大學生也反對軍官們企圖阻止“和平遊行”表示他們的意見。最後這次重要的示威遊行終於於十月初一個富有詩意的日子，在馬雅可夫斯基的塑像前爆發了。詩人葉甫圖申科在五千人面前和軍官們衝突，他能在那裡宣讀了一首詩來反對“那些走狗們，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不是蘇聯政權，而是壽命不長的政權”。反對官僚主義、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在這種把這些詩變成了反對政權的第一批宣言的條件下表現了出來。在莫斯科的大學和各工廠里要求驅逐斯大林屍體的示威似乎也是自發的並強使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古塔德在人道報上寫道：建議也許不是人們所期待的”。

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被提出來，在有一點上赫魯曉夫完全像在二十大時一樣只字不提，就是斯大林不僅犯了反蘇聯共產黨人的罪行，而且犯了反其他國家共產黨人和反工人運動中其他傾向的黨員的罪行：西班牙人、德國人、波蘭人和其他國家人。赫魯曉夫不談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他像斯大林一樣，放棄革命鬥爭，放棄世界革命，只想到蘇聯的經濟建設，而為了達到這點，他會像斯大林一樣準備犧牲革命。二者在這一點上唯一的不同，就是當前的環

境远不如过去有利。

\* \* \*

二十二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企图从他的阴谋中获得利益，这一阴谋旨在投身在这一潮流之中：使自己成为这一潮流的首脑，从而加强一种公民投票式的权力，并依靠广大群众来反对一切的反对派。这一阴谋可能在落后的，没有政治头脑的群众中获得暂时的、立竿见影的成效，对于这些群众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被看成是一个敢于驱逐斯大林的人物，但是对于苏联社会中有政治性和先进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少——来说，赫鲁晓夫是正在给自己拆台。首先，赫鲁晓夫特别不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他进入政治局只是在莫斯科案件后和叶若夫时期结束时才进入的，很显然，特别是由于他在乌克兰的镇压行动才使得他得以身跃高职。此外，用个人迷信来“解释”一切必然使人有这样的渴求：是什么东西使个人迷信建立起来？其次，对真相的揭露不能半途而止，年青的一代要了解全部真相。赫鲁晓夫权威下写出的“历史”，只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再者，赫鲁晓夫由于他大胆赌博的心理状态，正冒着反过来打着自己的危险。所以他毫不迟疑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阿尔巴尼亚群众终将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得多么好听，在苏联不止有一只耳朵要记住这些话。

如果赫鲁晓夫希望在苏联本身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相反，完全不可避免的是：在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内到处只能看到领导机构、党的基层和追随这些党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恶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可能同时做出一切贡献。这些领导无法替赫鲁晓夫这些人进行的镇压辩护：说他们是无知的，甚至害怕这样做。他们今天揭露霍查对阿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可是为什么过去当斯大

林处决列宁时代的党的领袖时，他们也欢呼该死呢？今天成千上万的被他们的领导引入歧途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样的处境呢？他们今天应该向自己的工作同志们交代过去为斯大林搜集礼品的事，以及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那些被他们的领导灌輸对自己的阶级同志具有优越感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处境困窘。他们不能不要求向这些领导算賬。无须预言即将展开的危机的新阶段的形式和速度，毫无疑问，领导机构要阻挡这一危机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危机将触及各国共产党人。而且危机是从最大的混乱中开始的。面对着共产主义世界互相对峙的各种洪流（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以及第四国际的），经过多少年来的虛假的思想一致之后，有多少人将提出问题：真理究竟何在？

我们要向共产党战士们說，不要等待着人们会把真理带来，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它。

必须要求了解过去全部不加修飾的真相。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件“家庭事务”。必须要求成立一个包括第四国际在内的，能代表工人运动中的各有資格的組織和派别的国际調查委员会。

关于未来的真理，必须强制进行一次公开的、国际性的討論来寻求它，就一切主要的問題，在所有要求共产主义根本原則的各种派别的参与下展开这场討論。

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曾在三十多年的時間中被斯大林主义所統治着。事件表明：正如我們的运动不断在理論上所闡明地那样，这只是历史上一段暫时的畸形状态，不是历史的持久产物。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医治这个几乎由于它而致命的肿瘤。医好这个病要求所有共产党人参加，他们必须从依靠这个令人惊恐的經

驗所丰富的理論和政治教益中吸取全部的教訓，以確保共產主義的全部革新。

只有這樣，他們才將能克服目前的混亂。這樣他們才將能通過重建共產主義運動初期所具有的，像群眾性的第四國際那種形式的光榮的共產國際，來實現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真正的團結。如果說在莫斯科為紀念為斯大林扼殺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和共產黨國際而樹立紀念碑是正當的，那麼最美的紀念碑將是為斯大林主義時代的受害者樹立的紀念碑，正是這個共產國際，將把對他們的紀念融化到爭取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去。

## 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危机

——第四国际委员会 1961 年  
11 月的声明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僚政治领袖们被迫依然又回到“个人迷信”的题目及其后果上面去了。大会的决议和讨论把赫鲁晓夫在 1956 年所秘密揭露的东西公开出来了。从 1956 年以来，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领袖们一直把这个“秘密演讲”以及更重要的，它的政治内容置之不理，企图这样来欺骗历史。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把 1956 年后发生的政治问题压制下去，并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坚持将关于“迷信”的真相揭发出来，这将以甚至更大的紧张程度重新引起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于 1956—1957 年所遭受的危机。所有那些争辩说“这类事情不应该谈”或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人，将被千百万下层共产党员所排斥。

\* \* \*

从代表大会的报告看来，显然有巨大的压力从下面而来，要求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加以清算。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皮里顿诺夫提出对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纪律处分，以及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决议。纺织工业的一位代表叙述了当清洗时期卡冈诺维奇到她那个地区去时的恐怖情形，描写出党的无数领导干部失踪的情况，并说她和她的同志们仍然把那时期看为“黑色的

旋风”。另一位代表談到 1935—1937 年鎮压时馬林科夫同叶若夫在一起的工作。

\*             \*             \*

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将提出下列的問題，并要求一个答复，这是絲毫沒有疑問的了：“在那些年头里赫魯晓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赫魯晓夫不是用了同样的传统来鎮压匈牙利革命嗎？”“能够把对过去的处理就这样交給赫魯晓夫和他的合作者嗎？”

从事实說来，现在各国共产党应当討論过去由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以及后来由第四国际提出的一切政治問題。赫魯晓夫被迫开始的这个过程，是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完成的。目前克里姆林宮集团有什么权利配称为国际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是被挑选的以及在斗爭和牺牲中經過鍛炼的領導人嗎？他們的政治路綫和他們的革命决心有經過一个世代以上活生生的运动所考驗嗎？相反地，在过去三十年的政治斗爭中，他們所能够为自己辯护的話是：“我們生存下来了。”

在苏联反对斯大林統治的真正反对派，已經被一种苦刑折磨和肉体消灭的制度所清算了，这种制度完全被一种弄得很完善的法庭謀杀的程序所掩盖着。现在的領導人是由于在这些鎮压事件中保持緘默和积极合作而获得他們的地位的。一个新的領導将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战略上产生，而首要的是答复“二十二大”的“泄露”所提出的政治問題。

\*             \*             \*

关于 1934 年基洛夫被刺事件，赫魯晓夫說：“我們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材料，产生的問題就越多。”沿着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演說的路綫，他接着答应进行一次充分的調查。我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調查一直沒有完成，因为妨碍这个調查的“反党集

团”已經在四年前被打敗了。

即使根据能够得到的材料，赫魯晓夫說明这一次被利用来实行以托洛茨基为主要被告的巨大清洗审判的行刺事件，是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积极合作之下进行的。各个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馬上产生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謀杀行动？”现在需要完全揭露斯大林需要这样一个行动的政治原因，这一个行动是为清算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所首先需要的。

\* \* \*

大会的代表們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說明了清洗事件的可怕的程度，以及整个革命世代被破坏的情况。赫魯晓夫不能够說出造成这样的政治原因，他也不能够完成对基洛夫事件的調查，因为如果这样，就会立刻說明了在历史上，他在那个官僚反革命集团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个集团只有在三十年代摧毁了反对派，才能維持它的統治。

托洛茨基派对革命历史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經为官僚政治本身目前的危机所充分辨明。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坚持苏联的现代建設工作，但是代表大会的巨大关心的事情是追究布尔什維克运动历史的真相。

\* \* \*

赫魯晓夫揭开了基洛夫問題，也就揭开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問題，不管他多么想把这个进程遏止。所有对斯大林的罪行作“历史的辯护”的一切論調都已破产了。赫魯晓夫为了确定历史事实而提出的口实将不能使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們和青年們感到滿意。

赫魯晓夫說，真相之所以需要弄清，是为了使事件不致重演。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为未来作准备的

唯一方法是了解在俄国的工人政权和党变质的政治原因。在这个分析当中，赫魯晓夫的“和平竞赛”的战略，将被公开揭露为“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思想的继续。

\* \* \*

科兹洛夫对讨论的回答表明，对党的章程提出的修正案曾经要求恢复 1921 年以前民主的党内制度。在那一年实施的对派系的禁止，是由于内战引起的破坏情况的一个特殊的反响，而绝不是被看作党的生活的一个永久的特点。

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党集团”在代表大会上受到谴责，而没有传阅过他们的任何政策文件，而且这种谴责是在官僚机构把事情处理后进行的。当共产党员新的一代一旦开始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传统时，他们将不能容忍这样一些方法。

\* \* \*

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参加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它领导着苏联工人阶级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度，并在反帝斗争中恢复它同国际工人阶级的关系上的一个适当位置。只有彻底击败赫魯晓夫和他的党羽，才能够为此准备好道路。

必须对过去进行一次政治清算。赫魯晓夫和他的官僚政治不能实行这一点，只有在反对官僚政治的斗争中，不断地反对它的机会主义作法，才能把这实现。

赫魯晓夫的目的旨在说服俄国人民：工业化的好处和从警察制度下“解放”出来，将给他们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而这是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

第四国际必须拥护苏联工人阶级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以反对赫魯晓夫的派系。像“反党集团”一样，这一派系事实上

不能够解决由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时代所提出的問題。

在确定斯大林主义历史的真相时，也还必须弄清楚有关国际共产党人的命运的事实：把德国共产党人雷姆梅勒和紐曼交给希特勒，把匈牙利领袖貝拉·孔恩处决，以及在 1938 年把波兰党全部领导处决。

\* \* \*

两年前，鉄托要求恢复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被处决的二百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名誉。这个要求从来没有被接受。但是这将引起关于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在欧洲和中国背叛革命，关于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血腥統治，以及关于战后向“西方民主”投降的整个問題。这又一次說明了，只有对过去作一次彻底的分析，才能准备好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革新。

国际委员会完全支持已故的列昂·托洛茨基的寡妇娜塔利亚·塞多瓦·托洛茨基的要求，即立刻进行一次关于她的丈夫被审判和被謀杀事件的公开調查。我們要求立即恢复她的苏联公民权利。

\* \* \*

赫魯晓夫想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他說他是用“思想上”的方法来处理“反党集团”。事实上在党内沒有进行过任何討論。当反对是来自“左派”的时候，如在匈牙利，他所用的方法就不是“思想上”的了。

赫魯晓夫在代表大会結束时請求代表們不要制造新的“个人迷信”，这是同领导方面的实际情况直接冲突的，事实上赫魯晓夫是免受批評的，而他是唯一可以指揮对別人提出批評的人。

这个危机只有在受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思想领导的力量自觉的政治行动下才能获得解决。赫魯晓夫的“揭露”是由下面来的巨大压力的反响，这种巨大压力要求恢复苏維埃民主以符合苏联工

人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回到真正的國際主義上去。

\* \* \*

列寧格勒黨委書記在代表大會上說，歷史問題現在正在“以更大的堅持性”提出來了。這一進程必須貫徹下去，同時將遭到赫魯曉夫和其他官僚的抵抗。下層共產黨員已經好幾十年僅僅受到機會主義方法的教育，現在很需要領導。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反對一切關於國際運動改革過程是無可避免的和自動到來的理論。它需要在每個國家，當然包括蘇聯，建立第四國際的支部。這將為從政治上推翻蘇聯的官僚機構準備道路。官僚機構對下層的巨大反對運動的絕望反抗，使我們對推翻官僚主義的力量具有充分信心。

\* \* \*

在每一個國家內，我們將同所有爭取真正了解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及為其復興而努力的共產黨員一起工作。在每個地方我們將要求徹底調查對托洛茨基及其他一切反對派分子的審判和暗殺事件。托洛茨基本人於 1935 年就基洛夫被刺事件所作的判斷，在今天仍然是正確的：

“唯一的出路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革新。這一問題只能在國際範圍內解決。為了使俄國的工人拒絕“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鴉片，並一同轉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團結在列寧主義的黨的旗幟下。除了比過去更加不妥協地進行反修正主義的鬥爭以外，還必須進行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政治對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癱瘓和敗壞作用的鬥爭。沒有為**第四國際**而鬥爭，對蘇聯的保衛是不可想像的。”

1961 年 11 月 5 日

（譯自英國托派刊物《新聞通訊》1961 年 11 月 18 日）

## 十、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 給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書記的信

(1961年11月)

先生：

作为已故的托洛茨基的政治拥护者，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盟員們对于赫魯晓夫10月27日的发言有着极大的兴趣。赫魯晓夫先生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事件。

他說：“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能真正弄清他的死亡是誰的罪过。我們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的問題就越多。”

1936年8月，当时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塞道夫，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維克党前领导人一道被控阴谋暗杀了基洛夫。被告們在被拘留时“供认了”一切罪状，并在审讯之后立即处决。

赫魯晓夫还說明了当时是如何从无辜的人們的嘴中逼出供詞来的。1936年审讯以后，就发动了一个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誹謗运动。他被控与包括希特勒在內的苏联的敌人共謀推翻工人国家。

现在这些卑鄙的指責已在全世界面前証明是毫无根据的，我們要求公布关于几次审判的全部真相，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在建設苏維埃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澄清这些人的革命

历史。

托洛茨基和塞道夫两人在亡命国外的时候被暗杀了。正如托洛茨基的寡妇已经提出要求的，必须调查这些暗杀案的始末以及斯大林在已经揭露的组织这些暗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她的苏联公民权。

在1954年审判法西斯战争罪犯期间，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经要求持有希特勒政府档案的纽伦堡法庭，调查这些档案，看有没有关于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所谓“阴谋”的任何暗示。没有进行这种调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提到要公开关于这些审判的真相。六年以后的现在我们还在等待着它的公布。

一直到被暗杀的日子为止，托洛茨基尽管在政治上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他始终坚决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把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的真相公诸于世是国际工人阶级的责任。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继承着托洛茨基的斗争，并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我们认为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进行调查，将会在国际工人阶级的眼光中大大加强苏联的地位。

我们相信你会把这些建议转达给你的政府，并请你尽快地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代表

格·希利(全国书记)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11月11日)

# 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

——巴西《工人陣綫》报 1961 年 11 月下半月号評論

##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继苏共二十二大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証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工人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官僚机构尙未完全失去其控制能力，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异己因素所致，非斯大林化已經闊步昂进。

赫魯晓夫想把自己說成是斯大林主义的死对头，揭发斯大林的罪孽(其中的一部分)，为他的受害者敬奉一石紀念碑，更改受到他的威严洗礼过的城市名称，搗毁他的塑像，并把他的遗体从紅場陵墓中搬走。

显而易见，赫魯晓夫这样搞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屈于苏維埃社会的压力。

然而，赫魯晓夫采取这些措施真是攻击斯大林主义嗎？斯大林主义又是什么呢？

赫魯晓夫对“个人迷信”的解释一点也站不住脚。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反对这种解释。斯大林罪孽之深重和当前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广闊，要求从苏联生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中进行解释。

斯大林主义并非斯大林罪孽的总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政治体现，是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官僚化。斯大林主义是苏維埃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蜕化。斯大林派曾經領導了反布尔

什維克的政治反革命运动，因而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之后苏維埃官僚机构便独揽政权，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依附于它的利益。

苏維埃国家在政治上是蜕化变质了，然而并未触动工人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苏联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将把政权还给无产阶级，而不侵犯经济结构。

这个革命正在发展中，官僚机构不可能用恩赐改良挡住这个革命。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分子和官僚分子搞的把戏，他们篡夺了劳动者的政权。他们需要烧掉自己的木乃伊，借以苟延残喘。但是，熔化斯大林塑像并没有摧毁斯大林主义，应该推翻苏維埃官僚政权。

### 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土崩瓦解？

斯大林主义孳生于苏联的落后，孳生于内战后苏維埃群众的疲惫，孳生于苏联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孤立状态，是时资本主义在1920—1930年期间取得了稳定，而世界其他地域的群众却节节败退。

这一切条件俱已烟消云散。二十年来一直可以称之为革命发展最高的结晶和中心的苏联官僚机构，如今在殖民地革命日益高涨、新的工人国家不断出现并蒸蒸日上的条件下，实际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证明它反工人国家的保守性，它正在疯狂地挣扎以求在革命的浪潮中苟延残生。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提出了苏維埃官僚机构无可解答的问题。赫鲁晓夫发明了民族民主政府的理论，作为官僚机构对殖民地革命的回答，同时又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赫鲁晓夫妄图将他的理论用于古巴，而布拉斯·罗加却不得不在代表大会上侈

談古巴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从而揭露了他的謊言。赫魯晓夫想貫徹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論,但又无可避免試驗維護这个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五千万吨的炸弹。赫魯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实际是对中国)施尽了一切压力,想重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起磐石般的团结,但是被周恩来責之为沒有共产主义道德,并退出会场,使原打算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归于无望。赫魯晓夫发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綱領”,想以此回击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挑战。在二十二大討論中这份官僚綱領却毫不重要,輕描淡写地通过了。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莫洛托夫的批評,他在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大肆渲染地責备这位总书记的文件是反革命的。

并不是罗加、馬林諾夫斯基、霍查、周恩来或莫洛托夫致斯大林主义于土崩瓦解。他們想永远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依附于莫斯科官僚中心。周恩来献給斯大林陵墓的花圈就有这种象征的涵意。但是,他們的处境迫使他們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并对它提出苏联官僚机构不能答应的要求。人們无法拿民族民主政府这种妥协的理論在殖民地革命中招搖撞騙。人們无法把斯大林式的磐石般主义强加給中国。莫洛托夫不从左的方面对赫魯晓夫进行攻击,他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这些問題已日益紧迫,并压迫着赫魯晓夫,而他又无法对付。

此外,还有苏維埃群众的压力。赫魯晓夫冲击斯大林,借以自卫。他企图借苏联群众对斯大林的憤恨,用以对付来自殖民地革命、中国和軍隊方面的压力。这是一种絕望的、注定要失败的、既沒預測对头,也失去了控制的把戏。

二十二大的进展迫使赫魯晓夫从陵墓中搬走了斯大林尸体。伴随周恩来的挑衅而来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集会。

就在官僚机构内部也还有更激进的反斯大林一派。福尔采娃

和謝列平对斯大林的贖責远远胜过赫魯晓夫。甚至有一位代表建議取消禁止在苏共党内有派系的规定。科茲洛夫无力的反駁表明他沒有自信。搬走斯大林的尸体說明他們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力。

### 北京可能取莫斯科而代之嗎？

面对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危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官僚主义分子的右翼都想迎合赫魯晓夫的口味，然而並沒有自信心（《新方針》周刊只字不登二十二大和新的非斯大林化的材料）。与此同时，官僚分子的另一翼却在喃喃自問，有无可能由北京取代莫斯科。

但是，中国的无可爭辯的威望本质上不同于莫斯科在 1924—1940 年的情形。当时，莫斯科在趋向反动的全世界，代表了革命的唯一巨大成果。保卫苏联和保卫俄国革命可以同脱离其他国家革命的具体可能性提出来。世界工人先鋒队很大一部分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保卫这个唯一的工人国家——可能变形走样，而出现了这样的政治现象：附属于莫斯科的对外政策。

但是，今天就中国而言，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威信不可能同殖民地各国人民爭取各自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斗争分割开来。中国并不是独立于各国具体革命任务的中心。敬仰中国的（各国）共产党人比較不关心毛澤东关于殖民地革命和同資产階級联盟的混乱理論。他們感觉兴趣的是中国的实践經驗、它的灵活性和革命的潜力。

此外，在中国并不曾发生过任何同苏联官僚政治反革命运动相比拟的、将中国式的领导人强加于其他共产党之上的过程。中国这个工人国家虽然在蜕变为官僚化，但并不像苏联那样落入一个特权社会阶层之手，苏联的这个特权阶层正以一种反动的政策为維持其特权而掙扎。中国官僚分子的保守性表现在拒不公开反

对莫斯科的政策。在各国共产党的官僚分子中，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不斯大林化。他们依恋斯大林的形象只是为了阻止更左的倾向和中国群众参与同莫斯科的争辩。

北京是一个同莫斯科对抗的中心，因为它代表了革命的发展。但是，一个革命中心并不能代替莫斯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这个中心应该激发各国共产党内的比较革命的倾向，使他们更密切地联系各有关国家的群众，联系革命任务。这种作用同斯大林上台之后莫斯科的作用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曾经超过这种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无能作到这点。发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局限性本身妨碍了他们这样作。北京的作用在于加速斯大林主义的瓦解，并为各地左派经验共产主义倾向扫清道路。这个新中心将会造成一个具有思想觉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该流派将毫不动摇地号召共产党人重新按照革命的宗旨组织起来，谴责斯大林的反动作用及其根源，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

### 苏联的局势

斯大林主义曾经使苏维埃群众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消极状态。他们如今在经济与文化变革的高潮中，在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下（这种影响直接由莫斯科卢蒙巴大学的学生传送到苏联）表现出独立的反叛精神，在有组织的争辩中表示自己的倾向性，（青年论坛），举行集会（支持刚果和古巴），就文学问题开展热情的交锋（叶甫图申科和毕加索），宣布罢工（敖德萨）。

群众在政治上的复苏深入到了官僚队伍本身。官僚机构正在分化，各派系正在你争我夺。并不只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而是有许多反对派集团。

莫洛托夫隱約地体现了官僚机构内部正在发生的某种现象。莫洛托夫的几封信，并不像赫魯晓夫力图使人信以为真的那样，只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主义的残灰余火，并且正抓住今天的某些問題，借以在死里逃生。莫洛托夫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和平共处的狂热卫士。居然在七十岁的今天，发现了列宁从来都反对和平共处。实际上，莫洛托夫的言談是針對拥护列宁并在苏联内部反对共处的一种有势力的派系，也針對着黨員。

如果說赫魯晓夫不能不承认莫洛托夫责难的危險性，那是因为除了莫洛托夫是一个老牌斯大林分子外，还有許多人抱有同样的立場。赫魯晓夫就莫洛托夫对左派进行攻击，以詆毀左派，但是这暴露出有一个左傾派系正在批評他的綱領，拥护中国人，希望同資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結成联盟并努力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另一方面，福尔采娃沒有重新当选，謝列平調离了保安書記处，都表明赫魯晓夫正两面受敌。

两个表面矛盾的派系实际上都反映了苏維埃群众的斗争。反斯大林主义(是一回事)和左傾(是又一回事)并不矛盾。赫魯晓夫想把它們說成是矛盾的，并将二者对立起来。

同資產階級大多数記者的說法相反，赫魯晓夫的陣地正在迅速地削弱中。赫魯晓夫代表了官僚机构中的中間阶层，他們正在鬼鬼祟祟地既向苏維埃群众又向帝国主义让步。随着時間的发展，他們的步調将更加矛盾百出。他之所以还能苟延其生，是因为他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僚中的最觉悟的灵魂，这些官僚們借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派和軍人在政治上的狹隘性，对付由于群众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表现为有人建議在党内恢复派系的权利)而使他們所处于的危險的虛弱状态。

但是赫魯晓夫集团的势力正在急轉直下，他的威信也越来越成問題。由于苏联群众政治运动的发展，不久的将来，赫魯晓夫主义就要受到譴責。

### 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的解体

(苏联)中心的瓦解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各国的迅速分崩离析。埃及共产党已分成三派。日本、印度、墨西哥、秘魯正在依样发展。在我們巴西已有两个共产党，其他的共产党还会接踵而生。

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团結源于莫斯科的权威。这种权威一旦消失，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无能維持統一。它們实际不知該如何是好。

共产党的官僚們只是因为俯首听命于莫斯科方才爬上领导机构的。他們何曾有什么創造才能或政治见解。各国共产党的基层对莫斯科已不信任。还有什么理由能使他們相信自己的领导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重压，一个日臻坚强的左翼正在所有共产党内分野蛻出。在这场危机中，左傾处于主导之势，只因沒有革命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的干部和由于斯大林的兽性和蜕化，他們才沒有能以团結正从共产党基层涌现出来的新左派的集团。

右翼在失掉莫斯科这根支柱之后，正在倒向資产阶级的立場。他們脱离共产主义队伍，将自己的前途同資产阶级民族主义拌成一团。仍然巴結赫魯晓夫的官僚集权中心实际沒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各国留下的經驗是这种传统，即妥协、迁就資产阶级制度，基于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观念和打击（共产主义）运动内外的革命派。在当前的危机中，由于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倒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革命的高涨，任何置身于斯大林主义这

种传统的派系都无法生存下去。在这斯大林主义从各资本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之时，继续（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前景（尽管方式不同，结构不同，并由另外一些领导集团去进行）是投身于革命的需要，同群众同心同德，并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上来，即揭露并对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展开不调和的思想斗争。

## 前 途

在这革命四面八方取得胜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从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中继续如愿地发展下去，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发展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破产。这种破产也包括了赫鲁晓夫主义，它是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变种。

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路线。

在此，恢复列昂·托洛茨基的名誉起着根本的作用。共产党人应该为争取平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斗争而斗争，这不仅是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学术需要。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体现了不妥协维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官僚化的革命，同时体现了对工人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蜕化过程的理论阐述。红军和第四国际的组织者，这位形象不在莫斯科恢复名誉者名单之列，虽然二十二大摒弃了对他的全部污蔑中伤，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重建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否认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这是不可能的。

群众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再度形成。看看今日的世界就足以认清这一点了。近几天来，革命使事态和历史变革迅步风行，最丰富的想像力也无法理解，这些事变竟是如此的集中。谁固持偏见或奔走捷径，不承认历史事实，谁就无法适应新形势。共产

主义的“革新者”认为可以不必考查近四十年来托洛茨基坚持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不断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胜利、托洛茨基党的发展和攻势、它们同群众精神的溶合，这些正在为彻底的革命共产党人指引道路。

重建革命共产主义(包括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的最捷径在于立即在一切共产主义流派之间，包括托派，开展公开的辩论。列昂·托洛茨基在1924年列宁去世期间曾发起辩论，这场辩论至今还为托派坚持下来，然而托派并没有放弃发展战斗性的积极的经验和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倒台与崩溃决不应使任何人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内也开展这种辩论抱有任何幻想。托洛茨基主义的构成重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基础之一。

## 十二、苏联共产党的新綱領

——厄內斯特·杰尔曼

馬克思主义力求掌握支配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力求把握資本主义社会的邏輯和动力，以便給予工人階級一把进行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的有效工具。只有当人們首先掌握住现实，才能**自觉地**去改变它。

因而，任何自称为馬克思主义的組織的綱領，首先要看它是否能抓住起草該綱領的時代的社会现实。其次要看它提供給无产階級为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理論和实践的武器。

如果我們仅仅停留在这些起碼的議論上，我們就会是些相当低能的馬克思主义者。——一語道破，簡直是些“唯心的”馬克思主义者。一份綱領(根据不同情况)，它是一群人的理論作品(或意識形态的作品)，不管他們所力图达到的觉悟水平是高是低，他們总逃脫不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則的制約。即便他們的視綫銳利地刺透未来的重重浓雾时，他們依然在各个方面是他們时代的俘虏。

共产党宣言至今仍以其作者的大胆令人惊叹不已；可是这些作者还沒能預见到电气时代，原子能甚至未能預见到在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后他們耿耿挂怀的“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共和国，即：經過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和貧农的委员会的共和国所应该采取的具体形式。布尔什維克党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有胆略的党。該党夺取政权之后于1919年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綱領就反映出了这种胆略。但是，就連这份綱領也沒能預见到法西斯

专政和处于孤立中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退化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殖民地的革命而走的弯路，甚至也没能预见到垂死的资本主义竟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工艺上的新的巨大的革命而重新获得了生产力的长足进展。

当我们从这些巨大的理论方面的探讨转到往往因为“恶意的”思想作祟而表现为谨慎地欲言又止的探讨时，摆脱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虽然是千百个有觉悟的无产者的经验和真诚努力的结果，然而距起草之日十年以后，似乎就成为一个已经完全为事变所超过的文件了。哪怕为当时列宁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所起草的同一社会民主党的爱尔弗特纲领，其命运也并不好多少。至于强大的奥地利社会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订立的所谓林茨纲领，就更不在话下，这个纲领（在纸上）预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未出十年，竟然在法西斯主义崛起时，由于深怕“招来”敌人而表现得束手无策，连起码的自卫都不行。

这说明：任何纲领都要从两面去考察它。正面价值也好，反面价值也好，它总保有它自己实在的价值。任何纲领，同时又是人的和起草该纲领的时代的图象——与其说是由于作者的意图，倒不如说是不以作者本意为转移的。赫鲁晓夫准备捍卫的、欲使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纲领草案》也应经受这双重考验：其一为批判性的，其二为解释性的。

### 1、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名副其实的 “共产主义纲领”吗？

《纲领草案》，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现实，给我们提供出

科学的分析了嗎？它向无产者提供出完成其在資本主义世界里的历史使命的必要的武器了嗎？它給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无产者提供出堪与共产主义相称的若干前景了嗎？正是这些涉及綱領的实在价值的問題，使我們得以了解我們面前的是否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綱領”。

### 对于当代資本主义现实缺乏分析

无疑，綱領的这一分析性部分是最薄弱最保守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它也是最易把人引入歧途的一部分。我們似乎可以把它概括成三部分：

1. 无容置疑地正确部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重复从1919年甚至是从1903年綱領中抄来的老的真理而已；

2. 全然錯誤的部分，特别是当《綱領草案》的作者們企图——應該說他們是很小心翼翼地——“革新”和分析当代資本主义的新現象，或者当他們企图使苏联现实合理化的时候；

3. 缺少的部分。就是說当代现实的許多重要方面被忽略，甚至也沒有隱約提到，而起草这份《綱領草案》的奇怪的“馬克思主义者們”沒有对这些部分提出任何解释。我們将来有机会再談。不过为了提醒應該立即指出的是：《綱領草案》既不談斯大林，也不談所謂“个人迷信”的現象；不談自1918年以来开始而又丧失的欧洲革命；不談中国的“人民公社”；不談古巴革命，这个革命是一个由名义上和事实上不是共产党的政党所領導的和推翻資本主义的革命；不談殖民战争向帝国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中无产者們提出的使命（或者說，只用泛泛的无意义的“支持”的詞令）。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发行的《綱領草案》法文版外表上仅有一百五十頁。实际上，它應該有足足的二百五十頁之多，然而这补加的

一百頁都已經揮發淨盡：這些依然是空白的篇章，是釘書的人“忘記”加在這部著作中去了。既然腦力勞動者們已經忘卻了斯大林，那麼“權力均等的體力勞動者們”自然也可以有這樣的小小的遺漏了。

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沒有句句採用和概括引用共產黨宣言或（1903和1919年）布爾什維克老的綱領中的段落而是僅僅滿足於談及一些無關痛癢的平庸的問題，遺留下成百的其他問題懸而未答。

文章肯定二十世紀是一個“生產力驚人增長、科學高漲的世紀”；又肯定“資本主義的腐朽性日益加劇”（人民出版社出版《蘇共二十二大主要文件》第184頁，以下頁數同此）；肯定了“這種腐朽性並不意味着完全停滯和生產力的堵塞，也不排斥資本主義經濟在個別時期在個別國家中的發展”（第184頁）。文章進一步說“整個說來，資本主義日益嚴重地束縛着現代生產力的發展”（第184頁）。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正在加深”（第185頁）。

人們將會承認，這些公式同其他一些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稍微有點修正主義的公式一樣。並不具有特殊的光芒。對於壟斷資本主義，尚沒有人下過的定義——它是壟斷組織把國家掌握在手中，還是國家掌握一部分經濟以利于壟斷組織呢？或者是壟斷組織通過國家的中介來對非壟斷的經濟部門進行監督呢？《草案》使用了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帽子遮蓋了三種相互區別的現象以及其他的現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指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還是指結構上的危機呢？危機是從1914年、1929年，還是1949年才開始日益加深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儘管有這種“（結構上？）的危機的加深”，為什麼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的發生不僅速度加快而且比起1913—1918年的危機嚴重性大大減少，在時間上也大為縮短了呢？這一現象是否為暫時性質的？如果

是，那么如何来解释它，其結局又将是怎样呢？如果不是，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倾向，应该从中得出甚么結論呢？

如何解释下述这一明显的，昭然若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沒有預見的矛盾，十二年来，帝国殖民地的丧失和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陣地的不断削弱，并沒反应为帝国主义国家經濟情况的恶化，而是相反，在（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中，伴随而来的是从二十世紀初，甚至从帝国主义时代初开始的生产力以最快速度的增长。

草案順便魯莽地踢了一下“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荒謬理論。草案說“工人階級的状况相对恶化，有时也絕對恶化”（中文 167 頁）。这一公式是正确的，当时我們曾以此公式同流行于各共产党、尤其是流行于法共和苏共的理論相对峙。但是就在这同一文件中，人們还会找到与此正确定义明显对立的公式。

在第二頁上（第 167 頁），人們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經濟規律，不可避免地造成一支失业大軍。”但是，如果說这支軍隊从前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和大的”，那么絕對貧困化也会是不可避免的和肯定無疑的。只有当人們了解了，在某些时期，失业后备軍趋于减少或不再增加时，人們才会懂得，并沒有任何“絕對貧困化”的“法則”和不可避免性。总之，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特別含混不清和矛盾的段落中，我們原封不动地引述如下：

“对革命的恐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工人运动的压力都迫使資产階級在工資、劳动条件、社会保險方面作出部分的让步。但是日益加剧的物价騰涨和通貨膨脹往往（所以就并非总是。——作者）使这些让步化为烏有。工資落后于工人及其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即或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也是靠掠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各国人民，靠不等价交换、对妇女劳动给予不平等待遇、残酷压迫黑人和外来工人，以及靠提高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维持的。资产阶级所谓“充分就业”的神话已经成了一种不祥的讽刺——工人阶级经常苦于对明天失去信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说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却在恶化。”（第 186 页）

在这段话中只有一句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是关于限制帝国主义国家中工资变化的意义的世界条件。

如果说资产阶级“被迫”在工资上做了“某些让步”，我们能说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在恶化吗？难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劳动者吗？显然，这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平均数”，因为社会现实的矛盾之一正是这样的对照，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或停滞和十五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则为二十年以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充分就业的“资产阶级神话”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讽刺”。当然决非在十五或二十年间在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中都是如此。“生活费用的日益高昂”只有在根本没有增加实际工资的情况下才会使“资产阶级的让步”“化为乌有”。可是，近十多年来，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实际工资的增加是无可非议的。以为承认事实就是在“美化资本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分析的方法。

实际上，抱着《草案》所使用的含混的提法，就是助长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有意在帝国主义国家实际情况上欺骗苏联劳动人民。这同时是可笑的，因为人们向自己提出的目标是“赶上”这一……正在恶化的局势；一个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使命是要解释帝国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真实现象的原因，同时指出提高的局限性，并确定出这种提高到何种地步就必然妨碍或不妨碍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有人会說：批判是容易的。然而，我們的运动有权对斯大林陣营，或对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陣营的假理論家严厉一些。我們的运动并不满足于提出問題；它试图提出答案。如果人們研究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綱領”或者是英国工党新的“原則性声明”；如果人們閱讀一下苏联共产党《綱領草案》，并且把这些文件与第四国际第五和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和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間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主题相同的文件加以比較，人們有权說：如果說第四国际在組織上仍然薄弱的話，那么誰也不会否认今天它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严肃的馬克思主义潮流，它是唯一力图紧紧跟上世界现实发展的潮流，它力图对世界现实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經濟现象給以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解释。

### 对“第三世界”和工人国家的分析更显得貧乏

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客观形势的分析比起对帝国主义国家客观形势的分析更显薄弱和貧乏。草案用一連好几个籠統概念（“亲帝国主义的反对制度”；“封建主义基础”；“民族资产阶级”）要来要去，而毫不对这些概念的經濟和社会內容进行分析。甚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业资产阶级嗎？包括那些业已变成“垄断的”资产阶级在內嗎？如果不是，那么分界綫在那里呢？达达和毕尔拉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嗎？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启发的具体政治运动究竟是些甚么呢？誰希望就这些問題获得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答案——我們仅仅列举了一些最起码的問題：

——可千万不要拿起这份草案。它不会有任何用处。

至于說对工人国家的尤其是对苏联现实的分析，即便重新提到了几个老的真理，但是却仍要特别提上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基本概念只字不提或粗暴地加以修正的罪名。

我們已經讲过，斯大林的名字甚至沒在草案中提到，而且尤其严重的是，整个官僚主义化的现象在草案中未被提及。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份綱領甚至比 1919 年綱領还后退了一步。1919 年綱領在毫无前車之鉴的情况下尚且指出工人国家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苏联近三十年来的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所获得的巨大的——可怕的——經驗被放过，甚至連一般的結論也沒有得出。

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著述中，以及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在 1918 至 1921 年的著述中所捍卫的思想：即公務員和工人之間待遇的差异以及給予专家的优厚待遇，都是腐蝕劳动者的源泉，是国家向官僚主义蜕变的源泉，这种思想已經被“根据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荒謬公式所代替。在分配中，海軍总司令、扮演主角的女演員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員的工作“质量”被人看成比鋼鐵工人或高度熟练的焊接工人的“质量”高出一、二十倍。根据甚么客观的标准呢？按照草案作者們的話來說，根据甚么“严酷的法則”呢？神奇莫测……。

草案肯定了“过去城乡之間的对立……消灭了”（第 10 頁，中文第 173 頁）。不錯，強制的合作化（人們將徒然地在这份綱領草案里寻找一点痕迹，哪怕是譴責它的一点痕迹也沒有）显然不是完全协调的表现。农民反抗強制的合作化并不說明是爱恋城市。他們在大战时的态度是属于同一类的情况。如果城乡之間的任何“对立”都已經确实消失，那么如何来解释赫魯晓夫于 1955 年亲口承认的二十五年来谷物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如何解释赫魯晓夫于

1961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承认的苏联大部地区集体农庄向国家(即向城市)交售的小麦不断地“减少”？

当人们从描绘现实的角度来研究下述的颇为说教气息的段落时，该作何感想呢？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建筑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劳动者通过苏维埃、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的社会组织，积极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参加解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既包括各种政治自由——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包括各种社会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年老以及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障权，一切种族和民族的公民一律平等、以及妇女在国家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它不仅宣告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保障实际行使这些权利(第173—174页，译时参照该作者所引用的文字，与中译本有出入)。

在这寡廉鲜耻的描绘面前，人们顿觉瞠然。也许是草案的作者们在援引不幸的布哈林起草的1936年苏联宪法吧？那么，它正是“纸上谈兵”呢。

但不是，谈的却是“实际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理解得正确的話，全体苏联劳动者都有权组织示威游行(集会自由)抗议在物资供应上的组织不良。他们都有权组织公众集会(集会自由)要求修改实际上限制青年工人进大学的法律，他们都有权组织任何的政治团体(结社自由)，只要遵守苏联宪法。这种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了嗎？三十年来甚至連一次都没发生过吧。这些自由显然只存在于“纸上”，而不是存在于事实中。

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修改党纲的问题时，肯定地说：

“如果說过去保証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別重要，那么現在我們对集会自由的看法是：現在誰也不会来妨碍集会，苏維埃政权只是應該保証給予集会用的大厅。”（列宁全集第 27 卷，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 112 頁）

任何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义的傳統都会朝此方向发展。誰敢肯定今天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呢？当作家和大学生們甚至无权自費出版一些非政治性作品的时候（理由很簡單，因为这些作品不符合某一个官方审查官的口味），能說有出版自由嗎？还說甚么苏維埃政权应把印刷厂交給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全体劳动者、全体公民来掌握呢？

同样的評論也适用于对草案中談到工人国家之間关系的段落的内容。草案的作者們肯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在享有主权和完全自願的基础上、在符合这个体系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 179 頁）。苏联干涉匈牙利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自願”的基础上进行的嗎？匈牙利劳动人民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卓著成效的大罢工来反对这次干涉，而这次罢工是工人委员会領導下的世界工人斗争史上为时最长的一次，苏联军队的代表自己甚至也承认这次工人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他们曾企图与它們进行談判。这次干涉难道不是反对納吉·伊姆雷領導下的这个工人国家的合法的、享有主权的政府嗎？草案的作者們敢不敢說：德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是出于德国居民的“自願”呢？所以必須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綫修建起一道墙以便使东柏林的居民們表现出他們“自願”地同意建立在他們城市里的制度。……

《綱領草案》的作者們，由于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問題上，搜罗了过多的平庸的、老一套的諂言媚語和高度夸张的形容詞，竟

然不自覺地陷入了明顯的矛盾。在第 140 頁上，草案聲稱：

“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條件來消滅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各國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中的懸殊現象……，保證這一切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經濟關係上的平等。”（第 273 頁）

在第 16—17 頁上草案肯定：“在社會主義陣營……誰也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特殊權利和優越地位。”（第 178 頁）

作者們似乎忘記了蘇聯政府於 1956 年 10 月 23 日發表的那份著名的官方聲明，這項聲明承認該原則已長期遭受破壞。但是作者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原則所具有的矛盾性質。

因為，只要有商品交換存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的平等交換都顯然只會對發達的國家構成優惠。“根據世界市場的價格”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一切交換都會使不發達的國家蒙受損失，而有利於發達的國家。實際上，從 1956—1957 年起，蘇聯領導人就默認了這一事實。所以他們才盡力用單方援助（而不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sup>1)</sup>和低息貸款來彌補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但是，為了一個淺顯易懂的理由，《綱領草案》根本沒提到發達的工人國家有義務單方犧牲自己的一部分資源來加速不太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不附加政治條件。

至於指出“脫離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孤立地，單干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它在經濟上是有害的，因為它會導致社會勞動的浪費、生產增長速度的降低……”（第 179 頁）這一點，如果說就籠統和抽象而論是十分正確的話，但當人們考慮到實際情況的時候，不幸，它就不是正確的了。實際情況是，這個“世界大家庭”領導人發生了變化和官僚主義的退化：他們存心於 1948 年從內部驅逐出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他們企圖以卑劣的封鎖來窒息它，隨後，他們又想把它推入資本主義的懷抱；並且，自 1957 年起，

他們打亂了南斯拉夫的計劃性，拒絕履行合同和訂單。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欧洲其他工人国家的生产增长速度。这虽不表明单干的优点，却表明了官僚主义管理的不利和工人委员会管理的优越。

### **缺少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劳动人民革命的任何行动綱領**

《綱領草案》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那部分是以明显的违背真理开始的。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以自己的榜样正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的思想革命化，鼓舞他們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大大地改善这种斗争的条件。”（第 190 頁）

由于这一整段不是专論殖民地革命（殖民地革命問題在另外地方以有点令人惊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标题被談到），所以它是虔诚心愿的典型，也是草案越发用心欺騙的典型。莫里斯·多列士竟厚颜无耻地把它称之为“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厦”，不错，仍是这位多列士，对今天业已冷落的某本《苏联共产党簡史》也有过百倍推崇的提法。說它是一座“大厦”，它的确是这样的一座大厦；它肯定了（毫无限制性条款，毫无保留地）：“胜利的社会主义”，自 1945 年起就影响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西德（即资本主义世界的三亿公民）的劳动人民，使他們具有了“革命行动”。

事实上，各国共产党领导根据他們自己的經驗知道（挪威共产党領袖于立法选举的次日，刚刚公开闡明了这一点）：如果說苏联的存在无可爭辯地在削弱着国际资本主义，并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国际的阶级斗争，那么，苏联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以及对低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条件貼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所鑄成的大錯，則在主观上阻碍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点是十二年来，造成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显著削弱的一部分原因。此外，这种削弱也是由于这些党在第二次大战的翌日的革命关头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錯誤。可是，《綱領草案》既不談这种削弱，也不談其原因。

“階級搏斗不断地(原文如此)震撼着資本主义国家”(中文191頁);“单个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已經无力对抗日益壮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同一頁);“甚至在那些改良主义仍然保持着强大陣地的国家中,工人运动也发生了显著的(原文如此),向左轉的变化”(第192頁);諸如此类的百宝丹方,具有不辯証、教条、徒然的絕對化的特征,对于澄清西方各共产党面临的严重問題毫无帮助。

凡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从事斗争的共产党人都深深知道:不幸,美国并没有被階級斗争“不断地震撼着”;不幸,法国的“反动力量”十分有力地“对抗了”“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力量非但没有日益壮大,而是明显地削弱了;西德工人运动发生的“显著的变化”,不是向左,而是向右轉了。……等等,……

总之,《綱領草案》仍然忠实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新改良主义的論点,而在这方面,它甚至比“八十一个党声明”还后退了一步。它毫无根据地肯定說“甚至在推翻資本主义以前”,工人階級就“能够迫使統治集团停止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把經濟用于和平目的”(第192頁)。这是出现在这里的所謂“和平共处”的論点的最反动的一面,它企图以“强迫”帝国主义資产阶级变成“和平主义者”的斗争来代替推翻資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个反动的烏托邦:說它烏托邦,是因为这一目的不能达到,說它反动,是因为根据这种概念,各国共产党就有妨碍群众斗争(它在不同时期可能超过資本主义范围),限制斗争目标、拒絕給他們

以反资本主义目标的倾向。

这种新改良主义在下述段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它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第 195 页)

自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来也没有维护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非伴有暴力革命或内战等等论点。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的暴力程度只能取决于力量对比和阶级敌人的反抗能力。因此《綱領草案》在这个问题上略显笨拙地提起这些著名的真理是有道理的。可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说来，革命的内容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它依靠工人和贫农选出的民主委员会，使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变成统治阶级，掌握着经济和国家的管理。

既不谈没收资本、又不谈工人委员会或工人会议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显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修正主义观点。作者们大谈什么“思想上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危险(第 197 页)；他们似乎还没觉察到他们自己深深陷在修正主义的泥坑里了。

实际上，这些新改良主义的段落，虽然用折衷的办法，被“多种形式”下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其他的“正统性的引证所间断，只不过是把发生于“人民民主国家”内的事物合理化、理论化而已。仅仅是由于外国的干涉、以及苏联领导人的军事官僚的压力，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才最后得以把“议会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转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也不

是沒有改变“議會”“选举”和“各政党”的概念，使它們成为陪衬性的东西。可是《綱領草案》却偏偏一再笨拙地強調各国共产党并不希望“通过战争”和在“外国的帮助下”夺取政权的思想。历史上至今尚未給我們提供一个本国的共产党沒有外国占领就能通过議會道路而夺得政权的先例。以前，这是共产党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时的最主要的宣传論据。现在，它正在成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反对赫魯晓夫式的新改良主义的鋒利的論据。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任务的整整一章有两个根本的弱点。它沒有描繪出这些国家中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科学的、现实的任何前景；它沒有以任何方式回答这一阶级斗争所提出的关键問題，即把一大部分改良主义思想占上风的劳动者**实际上**引导到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上去的**过渡性要求和过渡性組織形式的問題**。

浮现在該章的唯一“远景”是完全为最近十年所否定的机械的論点即：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国家愈强大，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变化就愈激烈，从而这些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愈强大。

比这一論点还糟糕的是今天主导各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种幻想即：等将来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时候，这一点就会得到証实。这一点也鮮明地保留在《綱領草案》里了(第 149 頁)。但是，它沒有得到任何說明。

业已达到的**绝对**生活水平，对人的思想意識的影响不是比起与外国做比較更为直接嗎？特别是当这一绝对水平已經相当高的时候更是如此。似乎应该說明，是由于什么經濟作用才会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中现已达到的生活水平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可能——或

不可避免地——降低。此外，这一論点根本是解除斗志的。因为它会使帝国主义国家中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后退，把这种斗争的期限放在假設的未来的一点上，可能是距今十五、二十或二十五年以后，甚至是更遥远一些的未来上。

### 一个在殖民地革命中使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瘫痪的战略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人的任务一章的标题本身就頗說明問題：“民族解放运动”。

所以苏联的官僚机构继续死抱着它的两阶段（即所謂“民族解放”阶段和所謂“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相互机械分开的孟什維克观点。这种观点已經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陷于瘫痪，阻碍了它仍在十年来的多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先鋒作用，并且在像埃及和伊拉克之类的国家中，在无耻的投降之后，把它们导致严重的失敗。

“只有始終不渝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用先进的革命理論武装起来的和团结一致的、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党，才能組織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第 176 頁）《綱領草案》肯定了这一点。

在紙上是多么美丽、多么輕松！……然而却有一根魚刺橫梗在草案作者們的喉头上。它叫做古巴。

在那里有过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它控制大部分工会，拥有許多干部，保有悠久传统。在那里曾发生了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可是，对那些喜爱教条和现成公式的人深为不幸的是：发动这次革命的并不是这个共产党；該党阻挠这次革命，甚至当革命胜利时还去破坏它。正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英勇力量，发动了起义，动員了人民进行反巴蒂斯塔独裁的武装斗

爭，推翻了独裁制度，实现了土地改革，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决裂了，并且过渡到全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有化，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顾共产党的反对和不理解。

这一决定性的历史经验，在草案作者的教条里，在“唯有共产党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教条里在隔开“社会主义革命”整整一个阶段的“民族解放”的教条里，都找不到它的位置。

所以《纲领草案》才继续宣扬应把“民族资产阶级”算在内的“一般民主运动”。唯有那些“当地剥削阶级的反动力量”才应该被排除出去(第201页)。草案的作者们进一步明确道：

“民族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在现代条件下，殖民地国家以及过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此，它的进步作用和它参加解决全民族迫切任务的能力还没有发挥净尽。

“但是，随着劳动人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增长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妥协的倾向。

“解放了的国家的发展过程可能是复杂的，包含若干阶段。由于解放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群众的革命创造性会给这些国家沿着社会进步道路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带来许多特点。”(第201页)

可是至今，“沿着社会进步道路”(附带说一句，这是改良主义的古老的公式)真正有所革新的倒不大是“群众的创造性”。这或许是官僚主义者们的凭空的想像吧，他们自八十一党会议时起就牵出一条从来不认识的、没有性别的、非兽非鱼而被称为“民族民主国家”的动物。

根据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論，国家乃是一个階級强制另一階級的机器。“民族民主国家”的特点在它不是任何特定階級的工具，而是一个“爭取充分民族独立、爭取广泛民主、爭取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切进步爱国力量的联盟”的表现。（第203頁）

《綱領草案》的作者們竟然达到在每頁上都自相矛盾的地步。上一頁談的是資本主义經濟对于在解放道路上前进的殖民地人民不利的問題，那么就應該得出下面的結論：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也就是摆脱資本主义剝削的枷鎖。在这种条件下，随着这种革命出現的經濟是以社会主义化为基础的經濟（如古巴）；出现在我們面前的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民族革命，便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不是“民族民主国家”。

现在讓我們来举出相反的假設。假設我們承认“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殖民地国家的范围而言是指原封不动地保持“本国”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階級依然是有产階級。可是，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論教导我們：国家乃是有产階級的統治工具。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并非是一个“民族民主国家”，不管它是多么的民主，它还是一个资产階級国家，列宁也教导我們說：即便是最民主的资产階級共和国，也不过是被掩盖起来的资产階級专政而已。难道这一点不适用于殖民地国家嗎？

《綱領草案》的作者們讓我們在两种修正主义中間进行选择：或是，假設不建立工人国家就可能消灭資本主义經濟；或是：假設不消灭資本主义經濟就可能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到底”。人們或許能在这两种修正主义中进行选择，每个人将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即或在這種令人痛苦的选择之后，人們依然不会找到“民族民主国家”的痕迹。

当人們把这群修正主义式的革新的卫士們赶进他們最后的壕沟里、提出下列問題，“那么就請你們給我們举出民族民主国家的范例”的时候，他仍不举伊拉克，也不举加納，因为这两个国家无疑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甚而也不举几内亚。他們举……，举出了古巴，也就是說举出了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外国和本国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已經完全被沒收，资产阶级作为有产阶级已經消失了，不仅那里的生产資料实现了国有化，那里的人民也已武装起来了。

当人們再接再厉地問起“究竟古巴的国家和数年前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有何区别”的时候，人們所得到的唯一严肃的回答，是……是共产党沒有执政（古巴共产党除外，它开始承认面前的是一个工人国家）。于是，这群奇怪的馬克思主义者在确定国家性质的定义时竟采用純粹是主观主义的标准。

当《綱領草案》在第48頁上（第203頁）写道，“民族国家愈来愈积极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力量”的时候，混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似乎有别于“民族民主国家的”一些“民族”国家（总沒有阶级性），但是和民族民主国家这个神秘的动物比較起来，民族国家本身的存在，就体现出它的好处。也許民族国家指的是印度、伊拉克、埃及、加納，或許还有摩洛哥、突尼斯等諸如此类的国家，等等。我們理解作者們縮手縮脚地不便把这些国家形容成“民主的”，因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就在于监禁共产党人和其他工人和貧农战士。但是，难道（确实存在着）这些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嗎？草率地肯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反帝力量”，难道不是在粗暴地欺騙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苏联的各族人民嗎？难道人們能够以尼赫魯政府就起着这样的作用來說服中国人民嗎？难道人們能以布尔吉巴或哈桑二世的“革命”作

用來說服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嗎？难道人們能以納賽尔和卡塞姆的“革命的、反帝的”作用，用來說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白白地期待“来自上面”的土地改革的埃及和伊拉克的农民嗎？难道能以恩克魯瑪的“进步”作用來說服不久前举行抗議生活条件恶化的大罢工的古納的劳动人民嗎？

所有这一切歪曲、混乱、和真假參半的情况，都是《綱領草案》的作者們不得不求助的东西。因为他們拒絕貫徹已为經驗所証实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基本原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团结在与資产階級各政党隔絕的、平民的或无产階級組織周围的无产階級和貧农（一旦有可能，他們就团结在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党派周围），正給予民族資产階級所进行的一切具体的、反帝的行动以有力的支援。但同时他仍还以对資产階級不信任的思想教育群众。他們向群众解释道：資产階級就其階級本质來說，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它們将不可避免地轉向反革命陣营，尤其是在彻底的土地改革动摇私有制的大厦的时候更是如此，因而他們号召群众不停留在一个阶段上繼續革命，进行“不断”革命，直到經濟和社会的解放补充了民族的解放，直到，继摧毁資产階級国家，建立起新型的国家之后能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經濟和社会建設的时候为止。这个新型的国家，就是以劳动人民选出的民主委员会为基础的无产階級和貧农的专政。

### 狹隘的共产主义观点

但是，如果說《綱領草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来说是微小的和令人失望的話，相反，《綱領草案》对工人国家的群众，首先对苏联的群众却充滿了美好的諾言。《綱領草案》以这样的号声結尾：“党庄严地宣布：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

义制度下生活”(150頁)。**《綱領草案》**仔細闡明了这个“共产主义”在社会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內容。

在社会經濟方面，我們將記住下列定論：

“在最近十年中(1961—1970)，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时，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生产方面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技术水平将大大提高；人人都将在物质上得到充分的保証；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都将变成生产效率高、收入高的經濟单位；苏联人对設備完善的住宅的需求将基本上得到滿足；繁重的体力劳动将消失；苏联将成为工作日最短的国家。

“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結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保証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的財富；苏維埃社会将紧紧地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則，将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下一个时期完成”。

如果事实符合上述定論的話，这确是令人眼花繚乱的远景。那么我們现在可以仔細看看具体事实。

在最近十年中，苏联产量应按人口計算超过美国，这个諾言能否实现呢？不太可能。这尤其是因为人們(**綱領 68—69 頁**)詳細說明了，为实现这一点，必須超过美国现在工业水平的两倍半。而美国现在的水平高于苏联 35%。因此苏联必須由 65 的指数增加到 200 或 250，这就是說，在十年中要翻三翻或几乎翻四翻。现在苏联每年的增长率是 8—10%，按这个增长率，十年后可以增加 200—250%，就是說，十年后，可达到 130 或 165 的指数。但是，苏联的人口比美国多 50%，因此，十年以后，美国的指数达到 135—150 就足以使得它的生产按人口計算高于苏联 50%，而美国要达

到 135—150 的指数只要每年增长 2.5—4% 就够了。这样的增长率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

按人口计算的工业生产水平不等于按人口计算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一点，还必须考虑到农业，而美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从长期积累的消费品来说，美国也是大大走在前面的。总之，根据赫鲁晓夫的定论，将会有有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国家。纠缠在这样一种定论的违反常规的性质上是沒有益处的。

举一个数目字的例子将会说明我们的怀疑。《纲领草案》规定电的生产到 1970 年将达九千至一万亿瓩，而美国现在电的生产即达八千五百亿瓩；1950 年是六千二百亿瓩，每年增长率是 6%，按照这样的增长率计算，美国的电力生产到 1970 年可能超过苏联电力生产的 50% 左右，还不用说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了。

赫鲁晓夫缺乏精确的估计也表现在农业方面。在二十一大时赫鲁晓夫就有过这样的表现，他当时宣称：从 1965 年起，工人国家的生产将超过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现在我们已到了 1961 年底，工人国家的生产只是勉强达到世界工业生产的 35%。显然，赫鲁晓夫是严重地低估了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某些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能力。轻率地作出这样的诺言——过去我们会对它进行过揭露（见《第四国际》59 年 2 月号）——是不会对苏联经济的成就及其动人的活力提供任何东西的。这些诺言只会表明官僚机构的浮夸，也补充说明了它在全世界到处兴起的革命力量面前的恐惧。

从第二个十年起，在苏联将生产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因此，人们可以充裕地过渡到按需分配。但是，《纲领草案》大大地使我们在这方面失望。诚然，《纲领草案》——以二十年为期限——

許諾，“社会消費資金將差不多达到人口实际收入的一半”，但是，要达到这个情况，只有在实际收入中把免費教育、社会保險、免費医疗保險和其他間接或延期工資形式包括进去。而这些社会保險，免費教育等在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同样存在的，估計达到劳动者能够領取的总收入的 35—40%。

实际上，同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相比，实在的进步只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免費住宅（这是前进一大步，但一切还要看住宅的质量）；免費的公共服务事业（其中包括公共交通）；企业学校免費供飯（即食堂一天免費供应一頓飯）。根据严格的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是开始从地平綫上升起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初期。但是，把这个称之为“大体上”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貶低共产主义，因此，这就給了它一个非常狹隘的定义。

这个奇怪的“共产主义”將保存着商品、貨幣和商品經濟，保存着工資收入者，甚至“按劳分配”的制度，更糟的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必須靠“物质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必須制訂“收购价格”来“刺激庄員提高劳动生产率”，像是庸俗的交易經濟那样，生产基本上取决于利潤。甚至还必須維持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不平等的报酬的制度，这是与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关于按照提供的唯一劳动数量进行严格平均分配的定义不相符合的。因此，这是一个甚至连面包都不能免費的“共产主义”，在那里，真正的平等永远是一种遙远的諾言。

有几个例子可以說明这种“共产主义”极为狹隘的性质。

列宁在 1917 年 5 月——这是在四十四年以前，当时既沒有自动化，也沒有核子力量——为修改党綱而草拟了一些文件。他在文件中特別规定禁止不滿十六岁的儿童参加工业劳动。现在建設共

产主义社会的《綱領草案》规定这一类的青年劳动者都是在享受十一年教育以下的青年，即是說，实际上从十六岁，十五岁甚至十四岁就工作。列宁曾规定在不久就要把有害健康的工业中的劳动日迅速减至四至六小时；《綱領草案》规定在有害健康的工业中每一劳动日为五至六小时。在1918年列宁繼續起草同一新綱領时談到，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逐漸把每天的劳动日减少到六小时，逐步拉平各行各业間的工資和待遇”（列宁曾这样指出，见全集27卷158頁）。

但是，《綱領草案》的作者却厚顏地在談“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报酬”，这种做法既不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不是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时期，而是在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的时期！这些提法难道不使人立即懂得这是濫用帽子嗎？难道还不足以說明苏联社会并未完成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建設，而更不用說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了？

### 国家消亡又同时加强！

《綱領草案》的作者在談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組織問題时，这些矛盾达到了頂点。

#### 第一个定义与第一个謬論

“国家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劳动者的全民組織的过程开始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越来越改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一段的有一部分有这样的意思：“将国家改变为全体劳动者的普遍組織的过程”（像恩格斯所說，后又为列宁所重申的那样，变成生产者和消費者自由联合的公社。但是，《綱領草案》不认为这

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国家的消亡,正是“将无产阶级民主变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綱領的作者不再記得列宁的教导:“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民主就是承认小部分人服从大多数人的国家,即是說,由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国家与革命》,选集第二卷)說国家消亡了,但是民主繼續存在,即是說,国家既消亡又存在。說无产阶级民主正在改变为全民的民主,即是多数人向少数人施行暴力的組織(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改变为反对无产阶级自己的集权的暴力組織。

### 第二个定义与第二个謬論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組織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它表达人民的意志,它的使命是:实行对劳动量和消費量的监督;保証……;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所有制……”

我們在这里就不再引証关于在帝国主义包围繼續存在的时候,国家在“国防”中的作用的一段話。但是,这点,就使我們抓住了关键問題,而且是很适当的。那么,在踏上这个共产主义的大門——“大体上”甚至已經建成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始終仍需要有一个通过暴力来强制实行紀律、法律、对消費和劳动措施的监督的国家,这难道是共产主义嗎? 甚至是社会主义嗎?

我們特意說:通过暴力,因为列宁曾經重复过几十次:国家不是簡單的少数屈从多数,不是簡單的遵守紀律和道德的起碼准則。国家是一个特殊机器,一个强制和暴力的特殊体,它从一个阶级的

名义把这种屈从和暴力强加給这个社会的另一阶级。列宁說，“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是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因此，像一切国家一样，民主就是有組織有系統的实行对人們的强制。”

只要經濟和社会条件不許可阶级、商品經濟和私有财富欲望消失的时候，事实上，就必须实行对公民实行有組織的强制，以使其不偷窃集体财产，不擅自占用消費基金中的大宗款項，不在街头欺压妇女，不組織任何不正当的交易。但是，这种强制的存在显然說明阶级的存在，說明我們还未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更不用說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但是；也許这只是一種定义上的錯誤？但现实呢？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高兴。苏联政府不得不在經濟犯案中重新采用死刑，此刑在小偷窃案中比大偷窃案中使用更为多，借以示戒。难道还須要列举其他証明来說明下列事实：国家仍然存在着，絲毫沒有消亡；在官僚主义蜕化形式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剩下的都只是些无稽之談，都是对劳动人民施放烟幕弹和欺騙。

### 第三个定义与第三个謬論

“党认为必須繼續发展管理方面的民主原則。應該逐步推行国家机关的一切领导工作人員由选举产生并向代表机关、选民报告工作的原則。必須設法縮減領取工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員，使愈来愈多的群众学会管理本領，使这类机关的工作将来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列宁(根据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論)把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1、公務人員的队伍开始由工人来代替，工人輪流完成这些职务；2、在这个国家里，对保留下来的公務人員根据工人的平均工資来支付。但是，《綱領草案》的作者却向

我們說，在苏联，已經是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正在愉快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建設，这个建設从现在起二十年內“大体上”完成——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还存在着如此庞大和有利的公务人員的队伍（根据苏联的官方統計有几百万），对公务人員的濫用激怒了人民，必須减少他們的人数（这是二十五年来一再提出的口号）和逐步采用选举的方式来代替任命……。

列宁确定的作为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任务，綱領的作者却許諾在建設共产主义以后才“逐步”实现它；他們承认，直到现在，“行政机关”并不具有实行“民主原則”的特点（更多一些民主原則的說法只是一种工作作法上的比喩），因为，从未进行过公务人員的选举。

## 2、如何来解释这个綱領

因此，这是对綱領理論上的缺点的严厉批評。但是，綱領不是沒有优点的。首先，綱領对于苏联官僚机构內部，苏联社会內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內部当前存在的紧张关系做了有力的揭发。在这方面，《綱領草案》揭发了什么呢？对于苏联的未来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未来可以得出那些結論呢？

这个綱領虽然是官僚机构本身“合乎邏輯的”和“观念”的产物，綱領也是今天的世界现实和苏联的现实的产物，无疑，是一种戴着变形的眼鏡看到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迫使苏联当政的特权阶层在主要問題上采取阴謀、让步和后退，为了在有損于这个阶层陣地的革命力量面前自卫。

## 在殖民地革命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如果把《綱領草案》的表达方式同二十大和八十一党声明的方式相比較，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压力的痕迹。古巴革命的胜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彻底化，在具有强烈革命进程的国家里的許多共产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事实，所有这些事实迫使克里姆林官领导人說出几句话。这些话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作者的意图，而在于向某些共产党人或准共产党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通詞：使他們可能从左边越过莫斯科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綫。

《綱領草案》的根本路綫在于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臭名昭彰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資产階級进行联盟，以便使帝国主义（它在联合国中已淪为少数）接受“和平共处”。这条路綫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消灭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无产階級的革命前景。甚至当这个机会主义采取冒险主义形式时——像恢复核試驗，其战略基础始終是不变的：給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基础建立在使帝国主义的“轉变”上，而不是由无产階級去推翻它。

但是，在这个基本上是机会主义路綫的范围内，却钻出了“从殖民枷鎖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选择“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种說法只是附带提到的；它和許多受到限制的、有保留的条款混杂在一起，这显然是对下述多种多样的力量所做的一种純粹口头上的让步：这些力量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强烈地斥責克里姆林官和共产党在殖民革命高涨面前的被动性，缺乏胆量和缺乏首創精神。

但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将抓住这些话把它作为一根棍棒来敲打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的脑袋，这些领导人甚至在一些无产者数目达到成百万的国家里，同民族資产階級进行联盟，实际上

給这些国家的人民堵塞了“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 在中国革命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第二个压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她是苏联伟大的和必不可缺的同盟者，对苏联來說，这种联盟比所有已經发明的和可能发明的一切核火箭都更有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革命更普遍的压力——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竭力回答的批評是符合我們剛才提出的批評的。

但是，这个联盟也反映了另一个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工业比苏联落后的所有工人国家的劳动群众的代言人，或者更确切地說，中国是所有在总的方面經濟不发达的各国人民、包括在这些国家当政的官僚机构的代言人，所有这些国家辛酸地指責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有民族自私主义，缺乏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当赫魯晓夫許諾給每个苏联人的家庭一套现代化的住房，甚至給本国每个公民一部汽車的时候，而数千万中国人、越南人、朝鮮人，甚至阿尔巴尼亚人、羅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在未来十年中仍很少能吃得飽和穿得暖。

这个指責在对“援助不发达国家”問題非常敏感的国家世界里引起强烈的反应，以致《綱領草案》的作者在綱領中插进一段难以想像的說法：

“社会主义国家在統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內的发展以及对这个体系的规律性和优越性的利用，保証它們有可能縮短建設社会主义的期限，开辟了它們大致同时，在一个历史时代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远景。”

除非給于这个“历史时期”一詞以广泛的意义，那么整句話都变得意义是空洞的（比如，时期就等于世紀），这可能說明，整个“社

会主义集团”，而首先是中国，可能在若干个十年里建设共产主义，也就是说，用赫鲁晓夫常用的标准来说，可能从现在起三十至四十年后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方面超过美国。

只要看一看数字就可以知道这说明什么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学家和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可能会回答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说：“或者你们的意思是说（指大体同时进入共产主义——译注），在目前这样‘互助’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实现这样大的‘跃进’，那么你们是厚颜地撒谎了，你们是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英勇的牺牲来开玩笑。或者你们的意思是说，苏联准备在这方面尽一切必要的努力——给予比目前的物质援助要更多十倍二十倍的物质援助——那么，从今以后你们就要在世界无产者面前实现这个诺言！”

问题不仅是苏联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问题还在于有一个主要的客观困难。几乎从半个世纪以来，苏联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苏联国家向官僚主义蜕化，使这种牺牲增加了三倍或者四倍才换取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保卫力量。当这么多年后，第一次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快的提高时，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会要求新的巨大牺牲来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虽然如果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领导吸取列宁主义的原则，可能会在不妨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给中国以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客观困难仍然继续存在着。

归根到底，这个困难所说明的，这就是由于历史奇怪的转折，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再一次显得荒谬，但是，以致过去没有人能够怀疑。肯定在一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人们甚至能够在一国“大体上”完成共产主义建设；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

制度能够“首先”在一国实行的幻想——这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在佛拉基沃斯托克可能免費供飯，而在滿洲里还有人挨餓；只要从爱澤魯姆到巴統（黑海巴庫附近——編者注）实行免費穿衣就够了；苏联人民因此應該在自己的边界上建立一套經常的围栏，以便驅除数以百万計的想挤到那里去，好摆脱地獄生活而享受伸手可及的天堂之乐的人，从而制止现代人类的大迁移；这种假設当然是荒謬的。但是，我們可以指出当年青的馬克思指出下述事实时他是多么正确，他說：共产主义只能普遍胜利；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如果不是世界性的至少也是包括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人民的一个社会。

讓我們补充一点，《綱領草案》同样包括关于“不断完善国际分工”必要性的一段話。这段話似乎是部分回答某些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波兰共产党曾經給克里姆林宮提出的批評。

### 在苏联消費者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在《綱領草案》中某些部分，甚至在每一頁，都可看到苏联消費者压力。

当綱領宣布“高收入和相对的低收入之間差別將應該逐步降低”的时候，这是因为消費者对此敏感并吵吵嚷嚷的提出抗議。当綱領草案申明：“在今后十年中，工資相对低的职工的实际收入将会提高，使国内将不再有低工資等級的工人和職員”时，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即数百万計的男女——认为今天自己領取的报酬太低；当綱領宣布說，“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任务是解决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的最尖銳的住宅問題”时（96頁），这是因为苏联很大一部分居民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不滿正在不断增长。当綱領宣布說，“必須給妇女較輕的，但有足够报酬的工作”时（99頁），这

是綱領和斯大林的下述理論決裂：用婦女和男人同樣參加有害健康的沉重的勞動來象徵着男女之間的平等。因為這點曾經不免在蘇聯女工中慢慢引起了不滿。當《綱領草案》指出，“給居民制造的汽車將會有顯著增加”時，儘管綱領在前面這樣宣布過：“我國汽車的數量要增長到能保證充分滿足貨運和客運需要的規模，汽車出租站將廣泛設立。”這是因為幾百萬蘇聯人不接受赫魯曉夫關於出租汽車能滿足蘇聯人民對汽車方面的需要的論點；因為他們非常希望獲得一輛汽車作為私人所有，或者經常有使用權。其餘照此類推。

對於這些諾言的總結無疑是令人感動的。尤其令人感動的是，當人們考慮一下蘇聯的歷史，不僅是在1917或1927年的情況，甚至是在1945，乃至於1952年的情況的時候。無疑，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最近十年中比起1917—1952年的整個時期，或者，比起二十世紀的整個上半世紀來有了更多的提高。在這方面或那方面，諾言也許將不能實現。特別是關於農業生產，赫魯曉夫不顧最近幾年的經驗，繼續冒進，而這些經驗本該會使他學得謹慎些。然而，應該這樣認為：這些遠景將大体上實現，這意味着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從現在起十年後如果不超過也可達到西歐大多數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將列入世界水平最高的國家之列。

“赫魯曉夫的改良主義”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如果肚子的主要要求得到滿足，人們的心就會平靜下來，至少在批評制度官僚主義變形的道路上使人們少動腦筋。但是，這個理論是錯誤的。如果改善生活水平將會避免爆發像1953年6月16日至17日在德國那樣的，或1956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那樣的飢餓與憤怒的話，那麼，這種改善結果將會推動而不是防止反對官僚主義的批評精神，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更是如此：在這個國家里，《國

家与革命》一书不仅可以自由閱讀，而且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

《綱領草案》无容置辯地表明，官僚机构同样开始遭到来自苏联消費者方面的压力，这些消費者意識到：他們不仅是比美国消費更多的肉和奶的机器，而且是公民，是生产者，作为公民和生产者，他們終于要求行使苏联宪法和旧党綱所給予他們的——至少是紙上写着的——权利。

### 在苏維埃公民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事实上，自从赫魯晓夫执政以来，这是第一次，《綱領草案》包括了不仅关系到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关系到他們的民主权利的明确的諾言。原来，继斯大林之后而上台的新的領導集团只满足于廢除斯大林时代的最野蛮的濫用职权（秘密警察的无上权利，缺乏最基本的司法保証，解散集中营等）。现在，这个領導集团也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向前推进一些改革了。

这些改革的要点，包含在下列的建議中：

1. “每次选举时更換的代表宜不少于苏維埃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2. “应当确定这样一个原則：全联盟机关加盟共和国机关和地方机关的领导人一般最多只能三届連續当选担任自己的职务。”
3. “应该充分实现下述各点：……在苏維埃會議上有关国家管理、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是公开的，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討論；……苏維埃經常討論代表的质問……。”
4. “应当把立法方面的倡議权，即提出法案的权利，交給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性的社会团体。”
5. “最重要的法案应交付全民表决。”
6. “党认为这些团体中領取工資的人員自下而上都必須进一

步裁減，在每屆選舉中，每一個社會機關應當更換約一半人員。認為社會團體的領導工作人員一般最多只能兩屆連續當選是適宜的。”

7. “發展黨的民主……”。“對於黨的選舉產生的各級機關——從基層組織到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採取按照一定比例經常更換的辦法，同時要保證領導的繼承性。在每次選舉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的成員至少更換四分之一。主席團委員一般最多只能三屆連續當選……。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邊區黨委會，州黨委會的成員在每次選舉時，至少更換三分之一……。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可以連續當選，但最多不得超過兩屆。”

在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幾點中，應該加上一個第八點，即關於逐級選舉公務人員的問題。

乍一看，這個令人感動的政治改革單人們會怎樣想呢？預先有兩點可以提出來：

首先，今天這些做為驚人的革新而提出來的一系列的措施早就包括在蘇聯憲法的內容之中。人們默認這些措施實際上並未實行。這並不表明稱之為自我批評的這個如此熱烈被贊揚的美德是經常付諸實行的。

其次，其他一些措施由於限制性的條款大而使其真正的民主意義大為縮減。“主席團委員的當選”，“一般地”最多只能三屆連續當選，但是“黨的某些負責人，由於他們享有公認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質，組織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連續選入領導機關。”

我們知道，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都是一致當選的，因此四分之三多數票當選的“條件”是無實際效果的。對於蘇維埃機關的領導

人也是同样情况，他們“在这种情况下，即当大家认为由于某工作人员的才干，让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是有利和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选举他，最多能連續三次，而所得票数是四分之三的多数”。

这就是說，人們不得不采用一种平息情緒的办法，它表明政治压力已具有了重要的形式。某些已列入要进行的改革无疑会仍是一紙空文。但另一些改革将被广泛地执行(特别是全民表决，工会和其他社会組織的倡議权；討論代表的质問等等)，但是，这是针对一些次要的，特别是有关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問題而言。

这些措施的要点在于：以**公民投票性质的政治专政**来代替斯大林的警察专政。在这种专政下，群众被分散为单独的个人享有着不断增长的权利，但不能享受組織起来和能够挫敗——即使在次要的問題上——官僚领导集团所制定的路綫的权利。

比較一下从斯大林死后一直到消灭“反党集团”的这个时期，事实上，党的领导机关内部討論的自由冒着被限制的危險，而沒有由于《綱領草案》的改革而有所增加！

在整个这一时期，赫魯晓夫和他的朋友們为了穩坐江山和避免軍隊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扩大那些参加真正討論的人的圈子，政治方針的問題已在这些討論中解决。在进行反对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以及他們朋友的决定性斗争时，他甚至不得不直接号召中央委员会的委員群众来反对主席团的委員。这类事态的演进有助于在中央委员会內建立集团和派別，甚至使集团和派別的重現是不可避免的。

而根据新的方法，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有三分之一的委員被取消，除了赫魯晓夫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核心以外——这些人也是以此資格而任职的——每一个企图维护与第一書記不同的观点的中央委員将自动地受到威胁，这种威胁不是“开除”(人們可

能采用一些方法来反对开除)，而是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不得再当选”。因为，是即将卸任的一届领导机构来向代表大会推荐应该重新当选的委员和不应再选的委员以及新的候选人员的名单。要反对这种通过无情的和“民主”的道路进行的淘汰，只能越过中央委员会向基层发出呼吁，而这种做法显然是被禁止的，它被视为是“派别主义”和集团思想，是与马列主义的党性不相容的“表现”。因此，由于这种改革，派别的形成将是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在苏联的各种选举中，也存在着这种表面上更民主的做法。中央委员会控制着党，通过党控制工会、共青团，和一切“社会”组织。事实是，只要党的领导集团保留着提出候选人的绝对垄断权，无论是直接提出，还是通过“社会组织”间接提出，即使是经常更换苏维埃的成员，也并不能减少极端官僚化的性质和君主体制。

这就是整个这座大厦的弱点。在“大体上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情况下这个弱点甚至是成为可笑的。

列宁于1921年时曾肯定禁止分裂活动（而不是禁止“集团”或“派别”）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受到俄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压力而遭到巨大危险。他阐明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任何分裂活动的斗争都会成为国内阶级斗争间接的（不自觉的）媒介。

而现在，人们对我们说：阶级对立已经消失；阶级本身也正在“大体上”消失；因此，不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归根到底只是反映了阶级的对立利益。但同时，人们仍继续禁止“派别主义和集团思想”。最好是，人们在这方面修改1919年的纲领，因为1919年的纲领丝毫未谈到这个“列宁准则”，列宁本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sup>①</sup>

<sup>①</sup> 例如（千百个其他例子中的一个）：在《列宁全集》第2卷的注解中，人们提到布哈林曾在1916年时组织过一个“反党集团”在民族政策方面反对“党的路线”。列

这样就得出了一個荒謬的結論：當過去布尔什維克黨還很弱小，處在被強大的敵人包圍的時候，黨還能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允許有建立派別和整個集團的自由。當黨領導了蘇維埃國家在內戰和外國干涉的時候，當蘇維埃國家的生活處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那種情況下，蘇聯是弱小的，處於飢餓和普遍的貧窮，黨還能一直付出很高的代價，沒有在 1919 年的綱領中提出“禁止”的字眼。

而現在蘇聯已成為世界上頭等軍事強國和二等工業強國時；它自稱已進入勝利地建設共產主義的時候，“集團思想”卻變成了致命的危險，而在 1917 年、1918 年、1919 年或 1920 年時，這種思想都未曾被認為是致命的危險。誰能理解就讓誰理解吧。

赫魯曉夫如果維護南斯拉夫下述論點，那麼赫魯曉夫的理論就更合乎邏輯，根據南斯拉夫的論點，黨應該隨着國家和階級的消亡而消亡，因為黨只是一個社會階級的先進部隊。當黨消亡時，“派別和集團”也隨之而消亡。但是，赫魯曉夫卻相反地認為：隨着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黨的作用是日益加強的”。（143 頁）

既然不再有階級對立，黨的作用只能在經濟、文化、科學領導方面日益加強。那麼，“共產主義的建設”為什麼會由於“無代表意義的集團”在各級，包括在黨內，與擁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人”進行鬥爭而受到威脅呢？那麼，為什麼由於兩三個“派別”就關於布拉斯克建立一個大型水壩——在還不存在能夠消費由此而供應的電力的工業之前——是否有用的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就會使社會主義的勝利受到動搖呢？

---

寧好像並未贊成過這一判斷，因為列寧在 1919 年曾推薦並使人贊成，把布哈林接納入政治局，並且在 1920 年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前夕，列寧又把他做為中央委員會的特派代表派到工會去，同時還向那些對這種做法提出批評的同志們說：“你們認識像布哈林這樣優秀的理論家嗎？”如果根據目前的綱領的精神，列寧就不得不把他開除出去了。根據這樣一種精神，列寧就不是……“列寧主義者了”。

如果一边是执守僵化紀律者的集团，掌握着政权的一切指揮的杠杆，而另一边只是一些孤立的个人，他們沒有組織任何集团的权利，哪怕是暫时的，只是一次討論会期間，为使自己的論点获胜而組織的集团，那么，要对全部經濟和文化問題进行“自由的，詳細的和公开的討論”怎可能呢？难道人們沒有看到，尽管人們增加形式上的民主，而这种制度，也只能是官僚集中制。只有在领导党的內部有建立集团和派别的自由，根据宪法和在苏联合法範圍內有建立苏联其他党(或集团)的自由的时候，真正恢复各苏維埃的主权才能成为事实。这不是很清楚嗎？

1919年的綱領曾在第八次党代会上討論过。当时，苏联正处于死亡的危險中。然而討論是完全自由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表达了出来，辯論曾进行得非常激烈。而这次在二十二大上会进行真正的討論嗎？这将是一个很清晰的考驗。沒有人会相信对《綱領草案》所提出的几千个問題：——例如，关于当国家消亡而民主仍然存在的思想——在几百万苏联共产党人、成千上万的干部中會沒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會有人敢在代表大会上表示不同意见嗎？人們会让他們有发表不同意见的可能嗎？假如，沒有，那么就應該看到，草案中的一切“民主”都是一种烟幕弹。恢复苏維埃民主的真正任务在苏联远未解决，事实上，人們还未开始提出恢复民主的問題。

### 在苏联生产者压力面前的官僚制度

剩下最后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还不是实际的，而只是潜在的，因为《綱領草案》絲毫沒有反映出这一压力的存在，但是这种压力对于苏联的未来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这是欧洲最优秀和世界人数最多的无产階級为了获得亲自对自己用牺牲和智慧建立起来的

企业进行管理而施加的压力。

因为，这正是《綱領草案》全部政治部分中的矛盾的頂端。人們要使苏維埃“民主化”，使行政“民主化”，甚至使党、工会、共青团“民主化”，但是人們甚至沒提到可能使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問題。甚至沒提最近几年赋予工会的監視經濟的官僚管理的一些微小权利。

《綱領草案》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談到“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問題，在第 77 頁，談到有待完成的經濟任务的那一章的結尾部分；在第 89—90 頁談到基层組織在制訂計劃草案和地方組織在“經濟領導”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問題；第 110 頁上談到工会做为“經濟管理的学校”問題。

但是，在这三段中，立即引人注意的是他們的极其模糊的性质，沒有任何具体的建議，沒有規定任何机构上的变化，对现行制度沒有絲毫改变。这些无足輕重的說法同关于苏維埃、“社会組織”和党的具体建議之間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重要的是：沒有談到在企业中实行集体領導的問題，沒有談到工会参与这一領導的問題。在工会一系列的任务中，这一任务完全被抹掉了。唯一被采用的一句实际的話是：“應該把最优秀的分子提拔到企业的領導崗位上去”。就是这些。这太少了。很多劳动者都将会认为这太少了。一些人甚至会立即提出这个意见，許多人迟早也会說出这点来。

自从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做为一种經濟管理組織建立以来，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这方面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精神紧张。这是一种被迫的紧张，因为苏联的官僚机构必須反对这种制度，不管其利益和成果如何。有罪的责任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列宁和 1919 年的綱領在这方面都說得很清楚，只要把二者拿来对比一下就可

以知道修正主义在于不向未来——向将要消除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关于**生产者实行自治**的問題。

如果說今天在苏联，除了恢复有建立派别的自由和建立苏联其他政党的自由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急迫的暂时性的要求，那就是：**結束企业领导的官僚和君主制度，恢复民主管理的制度，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在它尚未結束学习阶段，未全部掌握民主管理之前，首先参加民主管理，并为此目的，在工人委员会中规定人們在苏維埃，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各“社会組織”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輪換原則。**

总结这些各种压力来看，很明显，这个綱領还不是一个最后确定的文件，它将通过生活和实践；看到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許多变化、改变和辯駁的事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經出现了四种派别：中国派；赫魯晓夫派；南斯拉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其他的派别还将会涌现出来。它們之中的三种派别贊同草案中的某些部分——至少是这些部分所涉及的演进——而不贊同另一些部分。由于事情的发展，这些派别之間的繼續进行討論将是有利的。不管官僚分子的力量是怎样企图去窒息它。我們托洛茨基派认为在这些辯論的最后，将只可能有一个結論：**坦率、真誠、完全地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則，这种为經驗所丰富的列宁主义原則比任何时候都更是爭取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有效的指南。**

## 十三、从列宁到赫鲁晓夫

[提交給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显示了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所受到的社会压力]

——威廉·瓦尔德

一份新的綱領已經发表，将提交 10 月份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它将代替 1919 年 3 月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綱領。可以用这两个文件作为标尺来衡量苏联四十二年来物质上的巨大进展和政治上同样巨大的衰退。

赫鲁晓夫五万字的綱領草案比列宁的长得多。列宁写的綱領大部分只談国内任务，因为在同一个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所通过的文件已經談了涉及面更广的問題。

现在这个文件包括了国内和世界問題。但是尽管它的范围很广，这个苏联的世界影响达到高峰时提出的新党綱，在实质内容上却不像列宁的党綱那样是国际主义的文件。（列宁党綱是在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國为了生存而同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进行斗争的时期写的。）

虽然如此，这文件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里程碑。它代替列宁的党綱成为苏維埃集团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組織的指針。它总结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在这个独裁者逝世以后迅速变化的八年中。經驗主义地得出的关于国内和世界事务的观点。

今天的苏联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比斯大林拥有更多的經濟威力、軍事力量和外交威信。这些有利条件給他們更多的保証、灵活

性和在國內外問題上玩弄陰謀的可能。但是，當蘇聯領袖們的力量隨着帝國主義的削弱而得到增長的同時，他們也被蘇聯的群眾、東歐衛星國、中國和蓬勃的殖民地革命浪潮逼得更厲害了。這份修改了的黨綱反映了蘇聯領導人迫於條件的變化而不得不对他們的立場進行的各種調整。（它另外還反映了一些別的東西。）

這份冗長的黨綱草案試圖為相互矛盾的目的服務。它直接向蘇聯人民中因為成就而感到的驕傲呼喚，懇求他們為他們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和較好的生活再耐心多等一會兒。它所強調的不是輕鬆和享受，而是必須為此目的進行勞動——更艱苦、效率更高的勞動。

新黨綱提出許多論據來為這個統治集團的持續存在進行辯解。它幾乎不加掩蓋地在某些關鍵性的世界政治問題上同北京所持的不同意見進行論戰。它企圖爭取到“中立”國家，用的辦法是：向殖民地人民表示蘇聯是他們最可靠的物質援助的源泉，同時向亞洲、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資產階級保證克里姆林宮不僅將支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將支持他們反對本國的叛亂群眾。

和蘇聯生活中的許許多多事物一樣，這個政治文件也是極端矛盾的。它對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的揭露和對蘇聯自 1917 年十月革命以來所取得的震撼世界的成就的追述是令人信服的，它對社會主義目標的重申和對社會、經濟、教育、科學等方面的進展的回顧也是令人鼓舞的。成堆的事實和論據證明，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儘管迄今為止仍有它的局限性和受到曲解，已經不可改變地把人類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峰，展開了無限的前景。

草案中提出的各項指標是同蘇聯所取得的動人進展及其計劃經濟的潛力聯繫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它們更加顯得是行得通的。這個以蘇聯日益增長的威力為依靠的、同時又被草案發表一星期

后“东方二号”宇宙飛行員季托夫的飛行生动化了的**新黨綱**，应当能对殖民地世界的群众和領袖人物，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进步工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紐約郵報》的編輯們曾竭力警告華盛頓的高級人物說，不能用投票同意肯尼迪擴大軍事預算、削減用于教育、社会服务和經濟发展的拨款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挑战。

**新黨綱**作为最强大的工人国家的成就和目标的表现，在性质上比資本主义国家政治家們所有的声明都站得更高。但是，人們对这个領头的共产党的政治宪章的要求，却不仅是要它比旧秩序的思想堡垒表现得优越。

这个修改了的綱領把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科学方法和无产階級原則往前推进了多远呢？它有沒有滿足苏联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呢？它有沒有正确表达爭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的利益呢？它能給与美国社会主义先鋒队以多大的帮助呢？

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文件都有着重大缺点，并且会把人引入歧途。

赫魯晓夫对于**新綱領**同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关系作了两句考語。他明确地說，**新綱領**是列宁綱領的合乎邏輯的发展和忠实的繼續，他还告訴我們說，苏联已經全面完成列宁的綱領。他說**新綱領**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发展的一个重大貢獻”。赫魯晓夫含蓄地說，**新綱領**放弃了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

赫魯晓夫的这两句考語都是沒有根据的。尽管赫魯晓夫的綱領向列宁的肖像致敬，但它却在社会主义理論和階級斗争等最主要問題上脱离了布尔什維克的立場。它尽管不提斯大林但它却重申和正式承认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上面同布尔什維主义决裂的主要論点。事实上，赫魯晓夫在冒充列宁的繼承人这一点上也是学了

斯大林的样。

### 斯大林不见了

这个文件除了提到沒有姓名、也未加解释的个人崇拜以外，沒有提到赫魯晓夫的前任。斯大林已变成一个“非人”。这种厚着脸皮不肯忠实地研究斯大林时代二十五年历史的做法表明，綱領作者們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是多么格格不入。

如果說机会主义政治家沒有这种义务的話，历史唯物主义者却有义务睜开眼睛研究历史，批判地分析历史的过程，并且充分尊重事实。这个綱領草案沒有这样做。它用一块幕布遮住了苏联的发展，也不考虑赫魯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就像他从来沒有讲过这篇讲话。<sup>①</sup>

最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表明，如此勇敢的赫魯晓夫和他的同事們竟不敢正視 1917—1953 年間苏联的真实历史。对于他們来說，忠实地叙述历史所将引起的問題，将多于这样做可能解决的。这些統治者，由于他們否认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集团，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他們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据他們的說法，在他們国内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而沒有蝗虫一样的官僚。

官僚政府的不同派別对斯大林的遗产（如强迫集体化、反对左右傾反对派的斗争、莫斯科审判、清党、斯大林恐怖和对他的崇拜

---

<sup>①</sup> 这篇讲话的内容虽曾传达給共产党员，但一直沒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与此最有切身关系的苏联人民对于斯大林罪行的这一次历史性暴露却知道得最少。参加二十二大的誠实的代表們也許会感到这种压制手段并不符合《綱領草案》中的下面这一段話：“党认为现阶段思想工作中主要的是：培养全体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思想性……”

等等)显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而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向苏联人民进行解释,而是什么也不说,希望让时间来磨灭这些令人难堪的回忆。这种想掩盖还令人感到痛苦的过去的蹩脚而又不成功的努力,同伪造和装饰苏联今天的实际情况的做法混在一起,这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条戒律:“说真话,不管它在当时是多么难听”。

我们对这个内容广泛而又矛盾百出的文件的讨论必须限制在国民经济问题、苏维埃民主的状况、国家作用、苏联社会的性质和苏联国内发展的前景等基本问题上。

綱領詳細公布了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任务。甚至苏维埃制度的了解情况的敌人也承认,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成就,特别在科学、技术和重工业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和惊人的。美国空军的“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还说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 不平衡的发展

从东德到中国,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订计划的时候都热衷于提出高的要求和异想天开的目标(然后又不得不对计划作重大的更改)。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但是即使綱領内许多夸大了的目标远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二十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的坚固基础将保证在今后二十年内获得显著的发展。

在谈到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步骤时,党綱沒有接触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令人苦恼的不平衡问题,而这种不平衡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在重工业远远地走在轻工业和农业的前头。

“兰德公司”的另一个报告说,今天每一个苏联公民平均享有比1928年多一倍以上的货物和福利,生活“水平比1950年差不多

高了三分之二”。尽管有这种显著的令人欢迎的改善，人民仍感到消费品和食品的匮乏。

几乎每一种主要物品的供应都跟不上需要。买什么东西，从干鱼到面包，都得化很多时间到国营商店门口去排长队。大多数城市家庭的主要食品依旧是茶、菜汤和黑面包。肉、奶、蛋品和其他农产品又少又贵。

幸运的人能买到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电视机，甚至汽车。但是大多数家庭用具的数量都非常有限，甚至党员们也得进行登记。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不足，渴望能得到一套小小的公寓住宅。苏联的工资收入者虽然在房租、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上化的钱不多，但工资很低，而且在各类工人中间都有工资收入悬殊的现象。

纲领中的一些说法，从反面证实了这种低标准生活条件的普遍存在。纲领说：今后二十年将在生产消费资料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面包和房租也将同医疗、教育和休假疗养一样免费。这些东西不仅将充分供应，而且将分配得更加合理。

苏联群众以前也听到过同样的诺言。但是现在他们感到，能够把宇宙飞行员送上太空并使他们回来的制度也应该能够更好地照顾人民最迫切的物质需要。群众的要求不仅对《纲领草案》产生了影响，而且使得它成为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这是因为：如果纲领的起草人能够足够迅速充分地交货，那么《纲领草案》引起的巨大期望也能不利于他们自己。

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来，他的继承者一直在同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引起的困难进行苦斗。搞规划的官员们经常反反复复，一回儿宣布要把大部分国家投资投在轻工业，一回儿又要一切服从基本工业的要求。关于基本投资的先后这个中心问题文件并没有解决，这表明上层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和踌躇不

决。

但是苏联群众，特别是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只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就要求更多的消费品，要求少强调重工业。

例如，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宣布，苏联的黄油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而今年春天，缺乏油脂的敖德萨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把黄油运往古巴。他们高喊：“要古巴，不要黄油”。这口号表示他们愿意同遭到美帝禁运的革命的古巴团结一致，也表示他们要求政府多行动少宣传。这一事件比纲领里的夸口更好地说出了苏联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它的经济实况。

尽管赫鲁晓夫宣布今年收成良好，并采取了許多扩大和改进耕作的措施，农业依然是苏联经济中最弱最难发展的部门。农村之所以比较停滞不前和发展不够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中一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中的严重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忽视轻工业，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商品以维持和刺激他们的生产，结果城市工人就不能从农村得到足够的农产品。

如果说，估计苏联的某些基本工业部门能够接近甚至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现实的，那末同消费者接近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将会慢得多，问题会困难得多。

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的产量的提高。纲领里面有許多规定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如：工业的进一步合理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权力下放和其他行政管理措施。許多措施已经经过试验，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计划中的生产现代化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无疑地将大大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更加充裕的消费品和工资率的更加趋于平均也将有助于此。

## 生产力和工人民主

1919年的列宁綱領規定，提高生产能力和發揮工人潜力的主要方法是让工人民主管理工厂。就是說要减少厂长的专橫权力，减少党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費和管理不善。工人选出的代表要监督和检查計劃和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

齐·格瓦拉<sup>①</sup>在5月1日发表的关于經濟計劃的演說中，对古巴去年生产計劃中的缺点作了下面的解释：“我們沒有到群众中去。我們的計劃是在實驗室里作出来的。我們估計了已經安裝的工厂的生产能力，估計了它們的生产量，这样就成了我們的工作計劃。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了，群众沒有参加制訂这个計劃，而沒有群众参加的計劃永远有遭到失敗的危險。”

古巴的革命者一开始他們的国家計劃，就注意到群众的自觉参加和全面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这同苏联官員們的态度不同。一个靠上面几个人的万能和一貫正确性办事的政权是不可能采取这条解决生产問題的道路的。

沒有参加管理政府的工人，怎能指望讓他們管理計劃或生产呢？他們甚至連抗議計劃不周所造成的后果的罢工权利也沒有。工业中缺乏民主，这是苏联經濟发展的主要阻力。同这一点結合在一起的，是国家产品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公平現象。

綱領保證要消除最显著的不公正現象。但是，只要物資缺乏的情况繼續存在，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們就不可能放弃积累和享受生活中的好东西的优先权利和特殊地位。靠牺牲群众过“甜蜜生活”，这种情况在苏联存在，虽然同意大利比較起来，它的形式不

---

① 古巴工业部长。——譯者

同，基础不同，……但是它存在着。

这些坏事的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存在——首先是由于生产不足和缺乏民主。当然，《綱領草案》是这样宣布的：“苏維埃社会的全部生活是建筑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障实际实现这些权利。苏維埃社会保证了真正的个人自由”。

这些是好听的话。但除了最轻信的人以外，谁会把它們看成是苏联生活的真实描写呢？

1919年的綱領宣称：“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自由只是作为对付剝削者想要維持或恢复他們的特权的任何企图的暂时措施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剝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措施的必要性也将逐渐消失，党也将竭力减少这些措施。”

现在，四十二年后，赫魯晓夫对我们說，一切剝削都已消灭了，社会主义建立了。那么，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綱領是否已經实现了呢？还远远沒有。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揭露出来了。今天的苏联公民不必担心突然被捕，根据假証据被控受审，在集中营服长期徒刑的苦役。

但是现在工人甚至沒有那些他們在1917年爭得的、而且直到出现斯大林主义以前一直行使的那些权利和自由。民主已經在苏維埃政府和党内消失。干部不必对他們的行动負責。全体劳动人民都沒有被吸收参加国家管理。法官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統治的干部”替人民支配一切，决定一切。

新綱領吹嘘說，苏联人民有言論、出版和結社的充分自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情况怎样呢？苏联公民被禁止閱讀未經許可的出版物，收听外国广播，拥有国外出版的書刊。他們不能在國內自由旅行，未經官方許可不能离开苏联。不鼓励或不允許发表反对意见。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要受严厉处罰。政府工作人員和

党的检查官员严格监督文化艺术，以免散布太“危险的思想”。

### 赫鲁晓夫吹牛

苏联总理 8 月 17 日在他的关于柏林危机的讲演中说：“现在已经能以充分的信心说，全体苏联人民一致同意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种夸口的说法表明伴随着这个纲领的诞生的是多么强迫的一致，多么微少的民主呵。同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很可能不仅在群众中间，而且在上层人物中间都有反对纲领的人，虽然不能公开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个文件保留了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一教条以及对官僚主义国家的崇拜，这就使得纲领的民主外衣更显得是一派胡言。如果真的有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利益完全协调和观点绝对一致，那么党又何必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共产主义阶段都一定要保持它的政治垄断并完全控制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呢？一个团结无间的制度不需要有永久性的总管，共产党也不会为此害怕它忠诚的党员进行有组织活动，以致于绝对禁止“派别活动”的任何表现。

如果它们的政策或统治没有遭到广泛的反对，那末，新斯大林主义者由于他们意见的正确性，观点的说服性和工作中的威望就很容易维持它们的领导地位了。纲领重申一党极权的重要性，并坚持政府高压政治，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肯定存在着需要加以制止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 “无阶级”的国家

这些考虑也适用于《纲领草案》所谈到的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作用问题。列宁教导说，随着生产力的成倍增长，给每个人提供丰裕的产品，阶级对抗的消灭，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

階級民主将要扩大，国家的强制性和官僚主义方面将大大减少。

赫魯晓夫却断言所有这些美妙的条件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完全和睦的社会的政府是那么民主，它已不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它是一个“全民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苏维埃国家的统治者们又为什么今年要恢复斯大林在 1947 年废除了的经济罪犯死刑法呢？已经有几个人在这项法律下被处死。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已经取消了。很清楚，必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在逼使公民们犯侵犯国家财产的罪，也必定有一些强有力的原因使得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子们采取如此野蛮的报复手段。

最近赫魯晓夫自己泄露了关于党的上层人物大规模盗用公款舞弊和欺诈的秘密。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各个阶层都有盗窃国家财产的事情发生。乌克兰去年粮食收成的一半不知去向！这些反社会主义行为，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有它们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它们的原因就是连续不断的贫困、苦难和不平等，就是官僚主义分子的不受管束的统治，以及群众的对他们无法驾驭。

新纲领提出了要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克服这些弊病，为通过秘密投票选举、罢免、撤回和更换中央一级的各种政治委员会。但是纲领同样也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总司令无意交出任何重要的地位、权力或特权。

这个文件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 and 最后的胜利。”在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以前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局限于一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包括人类大多数和它的最发达部分的国际制度。社会主义要获得真正的经济实质，它必需不仅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采取计划经济，它还必需提供比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赫魯曉夫本人承認，今天的蘇聯（更不用說蘇聯集團的其他國家了），並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綱領僅僅許諾在今後二十年內，蘇聯的生活水平將迅速提高，接近然後超過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如果世界和平得以確保，軍備競賽得以放鬆的話。

這樣的一種窮人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對比起來看）在用語上就存在矛盾。這僅僅是在綱領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聯實際情況之間的許多矛盾中的一個。現在蘇聯經濟在科學、技術和重工業方面正在迅速趕上資本主義國家，而供應消費者的大多數部門卻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得少和差。蘇聯還有着極端官僚化的統治，蘇聯公民得不到基本的權利。因此今天的蘇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締造者和繼承者所設計的、工人們所期望的那種社會主義秩序還遠得很。

比較正確和老實的態度是承認這些缺點，把蘇維埃社會看作是一個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工人階級的国家，但由於經濟上生產不足，政治上有特權階級的統治，國際上工人階級未能在帝國主義的各個堡壘中取得政權而阻礙了自己的發展。

但是蘇聯領導人需要用捏造的神話來打扮自己的政權，支撐自己的統治，給他們的追隨者注射不能實現的希望。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特別要曲解蘇維埃社會性質的許多原因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的手裡喪失了它的科學性，變成了替他們的代價高昂的統治進行辯解的工具。

《綱領草案》為蘇聯提出了一個極其簡單的、止痛鎮靜的發展計劃。他們告訴我們說，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有着牢不可破的團結，各族人民也牢固地融合在一起。不存在產生嚴重的社會對立或政治分歧的基礎。隨着蘇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它的經濟、科學、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發展也將加速起來。一切還存

在的不平等现象和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都将一扫而光。

只要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这一切就可以保证实现。仁慈的官僚们将带领群众走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

苏联人民由于考虑到斯大林逝世以来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人民生活状况有了改善，又考虑到自己工作的成就和潜力，因此很可能会相信纲领中所作的诺言，看一看这个政权到底能不能把它们兑现。

赫鲁晓夫又给苏联人民开了一张巨额支票。苏联人民一定会坚决要求它兑付越来越多的款项。随着苏联政府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兑现，魅力将会消失，不满情绪将会增长。

激起了人民的希望，而又不能使其实现；改良主义政权的诺言和让步为群众的独立行动和政治形势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变革准备条件。不论在近代历史或苏联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53—1956年在东欧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苏联人民经过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以后，现在正在试验斯大林的较“开明”的继承者所实行的政策。现在无法预测，多长时间以后他们才能了解赫鲁晓夫统治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支架发生土崩瓦解的时期的体验，尤其是对它的厌烦，将不是成为官僚统治的巩固及其永久存在的主要条件之一，而是将成为官僚统治的破坏和它的最后被无产阶级民主所代替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坚信，苏联人民迟早会赶走这些官僚而完全由他们自己来管家。

### 列宁的国际主义

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永久的地位指定给哪一个国家（包括他们所建立的苏

維埃共和國在內)或者这个国家的工人階級。作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們討厭这种民族的傲慢情緒的。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者在推翻資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是暫时的。他把苏維埃政权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联結在一起。

目前苏联寡头政治的头子們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得好像誰曾經封給他們一种永久的統治权,不仅是苏联范围内的、而且是全世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永久統治权,尽管他們否认这一点。他們掌握的权力把他們陶醉得昏昏沉沉,搖搖晃晃,以为自己掌握了永远保持最高权力的一切必要手段。

赫魯晓夫在柏林危机問題上提到“我們为我們的威严得到承认而斗争”,这句话暴露了他代表的那个階級的沙文主义观点。党綱草案也充滿了这种“民族威严”的精神。斯大林还只是宣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管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条件和情况如何,而他的門徒們却进一步夸口要在同一个祖国内創立共产主义。

綱領說:“在社会主义陣营,或者換句話說,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誰也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特殊权利和优越地位。”然而綱領的作者却為他們自己的政权保留了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和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殊权利,让运气欠佳的人类的其他部分跟在后面。

这个前景不仅对苏联人民來說是虛幻的;它对苏維埃集团的其他国家來說也是极端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的。当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从阿尔巴尼亚到中国的其他反資本主义的国家将会怎么样呢?难道它們会心甘情願地落在——而且是远远地落在苏联老大哥的后面么?

苏联有两亿人口,而中国有七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人完全靠配

給生活。当苏联向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跃进的时候，难道叫中国人在他們非常低下的經濟水平上向前爬行？中国为了建設重工业，需要愈来愈多的設備。莫斯科怎样才能滿足这些要求呢，要是它按照計劃必須把大量年度預算分配給輕工业和农业的話。

在这个所謂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富国和穷国的共处充滿着民族对立，正像資本主义国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間充滿着階級冲突一样。这是中苏关系幕后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只是沒有說出来吧了。）

信不信由你，《綱領草案》总共只用了十六个字談中国和中国革命——十五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前景所引起的困难和不靠遮遮掩掩是解决不了的。北京沒有掩盖它对《綱領草案》的不滿，它对于这日益加深而且必然会深刻化的分歧，无疑地将会有更多的話要說。

\*                                 \*                                 \*

如果說苏联和它的集团的发展計劃并不像《綱領草案》所描繪的那么簡單和美好，那么世界事态的前景也不那么簡單和美好。这里我們只能談談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問題：战争危險与爭取和平的斗争問題和爭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战略問題。

（苏联）共产党总書記說，他对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估計和列宁的估計不同。列宁教导說，战争和剝削一样，是資本主义的一个去不掉的特点。他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写道：“只要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我們就不能在和平中生活。”扑灭战争和取得世界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由革命的工人階級消灭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

新綱領根据赫魯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革新（这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做法变成正式的理論），抛弃了列宁的帝

国主义概念和与此相适应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

《綱領草案》正确地把战争危险的主要责任归诸帝国主义。集体化的、有计划的苏联经济和垄断投机商人的制度不同，它不能从军事合同中取得好处，也不为了保护或增加私人企业利益而培育国外战争。只要和平共处这个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性，突出苏联外交的和平目的，这个口号就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对宣传目的也有用处。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仆从们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所采取的政策却有它另外的意义。它现在所包含的意义不仅是维持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点当然没有人反对），而且是维持利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现有关系。如果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那么它在阻碍劳动群众为了自身的要求和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它在制止战争贩子方面能起的作用。

莫斯科同华盛顿举行各级谈判，争取达成有助于保持和平和维持工人国家利益的协议，那是适当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这个目的而把有钱人的代表人物描绘成和平战士，像在“戴维营精神”达到高峰时描绘艾森豪威尔那样，那就会把人引入歧途，招致祸害。

《綱領草案》没有把和平共处这个公式拿到生活中去考验。赫鲁晓夫的理由和结论还没有把白宫、五角大楼或美国国会争取过来。肯尼迪依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蒋介石，并继续第七舰队的封锁。他和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反对古巴。可是新綱領却根本没有提到古巴，也没有把古巴列入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对最容易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古巴和中国采取这种令人费解的不关心态度呢？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工人国家的立场推翻了和平共处这个假设，暴露了赫鲁晓夫路线的荒谬呢？即使北京

和哈瓦那願意相信華盛頓的和平意圖，肯尼迪政府的敵對態度也會很快把這種幻想驅走的。事實上，就是在這一點上資本家也並不完全同意莫斯科。

這種新的啟示的論據是，能夠做到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裁軍，能夠做到使它們的戰爭能力成為無效，但不是通過工人奪取政權的辦法，而是通過以蘇聯和它的盟國的壓倒優勢為中心的世界力量對比的变化。因此，即使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繼續存在，而且有五十倍以上足以毀滅人類的氫彈，戰爭還是可以避免的。

列寧支持資本主義國家中要求裁減和停止軍備的反軍國主義群眾鬥爭。但是他總是不忘記指出，只要壟斷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者還控制着經濟和政府，他們就能夠很快地重新武裝起來。不從經濟上剝奪資本家統治者，並在政治上取而代之，單純軍事上的裁軍是不會行之有效的。

但是赫魯曉夫却暗示說，只要達成全面裁軍，就能保證世界和平。他還進一步辯解說：蘇聯的軍事優勢和核武器的高度破壞力使得誰想發動戰爭或進攻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不可能，不可想像，除非他是瘋人。

綱領婉轉地表示，到現在為止能夠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於蘇聯的威力和它的和平共處政策。事實上，中國和其他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力量對比中所引起的改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製造者所起的約束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因素。但是，這個事實證明正確的是列寧的對帝國主義國家推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的路綫，而不是斯大林調和路綫。

為了防止戰爭威脅，綱領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不發達國家的“中立主義的”資產階級領袖和西方國家中的“愛好和平的”資本家

身上。綱領从本质上把資本家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类：販賣战争的資本家和爱好和平的資本家。这个文件宣称：“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則也符合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們理解到热核战争也不会饒恕资本主义社会的統治阶级的。”

綱領沒有說明應該把肯尼迪放在哪一类人中間——和平共处的支持者，还是战争狂热分子。这种对大大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軍国主义政府首脑的作用的故意的含糊态度，泄露了莫斯科和平政策的反列宁主义的基础。赫魯晓夫正在扩大斯大林所采取的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合作建立“人民陣綫”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三十年代把工人們引上了歧途，却又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列宁的綱領不是把爭取和平、社会主义和保卫一切革命成果的斗争仅仅寄托在苏联的资源身上，而是把它寄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尤其是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堡垒中去。一切問題的解决有賴于阶级斗争的发展，有賴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得政权。

赫魯晓夫的綱領却提出一条不同的路綫。不断扩大的經濟成就将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它們将不仅解决一切国内的根本問題，而且将挫敗地球其他部分的一切反对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压倒优势、威信和压力将能爭得和平，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軍，并挫敗他們重新征服世界的阴谋。此外，通过加强工人的力量和士气，苏維埃集团的进步将創造把政权比較容易地过渡到反垄断力量联合执政的条件，甚至可以保証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件中有許多关于需要进行斗争的話，目的是想用一些騙人

的字眼来調和不可調和的利益冲突和互相对立的观点。民族主义分子和国际主义者,主张阶级妥协的人和主张阶级斗争的人,斯大林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都能从文件中找到肯定自己立场的段落。因此,就在关于一部分有和平倾向的资产阶级这一段話前面,綱領告訴我們說,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提供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說,和平共处路綫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既推进工人的阶级斗争,又符合他們的爱好和平的阶级敌人的利益!誰能在这种故意制造的混乱中分清是非?

事实上,斗争的号召只是一种裝飾,实际上它是从属于企图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达成某种合作和妥协这条主要路綫的。真的,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真能保証和平,又能做其他許許多多的事的話,那么资本主义統治下的工人們尽快摆脱他們的压迫者和剝削者的那种生死攸关的要求又怎么說呢?

新斯大林主义路綫的要旨就是:社会主义力量甚至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中心的一切反对者,不是通过内部阶级力量的榜样,而是通过苏联的榜样这个外部力量。进化与渐进主义高于独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群众行动。这种希望(它曾經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改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变成了莫斯科国际政策战略的基石。

問題在于,工人的阶级敌人同样也很好地从工人国家的进步中学到东西。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并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威信时,帝国主义者会繼續退却,站着不动嗎?他們会慷慨地放弃他們的統治和特权,还是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来保卫它們呢?古巴提供了一个新的例子,說明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不可妥协。

对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來說,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最有利的发展

上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跟在莫斯科的背后，并把它作为实际政策的軸心。工人们现在需要少一些人来鎮定他們，多一些人来激励他們，激发他們同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进行搏斗，鼓舞他們用自己自觉的行动去結束这个制度。

赫魯晓夫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說：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吧，承认世界力量的新对比，在柏林問題上达成協議吧。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步的，首先因为他們害怕今后的变化产生对他們不利的后果。他們不会眼看着自己的权力不断遭到浸蝕而不采取激烈的反措施。

那么，既然这个世界正被殖民地革命和各种各样反对旧秩序的群众运动所震撼，而大企业主又頑固地不讓他們达到目的，資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間和它們的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維持几十年呢？这个文件赤裸裸地提出了这个世界政治中的根本問題，当然沒有給它回答。

正当柏林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把和平共处提出来当作爭取和平的万灵丹看来是不适时的，甚至是不适当的。讓我們假定这个危机像苏維埃集团和西方国家之間的其他危机一样都克服了，但是当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依然被控制在軍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資本家手里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保証永远避免最后摊牌呢？

文件沒有提出什么可靠的保証；它提出了各种条件以留下后路。但是問題的焦点正在于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拥有权力的資本家对于战争的約束——的有效性。只要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們不能为帝国主义陣营中傾向和平的分子的胜利写包票（甚至就算他們写了包票），那么，他們所提出的把人类命运完全寄托于

此的建議，至少也是有問題的。

綱領提出的預防戰爭的藥是建立在一種還有待考驗的、基礎不穩的假說上面的。它假定沒有任何情況能驅使帝國主義者進行核戰爭，因為核戰爭是違背他們本身利益的。只有瘋子才會走這條路。然而，甚至今天，華盛頓還有人叫喊着要在柏林問題上冒戰爭的危險。沒落的階級為了防止自己的滅亡，最容易採取喪失理智的行動。

實際上，和平共處政策所依靠的，並不是蘇聯的壓倒優勢，當然也不是工人奪取政權，而還不如說是資本家們對抗戰爭對自己會造成的後果的害怕。即使反對他們的社會主義者不逼他們，清醒的考慮也會使他們相信和平要比原子屠殺好。他們就會樂於退却。失敗、被剝奪，而不去發動核毀滅的戰爭。

這個立場把爭取和平鬥爭的基礎從一個階級力量轉移到它的反面。列寧認為，戰爭的推動力是帝國主義所固有的，帝國主義制度遭受的威脅愈大，戰爭危險就不是減少而是增加。肯尼迪總統在他最近的講演中說，這個國家的政策最終是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緊軍備競賽的做法和它在柏林問題上的態度證明，綱領認為已經過時而加以拋棄的列寧觀點是正確的。

赫魯曉夫的綱領磨損了階級鬥爭的鋒芒，有利於階級合作。正如綱領要蘇聯工人充分信任斯大林的開明的改造了的繼承者一樣，它也勸告西方國家工人押下全部賭注去改變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性質和路綫。工人們不要靠自己獨立的階級組織和階級行動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保衛自己的福利，而是應該設法去同資產階級統治者中最通情達理的部分進行聯合。

這對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意味着什麼呢？從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葛斯·霍爾在7月16日《工人週報》上發表的政策聲明中可以得

到回答：“形势要求把主要打击方向针对战争贩子和法西斯势力，这些人正在迫使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向后转。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尖锐批评肯尼迪的每一个有利于右派的政策和行动。应该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使其政策朝着和平共处和保卫民主的方向转变。”

这就是新斯大林主义纲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运用。不是把肯尼迪看作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领袖，而是把他看作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的牺牲品和攻击对象。今天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进行斗争和揭露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的作用，而是去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的政府走上民主进步的轨道。霍尔对我们说，前任是赛兰克林·罗斯福，即史密斯法的签署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和平和民主中完成他的总统任期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政治生活中共产党的和平共处路线的真实意义。作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信徒，我们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它已使美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接受这一路线而蒙受了許多损失，甚至赫鲁晓夫的显赫的威信也已经蒙受了损失。

（译自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1年秋季号）

## 十四、官僚們的藍本

——湯姆·甘普

### 官僚們的藍本——蘇共綱領草案

要令人滿意地處理一項錯誤往往要比表達這項錯誤的意見本身花費更多的篇幅。要詳盡地分析蘇共的新綱領草案將需要比六整份《新聞通訊》還要多得多的篇幅。蘇共新綱領草案里面的省略、歪曲、捏造和矛盾是數不盡的，只有徹底地研究目前蘇聯經濟狀況，才能對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的前景作出估價。

考慮這一個文件的出發點應當是先了解一下它的制訂者和它的背景。當然它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第三個綱領，而是為盜取它的名義的官僚篡奪者進行思想辯護。它是在世界歷史的緊急關頭產生的。這些人掌握着養成他們自高自大同時也使他們自己感到害怕的巨大機器。他們希望有一個平靜的生活，一帆風順地發展。可是現在是熱核子時代，世界資產階級對於直接威脅着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國家的工業高漲正感到沮喪不安。而且，在國內，他們必須對付蘇維埃無產階級的无情的壓力；在國際上，他們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指導。

這種矛盾產生了理論上的混亂和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諾言——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而在實質上則是根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於是官僚機構就利用列寧作為一個無害的偶像來掩蓋同列寧的真正學說的背離。它最需要的下列教條都按上列寧所作：“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平共處和議會道路。至於長期以來作為他們的

导师的約瑟夫·斯大林，已成为反对个人迷信的牺牲品，甚至連一次也沒有提到他：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布尔什維克”呢？他們可以郑重其事地叙述苏联的历史而只字未提作为共产党的領袖将近三十年的人。如果对过去的事情尙且不能老实对待，我們如何設想关于未来的諾言呢？

这些省略比文件中的許多正面的說法更能說明問題。它們証明了特别是由于苏联人民的压力所引起的深刻不安。现在官僚机构不得不讲他們的好話，这是从来沒有过的：它把过去的成就归功于他們，力促他們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将来享受利益。

对世界形势的全部分析暴露了苏联統治集团的恐惧和願望。他們有意或无意地低估了世界資本主义的力量。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說明。

“資本主义的自动化夺走工人的面包”。“很大一部分生产設備开工不足，然而在企业的大門之外却有成百万的失业者”。“工人階級的經濟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說来，他們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状况却在恶化”。以上这些說法，沒有提到時間和地点，而且与当前趋势极相矛盾，也許有助于使苏联工人忍受下去；假如官僚机构相信这些說法，那末他們在国际政策方面犯了若干重大錯誤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們认为資本主义由于它自身的矛盾正在崩潰。

这样一种观点符合官僚机构要求平靜的生活的願望。为了实现它向苏联人民提出的諾言，它要求沒有波折的和平发展，它要求資本主义世界不必經過什么斗争而会自己心安理得地走进历史的坟墓。如果现实本身沒有滿足这些願望的話，綱領滿足了这些願望。它希望避免革命的冲突，能够在先进国家和新独立国家中找到可以同他們打交道的部分資產階級。它看到了沒有贏取过的胜

利，并織成了一付自我妄想的网。所有这些主观估計所包含的“理論”决不是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或任何类似思想的貢獻。它不外是官僚机构为了維護其在國內的地位而希望能够执行和求其实现的某种行动路綫的思想辯护。

事实上，理論来自实践。因此，虽然許多共产党的老实的黨員真心地接受这个理論——因为这个理由，它不得不包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詞句——，它的根源是純粹机会主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須給予迎头痛击。

官僚机构关于革命、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論，很明显的是希望在資产階級中間寻找同盟者。

在关于“反垄断組織的洪流”、关于“广泛民主”、关于爱好和平的資产階級的言論中，隱含着新的“人民陣綫”的思想——即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它将以保持資本主义基本所有制作为代价使和平共处的政策得以实现。把主要的打击指向垄断組織，于是可以迫使統治階級“停止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放弃发动局部战争，把經濟用于和平目的”。在这方面，各国共产党将执行一項改良主义政策：“打退法西斯反动势力的进攻，实现全民族的和平綱領，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就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二十五年来所实行的政策。

于是，可以分阶段地——綱領对于“阶段”的主张是强烈的——爭取到“在有利于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共产党和他們的同盟者可以取得議會中的多数，使議會“从为資产階級的階級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并为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它还可能包括向資产階級进行“贖买”；这种官僚机构的荒誕的梦想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企图用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和“非和平（注意：不是‘暴力’）过渡”的可

能性的言論來為它本身的枯燥無味進行粉飾（為了真正的戰鬥者的緣故）。事實上，綱領是無拘束地剽竊社會民主黨的舊的最低綱領。

為新獨立國家開的方子也有類似的情況，甚至對於與部分資產階級結成“聯盟”的可能性更加明確。於是提到“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程度，在不小程度上（！）取決於工农聯盟的鞏固性”。雖然它承認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將會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妥協，有的將會“代表國家作出让步”。這就為共產黨同納賽爾和卡塞姆之類的人實行策略性的聯合開放綠燈，實際上，在這種聯合中作出让步的只會是在共產黨方面。

在國際方面，綱領堅持“符合於全人類的切身利益，只有大壟斷巨頭和黷武主義者除外”的和平共處政策。在愛好和平的資產階級和“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實行獨立的對外方針”（例如？）的小國的幫助下，在世界部分地區存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能夠遏制帝國主義者。簡而言之，官僚機構不過是編造另一套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為了戰鬥者的利益打算）而美其名為“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但是這種“階級鬥爭”顯然是列寧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整個“理論”不是從現實世界出發，而是從官僚所期望的結果出發，的確，如果要使綱領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諾言接近於實現，必須有這樣的結果。

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即下文《八十年代的共產主義》——編注）中談論這第二部分。

（譯自英國托派刊物《新聞通訊》1961年8月19日）

## 十五、八十年代的共产主义

——湯姆·甘普

明眼的左派和同路人将会以敬畏的心情冥想著《綱領草案》的諾言中所提出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的蘇維埃社會。頑固的黨徒們將會根據東德的事件更加堅持這個文件的宣傳價值：反共專家們將會斥責它是欺騙或試圖估計它對於兩個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具有什麼重要意義。

只有根據歷史和對今日蘇聯社會力量的分析來判斷這些諾言，才能得出正確的估價。綱領的目的是為了使現在的統治集團——那些在一個由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革命所產生的國度里擁有實權並享有非份特權和美好生活的人們——能夠繼續統治下去。

在每一頁，實際上在每一節都能看到來自下面的壓力；建議和諾言被用來應付具體的不滿和信仰與事實之間的矛盾。官僚機構力求對它現在不得不作出的讓步加以限制；它力求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因此它需要誘導群眾忍耐，告訴他們一切美好的事情將隨著時間而到來。但是它還必須用物質的引誘和諾言，並且在言（以及最低限度的行）方面接近於真正工人階級國家的要求，以爭取他們的合作。

綱領無疑地是一件聰明巧妙的作品，它的意圖在於掩蓋一切不滿，而沒有作出任何真正的讓步。

而且，儘管管理不善和有著相當程度的貪污，但是計劃經濟的

无可怀疑的成就意味着生产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只有这一点使人对于整个綱領在外表上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必須記住，尽管苏联声称已經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但这并不能阻止苏联暴露出許多明显弱点和矛盾的真实状况。官方詭辯家們甚至吹噓得更加厉害，他們声称經過二十年的訓練、倡导和参加(建設)之后，天国就可在望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没有根本改变。

苏联发展的不平衡，落后现象与声称已經建成“社会主义”之間的不調和，在綱領中也得到了証明。当綱領提到每一个家庭将有“舒适的、合乎卫生和文化生活要求的住宅”时，它說明有成百万的苏联公民现在面临着不舒适的和过分拥挤的住宅問題。现在正在兴建的許多住宅只够供应住宿的勉强需要，如果人类避免一場核战争的話，它們大概不会在二十年內全部毀掉。

当綱領提到需要建立有許多支綫的公路网时，它表明目前在公路和汽車运输方面大大落后，对于幅員广闊的国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強調加强电气化的需要表明必須开发許多能源以弥补电力供应与需求之間的鴻沟。为了克服这些缺陷，需要作很大的努力，需要庞大的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水泥、鋼和重型設備。

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經濟較之資本主义經濟有可能更充分地 and 更順利地发展自动化，这是事实，但是苏联經濟的现有水平意味着要实现綱領还必须迅速发展那許許多多自动化条件受到限制的部門。

这一切就是說，决不能有任何停頓。綱領答应要縮短工作時間，这也許是最穩当的諾言，比起答应給予更多更好的物資的具体保証将能够更容易实现；假如必要的话也便于收回。

关于綱領所假定的发展速度能否真正办到是无关重要的。計劃經濟的能力是很大的，特别是有了自动化和技术改革，而且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在提高。苏联肯定将需要扩大貿易，不仅是扩大本集团內的貿易，而且是扩大同世界市場的貿易。在伦敦、巴黎和东京举办的商业博览会并不是为了資本主义商人的利益。和平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有了和平，計劃就可以实现，或者如綱領所說的那樣；沒有和平，資源就要从建設性的投資与消費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于是，同資本主义打交道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是原則的表现，而是根源于官僚机构为保持其在國內的地位的需要。

綱領的其他部分也同計劃經濟管理方面独断专权过多而真正的民主管理不足的問題有直接联系。綱領談了許多“参加(管理)”、訓練和关于“精神刺激”亦即自願合作的必要，这証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这种自願合作并不始終是现成的。至于自上而下沒有負起真正的責任，以及綱領中提到的苏維埃已成为統治集团的管理机器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如此，但是(綱領中)关于政治改革部分还是直接产生于下层群众要求有更大的权利参与决定事情。

綱領的作者对于现行計劃制度中的缺陷自己是敏感的，虽然由于他們本身的社会地位，他們对于这些缺陷的真正原因是不清楚的。必須把(綱領中)关于“預先防止經濟比例失調”、消除“地方主义和狹隘本位主义的因素”、更多地注意成本核算和价格制度的号召，同工业和集体农庄中管理不善、經營无方連系起来看。赫魯晓夫本人經常不得不表示反对那些不仅占取正常的津貼金而且刮取大块社会糕餅的个人或集团。总之，在过分強調物质刺激的地方，个人采取非法形式追求私利是不足为奇的。

官僚机构羞怯地提到不平等的問題，这显然是每个苏联工作

場所和公寓住宅的一个迫切問題。他們問道：“社会主义”是不是按劳付酬？官僚机构企图掩盖关于他們自己就是劳动价值的評定者的事实，而声称不平等的存在不过是由于劳动的社会价值不同所以酬劳不同的問題。他們坦白地宣称，这种不平等将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而逐渐縮小。然而不可掩飾的是，还有許多低工資的工人，根据諾言，他們的收入(包括公共福利)在今后二十年內須提高三倍才能使他們滿意。真正的關鍵所在，而必須用詭辯的彈幕加以掩護的，是上层的不相称的報酬，富裕的日子还遙远得很，当前的問題是要想办法使人民能够自願合作而又不用交出目前享有的任何特权。要保持这些特权将是一項棘手的工作，它将不是綱領所能办得到的。

(譯自英国托派刊物《新聞通訊》1961年8月26日)

## 十六、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

——厄内斯特·杰尔曼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共经过了三年。在短短的三年里，人们很难相信居然会发生了这样一系列带有戏剧性的事件：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从“百花齐放”转变为“整风运动”，新的南斯拉夫问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在苏联把工人和工厂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初步措施——人们很难相信在一个被某些人宣称为已经凝固了的社会里，这些不断的变动居然是按照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节奏发生的。

这些变动的性质并不都是相同的。它们在这边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加强，在那边又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减缓。在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的政治革命规模之大，使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感到吃惊，他们力图重新建立一种比较严格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纪律。这就是新“南斯拉夫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地为斯大林本人“恢复名誉”的原因。同时，赫鲁晓夫集团为了消除群众不满的最尖锐的实际根由，又比过去更为积极地推行它那对工人特别是对农民作经济让步的政策。

赫鲁晓夫政策的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不久就显露出来了。他的政策虽然确实成功地延缓了苏联国内冲突的爆发，但却没能把劳动人民和青年的精力导向纯粹生产的目的和“物质享受”。工

厂管理問題，人民的子女如何自由地获得大学程度的知識的問題，关于文艺創作自由的爭論——所有这些都严酷地提醒統治阶层和无产階級群众說：如果苏联社会要实现那些现在看来似乎有可能的宏伟的願望，那么，它所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問題，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政治的問題。

### 工业繼續高涨——但是速度稍稍放慢了

1956年以來，每年增加的生产量和投資量匀称地表明工业高涨的情况。然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第六个五年計劃中斷了，它现在为1959—1965年的七年計劃所代替——說明工业发展的速度已經稍稍放慢，也說明在1960年还不可能达到第六个五年計劃所规定的目标。

七年計劃的指标发表以后，在資本主义世界里造成了很深刻的感情冲动；看一看这种冲动情况，是很有趣的。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专家們”的說法，这些資本主义的先生們一向自己觉得心安理得，认为苏联經濟增长率之所以很高，乃是由于它那“不发达”的性质。他們总是把苏联經濟的增长率和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期間里美国經濟的增长率相比較，或者和从1890年到1938年这段期間的日本經濟的增长率相比較。

对于这些資本主义的辯护士來說，不幸的是，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仍旧至少比資本主义各国在最好的情况下的速度快一倍——而且甚至在已經达到世界第二个工业大国的发展水平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一速度。資本家們感到吃惊了，他們现在正在发掘这种几何級数的奥妙。要使鋼产量每五年提高50%或60%，当問題是把产量从四百万吨增加到六百万吨，或甚至从二千万吨增加到三千万吨的时候，那是一回事。可是要在十年內把产量从四千五百

万吨提高到九千万吨,然后从九千万吨提高到两亿吨,然后……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令人眩惑的。然而,计划经济就有这种不可改变的力量,尽管官僚主义对它起了妨害作用。

要根据七年计划的指标来评价展示在苏联面前的前景,我们可以首先假定这些指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这样做,因为这些指标,和最后两年的指标一样,要比前一些时期的目标更为适度,而且似乎是为了能够稍稍超额完成而选定的。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指标过高。我们已经说过,它们实际意味着苏联工业增长的一般速度已经稍稍放慢了。需要举一些例子吗?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 1960 年的钢产量是六千八百万吨;按每年增长 8% 来说,到 1965 年就应该是一亿吨。事实上,七年计划规定的 1965 年的钢产量只是八千六百万吨到九千一百万吨。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 1960 年的电力生产是三千二百亿瓩时。现在在每五年的期间里,电力生产总是增加一倍或不仅是一倍。这就会使 1965 年的电力产量达到六千亿或六千五百亿瓩时。而七年计划规定的 1965 年的电力产量只是五千亿到五千二百亿瓩时。

至于煤的产量,规定在整个七年里只增加 20% 到 23%,这就是每年增加 2.5% 到 3%,这显然是把扩展速度放慢了。这种放慢无疑部分地是出于故意的,它是改造动力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电力和重油来代替煤。

可以作出结论说,虽然苏联的工业仍然保持它的活动力,可是赫鲁晓夫在改革工业管理制度和建立各地国民经济会议时所许诺的巨大好处,在实际生活中却几乎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工业方面的分权化虽然有助于消除那最可怕的官僚主义的过分集中化,

它却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地方独立主义，而官僚主义者的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实行这种计划的主要动力。《经济问题》杂志（1958年第八期）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各地国民经济会议在各种生产方面对于计划都作了一些任意的修改，这些修改和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谴责的各工厂、各总局、各工业部领导人所做的修改，是十分相似的。

新的七年计划的最不对头的情况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预计增加额。据说工业中的总人力将增加20%，可是工业生产将增加8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要增加50%，即每年平均增加6.5%到7%——这样一个平均数！同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减至四十小时，而在繁重和消耗体力的工业部门中将开始实行每周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制。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每年增加率就将达到8%或9%。的确，七年计划强调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自动化；许多技术刊物或科学普及刊物都提到制造机器工具的流水作业法或完全自动化的滚珠轴承制造法。

然而，可以设想，在这七年里人力不足的问题一定会变得十分尖锐；要完成1965年的指标，还是需要使用比原定计划数字多得多的工人。在这方面，苏联农业如果能够有效地加以合理化，是可以拥有巨额的人力后备军的。可是在将来它不见得还是为工业提供足够的人力的来源。官僚主义者似乎宁肯依靠……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认为他们是“额外”人力的来源。

重要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说法——在1965年苏联的生产将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按人口计算将超过欧洲并接近美国的生产水平——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关于美国，赫鲁晓夫的说法为广大群众所误解，也为报刊所误解了；他的说法实际上要比外表上谦虚些。赫鲁晓夫没有说苏联

要达到 1965 年的美国生产水平；他是說苏联在 1965 年将达到接近于 1958 年美国生产水平的水平。这两种說法的不同是馬上可以看出的；认为它們相等，就意味着美国的生产将有七年停滯在衰退的水平上。这种假定显然是不实际的。

其实，不應該比較两国的现时的生产量，而應該比較两国的按人口計算的生产能力。现在，就一系列工业部門来說，美国的这种生产能力即使在衰退的时期里也不断发展。例如在 1958 年，尽管經濟衰退使得鋼的生产能力的 40% 被閑置起来，可是这种能力仍然增加了 4%。这是因为，美国資产階級在这些基本工业部門进行投資时，不再是以經濟标准作为他們的指导，而是以有关軍事力量的政治标准作为他們的指导。国家可以弥补私人資本家的不足。当每年的軍事預算达到四百五十亿元、五百亿元或五百五十亿元的巨額时，十分明显，用这些数字的 5% 或 10%，就能够发展基本工业部門的生产能力，以便維持对苏联生产能力的一定优势。

这样一种发展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一定会对整个經濟和貨幣結構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但是，在今后七年到十五年以內，这种发展还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們承认在这一期間里，美国的生产能力平均每年增加 2.5% 到 3%（这一数字比 1940—1958 年重整軍备和战争时期的平均数还稍低一些），那么，我們就得出下面这张表：

撇开水泥不談，苏联和美国基本产品按人口計算的产量之間的差距将仍然是很大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将更大。至于西欧各国，不易进行比較，因为很难預測这些国家在十年至十二年以內的一般生产增加速度。不过，那种认为到 1965 年英国的鋼产量为二千八百万吨、西德为三千二百万吨、比利时为八百万吨的說法，

	1957		1965		1972—1973		1972—1973	
	美国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按人口計算	苏联 按人口計算
石油(百万吨)	354	98	425	240	500	390	2.8吨	1.8吨
鋼 (百万吨)	146	51	175	90	200	130	1.15吨	0.6吨
电力(百万瓩时)	716	210	850	520	1000	900	5700瓩时	4100瓩时
水泥(百万吨)	53	29	65	81	75	116	430公斤	530公斤

可以被认为是很现实的。<sup>①</sup> 这就是說,这三个国家按人口計算的鋼产量将分别为五百四十公斤、六百公斤和九百公斤,而苏联在这一年的按人口計算的鋼产量則是四百一十公斤。电力和大部分耐用消费品(汽車、摩托車、家用电器、住房等等),也是这种情况。然而,苏联紡織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按人口計算的产量在 1965 年可能超过西欧各主要国家。像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荷兰这样的国家,它們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可能已經达到或接近苏联的水平。

### 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放慢了, 但分配有更平均化的趋势

在輕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七年計劃所规定的各种指标还不如重工业的指标可靠,我們必須更加有保留地来看待它們。只須指出这一事实就够了:七年計劃规定 1965 年的谷物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这一指标原就是第六个五年計劃早已为 1960 年规定的指标,甚至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計劃为 1955 年规定的、但在过去四年內远远沒有达到的指标。

关于糖的产量,米高揚早已答应从 1955 年开始就要达到七百

<sup>①</sup> 在 1957 年,这三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分别为二千三百万吨、二千七百万吨和七百万吨。

万吨(1953年10月25日《真理报》),可是1957年的产量才达到四百五十万吨。所以,为1965年规定的九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数字是使人怀疑的。棉織品的产量在五年里只从五百三十万公尺增加到五百八十万公尺,也就是說,增加得还不到10%;在以后七年里預計要增加50%,誰能相信这个数目能够达到呢?关于耐用消费品(摩托車、电冰箱、縫紉机、洗衣机等等),馬林科夫和米高揚在1953年曾作过非常动人的諾言,现在甚至不再为1965年提出确切的指标了:总的說来,为1955年规定的一些指标,甚至到1957年还没有完成:

	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1957年的产量
棉織品	6,200,000 公尺	5,600,000 公尺
皮鞋	318,000,000 双	315,000,000 双
自行車	3,445,000 辆	3,300,000 辆
縫紉机	2,600,000 架	2,300,000 架
电冰箱	330,000 只	309,000 只

某些农产品的情况更糟。关于牛油的产量,米高揚許諾說,不包括农民自己食用的部分,在1955年要达到五十六万吨,1956年要达到六十五万吨。可是1955年的产量只达到四十五万九千吨,1956年只达到五十三万吨。甚至在1958年,根据赫魯晓夫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所做的报告(1958年12月16日《真理报》),牛油产量也只是六十二万二千吨,仍然低于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关于肉类的产量,赫魯晓夫很謹慎地使用“活牲畜重量”的数字,而不使用产量数字。可是米高揚曾許諾說1956年的肉类产量是三百万吨,再加上肉制品产量一百万吨。赫魯晓夫說1958年“活牲畜的肉”为五百四十万吨,这一数字肯定低于上述1956年的两项指标。

在这方面,赫魯晓夫对于馬林科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

击主要是說，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似乎提供了錯誤的关于谷物产量的数字，說的只是**未收割的**产量，而不是已經收割的产量。事实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里**，都是采用这种办法。赫魯晓夫本人，当他負責苏联农业时，也是使用这一办法。这个办法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被糾正了，作出这个糾正的是馬林科夫（1953年8月9日《真理报》）；赫魯晓夫在一个月以后，在1953年9月3日对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农业問題的发言时（1953年9月15日《消息报》），又重复使用这一办法。所以，用这根旧棍子来打馬林科夫是不大合适的。

必須承认，赫魯晓夫在开垦“处女地”上所下的賭注，到现在并没有产生什么确实的成果。一般地說，每两年可以有一个好的收成，而这和这些地区的旱涝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出售农业机器或其他有助于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对于苏联农业将会有持久的影响——只要在价格方面不采取冒险主义的措施。

七年計劃规定工人收入要增加40%，此外还要把每周的工作時間縮减为四十小时。如果把最低工資的增加（这将是很大的）考虑在內，**平均工資**将只提高26%（1958年11月26日《真理报》）。这說明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大大放慢了；在1952—1959年这一期間里，工人生活水平无疑提高了50%以上。生活水平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又将回到2.5%和3%之間；这一速度还低于过去七年內像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或比利时这类国家里的趋势。

另一方面，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靦靦覷覷**地宣称要在一定程度上拉平薪金待遇，消除过分不平等的情况，并且已在养老金方面实行了，现在則要更加大胆地加以貫徹实行。上引《真理报》特

別指出，体力劳动者最高和最低工資之間的差距今后將縮減为二与一之比。它公开宣称有必要“縮小最高和最低薪金之間的差异”。的确，这同时也是增加某些官僚的收入的問題。可是，在未来的七年里低工資提高 60% 到 70%，这和平均工資提高 26% 相比，却显得十分突出。

讓我們在这里注意一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承认，现在还有成百万的苏联工人每月的收入是在二百七十卢布和三百五十卢布之間，也就是說，根据一般公认的购买力平均計算，在一万一千法郎和一万四千法郎（二十七美元和三十五美元或十英鎊和十二英鎊十先令）之間。甚至还談到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工資收入者的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五十卢布。即使他們享受免費医疗和很低的房租的好处，这种收入水平也是非常之低，是在像现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很发达的国家里所不应有的。

即使有这些保留，可是事实上在过去五年里，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要了解这点，只需把一般使用的消費品的产量加在一起，再和苏联家庭的数目比較一下就可以了。在过去五年里，共生产了二千万个无綫电收音机和电视機，将近四千万只手表，一千八百万辆自行車，七百五十万架縫紉机，四百五十万架照相机，一百万架洗衣机。要求得未来七年里的产量，我們可以用二来乘上述的数字。至于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数字，我們还必须用六或七来乘；这显然說明，在这一段期間里，苏联人民将得到可以和許多中欧西欧国家相匹敌的文明生活的物质基础。除此以外，还有在建筑住房方面的巨大努力；这在今后七年里將創造出七十亿平方英尺的居住面积，从而把城市中按人口計算的可用<sup>①</sup>面

① “可用”比“可居住”更合适些，因为“可用”面积包括厕所、浴室、厨房、走廊、阳台等等。在西方，关于“可用”面积的統計是不很明确的。如果把每所房屋的可居住面

积提高到一百九十四平方英尺左右，也就是說，为 1928 年的三倍多，而且是一个敌得上西欧国家的数字。

### 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压力日益增长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社会现实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要限制經理人員在工厂中、官僚机构在国民經济中的无限权力的趋势。这些趋势乃是反斯大林化和譴責“个人迷信”的必然結果；它們早在 1953 年就已經露出苗头了。这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其国内无产阶级不得不作的有历史重要性的让步。这同时也是官僚机构所具有的唯一的手段，可以用来延緩南斯拉夫、波兰或匈牙利式的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出现的时间；这种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共产党人和青年的先鋒队之間，已經成为而且现在仍然是討論的主题。

1957 年 12 月，采取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来加强工会在工厂中和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权力。1958 年 7 月，最高苏維埃的一项法令确认并进一步扩充了这些权力。最后，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會議也显出工会特权有进一步扩展的迹象（1958 年 10 月 22 日《劳动报》）。在这許多法令和条文里，我們可以看出三种趋势：

(1) 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关等等方面的管轄权增加了。工会实际上接管了区級和地方級的社会保险机构。它們获得分配住房、供給食品、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企业等等的权利。因此，工

---

积平均算作一百七十二平方英尺，而可用面积是这一数字的 125%（这是专家們通常使用的計算方法），那么，1955—1957 年这种按人口計算的可用面积数字如下：意大利，一百七十二平方英尺；西德和法国，一百九十四平方英尺；荷兰，二百三十七平方英尺；英国和比利时，二百八十平方英尺；美国，三百零二平方英尺。

会就取得了一种广泛的自主的物质基础；它們实际上管理着的基金每年达到几百亿卢布。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并不怎样受工人的欢迎。他們到处都能够自由地表示他們的意見（1953年6月16—17日在东德，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957年夏季在波兰），他們宣称他們反对由工会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他們所要求的是，在他們和官僚机构有矛盾时，工会要保护他們。虽然如此，工会自主权的扩大，尽管工会还帶有官僚主义的性质，也为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例如要求由工会管理社会工业或甚至整个輕工业——开辟了大門。

(2) 采取了一些“生产的”措施，这意味着工会有权監督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和“干部”并对他們采取强制手段。这一趋势在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會議的決議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一文件是完全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問題为中心的，它在工人中間不会引起很多好的反响，但是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却要扩大工会对于工业行政的監督权；要建立一些“監督人”小組；由他們来检查工厂的工作；要强使企业领导人采用这些小組所建議的措施。这终于发展成为这一真正使人惊奇的說法：“冶金和化学工作場所的建筑工程，必須受工会的監督。”

(3) 改变了工厂中的等級結構，增加了工会在工厂內部的权力。的确，这些特权是由各种各样或多或少是“代表的”或“选举出来的”机构来行使的，而从来不是由工人群众来行使的；可是，这种变化很深刻，它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废除了斯大林时期的反动的“改革”，并且恢复了1928—1933年这一期間的慣例，这时苏联的民主在政治的領域中已被取消了，只是在工厂里还留有一些重要的痕迹。

就这样，經濟領導人員和工会委员会人員（它的专职干部），每

年共同拟制集体合同的草案。工会委员一般都参加各个阶段的编制计划工作。工会委员会是受这些官僚主义者的支配的，可是在工会中，真正的多数属于一般工人——例如在一家有七千工人的工厂中，工会委员是二十一人，其中只有六个专职干部。这类工会委员会现在有权检查和监督关于制定生产定额和薪金标准的问题，关于雇用和解雇工人的问题，并有权作出关于计划和集体合同的决定。

此外，这些委员会还“有权听取”（原文如此）经理和总工程师所做的关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16日《真理报》），也有权对于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表示意见”。最重要的是：工会委员会现在对于工厂内部的一些“小的纠纷”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在每一企业中，都有一些特别委员会（由工厂领导的代表和工人的代表所组成，人数各占一半）来处理这些纠纷。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就要把问题提交给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要提交给地方的工会委员会）。工会组织的决定是最后的，企业领导必须执行它的决定。

尽管工会的官僚主义者在这些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这也是为工人所欢迎的一种改革；工人们认为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对于工人来说，掌握工会职员要比掌握企业干部容易些，而且对前者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还应该注意的，一些更为广泛的组织，例如“工会的积极分子”或“生产者会议”（然而，在大工厂中，这种组织的成员在工人中所占比例很小），也参加关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讨论，不过只能单纯地提供意见，而没有决定权。

虽然没有像在南斯拉夫、或在匈牙利（1956年10月28日到11月）、或在波兰（1956年10月到1957年夏季）那样取得工人管

理工厂的形式，苏联工会特权的这种增长也增加了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官僚机构中那些最“规规矩矩”和“作工作的”人们的权利，这些人是跟无产阶级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苏联工人的压力越增加，官僚机构中的这一部分人越被用来作为一种“传送带”，这些人就越将从两方面发生这种作用：在一方面，他们从官僚机构上层人物那里接受指示强加在工人身上以换取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把工人的要求传达给这些上层人物，而这种要求就是他们自己为了能够做“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保证人而必须部分地加以采用的。

### 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工人开始参加工厂管理——所有这些改革在苏联创造出了一种“改革的”气氛吗？赫鲁晓夫企图贯彻实行非斯大林化，同时要把它放诸政治范围之外，借以维持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和特权——这种企图成功了吗？

提高生活水平，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取消秘密警察的统治——这些自然缓和了苏联的紧张局势。我们不能不认为，可以与此相比的（自然也有些不能相比之处）是1900年的德国或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的情况；1900年的德国和“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德国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也和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不同。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改革不仅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赫鲁晓夫所下的赌注，恰恰在于他认为，如果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能有所改善，政治要求本身也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赌注是颇为现实的——尽管除了苏联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群众具有现在的“改良主义”的

思想这种原因之外，我們还必须加上匈牙利发生革命和国际紧张继续存在这两种原因。奋不顾身、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是那些工人，他們于1953年6月16日和17日跑到柏林的大街上，于10月23日跑到布达佩斯的大街上——且不談沃尔庫塔和其他集中营的叛变。絕大多数苏联工人现在已不再受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絕望、不安全和穷困的統治了。相反地，他們有希望切实可靠地改善他們的命运——只要不发生战争。

但是，正是因为他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种改进，他們才能够更加关心政治問題。这些問題或許不像在1952—1956年这一期間那样带有爆炸性，可是它們仍然是很实际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提高，尽快地在各个社会生活方面取得苏維埃民主的問題就表现得越为迫切。苏联的官僚机构对于这一問題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它对于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态度可以說明这一点。

教育改革問題显然是由苏联领导人自己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里，他們說要对所有苏联青年实行普及中等教育，也就是說，要让所有苏联青年在十七岁以前都可以进入“中等工艺”学校(十年制教育)。但是經驗表明，这种逐漸的普及教育——虽然并没有普及到所有青年身上——却造成了很尖銳的矛盾。随着在中等学校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sup>①</sup>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投考大学的人数也增加了；可是大学中的位置远远少于需要。1958年9月21日《消息报》刊登了赫魯晓夫关于教育改革的备忘录，里面說在中等学校毕业而沒能上大学的学生有八十多万人。这一数字为

---

① 不要和英美的学士学位相混淆。英美的学士学位是給与大学毕业生的，苏联上的学士学位在专门术语上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毕业文凭或英国的离校证书，这种文凭或证书是使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凭证。(就学識程度來說，苏联上的学士学位实际上往往更高一些。)

全部完成了中等学校学业的学生的三分之二。<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很可以想像，爭取进入大学的斗争該是多么激烈！

更有甚者，这八十万青年人——如果計算过去三年的总人数，則为二百多万人——都在沒有受到任何实际訓練的情况下被投入生产生活了，因为中等学校的課程主要是为进入大学作准备的。

这些客观情况又由于某些主观因素而大大复杂化了；这些主观因素是在苏联盛行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所造成的。赫魯晓夫在上面所說的那篇备忘录里，极力譴責苏联各阶层的人，說他們“看不起”体力劳动，說他們为了能让他們的子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肯做，說在“取舍”学生时“勾結拉攏”、施加压力（特别是官僚們的壓力）、甚或賄賂起主要的作用。他說这些现象是由于“缺乏共产主义觉悟”而造成的。可是他應該更好地理解一下这句话：**意識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如果所有父母都想使他們的子女上大学，那是因为在苏联，“知識分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要比体力劳动者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們当然要认为孩子們上大学乃是将来出头发迹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只要一接近苏联社会，就可以証实这一論断：苏联人所以普遍渴望获得知識和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动力，即希望从事高級研究工作。

赫魯晓夫揭露了这一事实：现在官僚們的子女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占 60% 或 70%；为了籠絡群众，他断言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須加以改变。可是实际上，最后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教育改革办法（1958 年 11 月 16 日《真理报》）使工人和农民的女儿上大学**更为困难**而不是比較容易了。各种情况都表明，官僚机构在看到大学中位置有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以后，似乎不是要

---

① 据 1958 年 11 月 16 日《真理报》估計，新进入大学的学生是四十五万人。

让供给去适应需求，而是让需求去适应供给；也就是说，它毫不留情地堵塞了很大一部分苏联青年的受高等教育的道路。

的确，现在代替十年制教育的是八年制普及教育（在十五岁以前要受到义务教育）。<sup>①</sup>十五岁的儿童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参加劳动同时上夜校（每星期可能有一天或两天不必工作），另一条是上一般的工艺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进行实际生产训练。这意味着，本来被推迟到十七、八岁才做的选择，现在要被提前到十五、六岁了。一般的经验表明，儿童们越早进行职业选择，那些由于生活环境或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而对脑力工作最有准备的孩子们就越占便宜。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教育改革天然就是反民主主义的和反平等主义的。

几百万青年人在不大能增进生产率的情况下，<sup>②</sup>在工厂里每天“劳动”六小时；这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经济不会有什么大的贡献。可是，对于那些被断定要从事这种劳动的青年来说，要上大学就十分困难了。为了学习为获得上述学位所必需的功课，在每周三十小时的体力劳动以外，还必须废寝忘食地努力用功。苏联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这样学习夜校课程的学生中，获得上述学位的还不到15%。至于那些不得不边劳动边学习大学课程的学生，情况就更为不妙了。他们实际上不能学习物理学和数学——有前途的科学。苏联文化手册指出，在各夜大学或函授大学中，一般文化、社会科学、教育学、生物学各系的毕业生在1955年是五十一万四千人，而科学技术方面的只是六千一百人……

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在赫鲁晓夫的“备忘录”发表以后（这一

---

① 赫鲁晓夫说，在1958年，有20%的苏联儿童到十四岁就不再上学了。

② 赫鲁晓夫说，大多数工厂领导人不愿意雇用青年人。几年以来，在那些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中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大的失业现象。

备忘录建議让所有青年人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間的都有在工厂里或田地上每周工作二十五至三十小时的义务，并使大学生都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义务)，参加这一討論的苏联主要科学家都认为(話說得很有分寸，但是很清楚)，这种改革有破坏苏联科学研究热潮的基础的危險。科学院院士謝姆佐諾夫在1958年10月17日《真理报》上說，最重要的是让大多数学生不間断他們的学习而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因为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創造能力來說是必需的。他还明确指出，大学生要做的实际工作必須是**創造性**的实际工作(研究和生产的实验工作)，而不是一般体力劳动；大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对于整个經濟和他們自己都是一种損失。

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最后草案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批評意見——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革新，是过去二十五年中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它把赫魯晓夫的原来的草案改得更加反民主了，它加深了两种高級中等学校的鴻沟。让“社会組織”(党、工会等等)参与大学生的选拔工作，这并不是一种减低官僚机构的压力的办法——实际上适得其反。

教育的例子清楚地說明，官僚的专政是多么不适合人民的进步要求和苏联的經濟及社会的需要。最后实行的司法改革——在宣布要进行改革以后又过了五年才实行！——同样証实苏联人民有民主的要求，也証实官僚机构在滿足这些要求方面有其局限性。

新的刑法有了一系列的改进，这些改进和斯大林时代的“司法”相比較，确是很重要而惊人的。口供不再被认为是充分的証据；被告在他的罪行还没有得到証实以前被认为是无罪的——他无须再让他自己来証明他无罪了；类推定罪的原則被废弃了，又回复到“革命的資產階級曾写在它的旗帜上的”(《苏維埃国家与法律》，1957年第12期)民主原則，即“法律沒有明文规定的就不是罪行，

因而不受懲罰”，这一原則在以前就认为正在审查中的行为还不构成罪行；被告的答辯权大大增加了；刑罰一般都減輕了（例如徒刑不得超过五年）；等等。

另一方面，在这一“无階級社会”中，在十月革命已經过了四十一年以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废除了死刑，只是在国内战争的情形下又破例重新采用了它），对于政治罪行、“結党”（苏联的法律把不属于已經官僚主义化的共产党的任何政治組織都列入这一名詞之內）以及叛国罪行仍然保持死刑。虽然在新的刑法中沒有“人民的敌人”这种字眼，可是苏联首席檢察官魯登科就在通过这一刑法的最高苏維埃的会期里，却使用了这种字眼。

所有这些都使我們得出这一結論：虽然现在在苏联确实出现了某种“改革的”趋势，可是，由于一些政治要求将动摇官僚专政的根基，由于人們将直截了当地准备进行政治革命，这种趋势迟早将会停止。

在这种过渡阶段，很有必要制定一种适合于苏联具体情况的**最低綱領**；这是一种在各个公共生活方面都要大力地实行民主化和平等化的綱領；这种綱領在客观上将和过渡时期的綱領起完全相同的作用：使苏联工人凭靠他們自己的經驗能够感觉到他們必須有組織地和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以便重新建立和扩展苏維埃民主，使之达到一种苏联的締造者只是在梦中才能想到的水平。

1959年1月15日

## 十七、苏联农业的新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

“在农业問題上我們已經面临一个死胡同。”

——1958年1月1日赫魯曉夫对  
《泰晤士报》記者的談話

### 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

1958年1月22日，赫魯曉夫在他的明斯克演說中宣布了一項改革苏联农业的全新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从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观点来看，只要我們記住本段的格言式的小标题：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結論，那我們对这一改革的实际价值是不难正确理解的。因为，有多少表现工业和文化（尽管在經濟和国家事务方面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处处起着阻碍的作用）迅速发展的統計数字，就有多少收支平衡表，表明四十年来苏联的农业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失敗。

我們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証明这一严厉的論断嗎？1913年沙皇的俄国一共生产了八千万吨粮食；1950年，人口已增加了20%，而粮食总产量仅只有八千四百万吨。1954年，粮食总产量仍低于九千万吨，也就是說按人口計算的产量比1913年还要低一些！

在 1913 年的时候，俄国的牲畜中共有牛六千一百万头；1953 年，人口增加了 20% 以上，而牛却只有六千七百万头。甚至到了 1956 年，牛类的牲畜也还只有七千零四十万头，按人口计算，每人所能吃到的牛肉比沙皇统治时期还要少一些。

赫鲁晓夫发动了一个开发生荒地的巨大的运动；播种面积扩大了三千五百万公顷，动员人数超过了一百多万，拖拉机增加了几十万台。而粮食的产量，在 1957 年，也不过只达到一亿零五百万吨，也就是说，和 1955 年的数字相等（1956 年看来是比较特殊的）。正像第一书记自己在他的明斯克演说中所讲到的，1954 年到 1957 年的平均产量，比 1950 年到 1953 年的平均产量只不过高出 27%。而 1950 年到 1953 年的平均产量和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的平均产量是大致相等的。那也就是说，尽管开动了巨大的机器，谷物生产的增加也只不过略等于苏联人口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增加的数字，人口的增加也恰恰是 27%。

农业停滞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很难找到的。现任的苏联农业部长馬斯基叶維奇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美国劳工平均一个工人管理五十公顷可耕地。这个材料在苏联发表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惊（见 1957 年第十一期《十月》的评论）。这是因为在苏联，尽管每五十公顷土地使用劳工（男女都有）十人（根据列姆奇諾夫在 1955 年第四期《计划经济》里所作的估计，并根据访欧经济代表团的报告：《1956 年欧洲经济情况研究》第 1 章第 32 页），而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却仍然非常严重。因此苏联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美国的相比差不多要低十倍，我们这样说还是假定两个国家的亩产量是完全相等的，但实际情况还并非如此。

劳工生产能力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拒绝努力生产，苏联农民的这种做法便是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罪恶行为的回答。农民

参加集体化并不是由于看到集体农庄可以有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收入而自愿登记，都是在忍受巨大的物质牺牲的条件下被迫参加的。农民的报复心理简直可以说是二十五年来苏联历史上的一种灾祸。斯大林时期的价格政策只使得农民的这种态度表现得更为坚决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能看成单纯是心理上的反感。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从他们那点一般不超过十分之四公顷的少得可怜的自留地上所获得的收入，相对来说，远远超过了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即使从绝对数值上来讲，他们从那一点私有的土地上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的收入，也常常和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收入相等，或甚至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农民——他们既不是和斯大林或赫鲁晓夫一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强拥护者，也不是对于合作化的财产具有神秘的无限热爱的利他主义者——始终尽一切努力尽量减少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劳动，难道这还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吗？

在斯大林死去的时候，这死胡同的局面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一世界第二工业国甚至连本国人民每日所需的面包都无法保证，至于黄油和肉就更不用提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全都想出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他们开始大大地提高了集体农庄强迫交售或自愿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价格。他们帮助发展私人和集体农庄的畜牧业。他们降低了集体农庄庄员私人收入的所得税率。他们同时设法强迫农民更多地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并以不能完成最低限量的劳动日便将收回自留地的规定作为一种威胁（见1956年3月10号公布的条例）。他们试图以在亚洲的蛮荒地上发展国营农场形式的巨大“粮食工厂”的办法以“绕过农民”。而所有这些办法所取得的结果似乎都是和他们所花费的精

力不相适应的。

虽然某些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会相信赫鲁晓夫所作的努力始终都籠罩着胜利的灵光，可是精心閱讀过这些年来談論这一熱鬧問題的报纸的人，对这一問題只会有一种极不肯定的印象。1951年便不再听到有人提起的那个著名的“农业市鎮”的計劃在这里就不用提了，“玉米运动”仿佛也沒有能够引起专家們的持久的热情。开垦生荒地现在也不像两年以前一样被看做是万灵药方了；1957年的歉收和生荒地的开垦是多少有些关系的，至于赫鲁晓夫1954年大声疾呼推行的棉花种植計劃，最后也遭到了悲惨的失敗。1957年烏茲別克斯坦的原棉的产量只达到二百七十五万吨，而根据第六个五年計劃，預計这一共和国1958年的产量应为四百二十万吨，这一指标比原来的計劃还减少了三百万吨（这原是为1955年定下的指标）。

### 农业机械站在苏联經濟 和农业中的作用

国营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站在很长一段时間中，一直担任着三种任务。这些机器站是巨大农业生产資料的所有者，它們是未經国有化的农业和国家經濟之間的主要桥梁。由于它們对拖拉机的垄断，用于农业的拖拉机始終处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之外。同时它們可以保証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产品，因为它們在协助集体农庄工作后可以得到实物报酬。最后它們还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政治統治的工具，它們既代表工人又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和名副其实的农民处于相对的地位。

毫无疑问斯大林根据过去的經驗分派給机器站的这些任务所造成的浪費和損失并不是很小的。1950年1月19日的《真理报》

告訴我們，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庫爾斯克地區，農業機器站的拖拉機一般總有 30% 是閑着的。在蘇聯發起一個運動大力推行赫魯曉夫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時候，各報紙又提出了一些更易令人信服的數字。許多農業機器站必須同時兼顧幾個集體農莊，這就必然打亂了田地裏的工作計劃。常常在收穫期最需要拖拉機的時候，集體農莊却找不到供它們使用的拖拉機，這就造成了收穫的推遲和生產上的損失。

據上面曾經引用過的《十月》上的那篇文章報導，在許多農業機器站里，拖拉機是被“收藏”（如果這也可以叫收藏的話）在露天地里，一年中有十個月是放在大雨大雪里任其迅速磨損；這種“技術上的修正”——啊，神聖化的官僚機構：——事實上只是到了收穫的前夕才制訂出來的。國營農業機器站是一個運轉極不靈活的官僚主義機器，由於它們要求農莊以實物做報酬，它們對於谷物的生產價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根據赫魯曉夫的明斯克講話，通過這種辦法取得的麥子比國家從集體農莊取得的麥子要貴 80%，比從國營農場取得的麥子要貴 150%。

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有人一再提出建議要把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直接轉交給集體農莊。我們知道斯大林在他的最後的一本書（《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曾和兩位經濟學家，沙尼納和萬格爾，爭論過這個問題。我們曾經一再引用過的伊凡·費尼琴科在《十月》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曾經說明萬格爾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文章記述了作者和萬格爾的一段非常有趣的談話，從他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位理論家真正是狂熱地相信，為了增加生產，就必須“提高農民的物质利益”這一原則。毫無疑問，其他一些專門研究農業問題的技术專家和經濟學家也和萬格爾一樣對這個問題提出過自己的有系統的看法。

但是有趣的是提出应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这种意见的，还并不只是一些理论家。德国南部资本家的重要机关报《德意志新闻和经济新闻》在1958年1月1日的一期上报道说，苏联科学院的农业专家们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据说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一次盛大的招待会上，庫班著名的非常富有的“俄罗斯”集体农庄的主席李斯金，曾对赫鲁晓夫讲过这样的话：

那么，尼基塔·谢尔盖维奇，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为我们的集体农庄提供劳动工具的国营农业机器站卖给我〔！〕呢？我〔！〕可以付给你一千五百万卢布。好好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维奇；到明年我就不会出那么大的价钱了。

事实上，在这件事发生了几个月之后，李斯金就任命自己〔！〕为前面谈到的那个农业机器站的站长，而很快克里姆林宫也就对他的这种作法表示同意了。

### 明斯克讲话的前提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决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有许多迹象表明，其他一些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也都和李斯金一样能够独断独行。

从1957年年初开始，弗果尼奇国营农业机器站（在布里昂斯克地区）似乎曾把它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交给“列宁之路”集体农庄使用了整整一年（见1958年1月9日《农业经济》）。1957年10月在《十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表明许多集体农庄（特别是莫斯科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集体农庄和基洛夫区的“边区十月”集体农庄）都已经买下了大批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57年12月10日的《真理报》和1957年8月16日的《东方真理报》都曾报道说，在其它许多地区，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已经联合组

成了国营农場。而上面已經引用过的費尼琴科的那篇文章更列举了这一改革的几种不同的形式，而这种改革在苏联的許多地区已經都开始推行了。这篇文章同时还指出比方像在敖德薩地区，最富有的集体农庄已經占有了比国营农业机器站数量更大、质量更好的拖拉机队；而它並沒有說明这些集体农庄是如何获得根据法律和种种特殊规定一律禁止买卖的这些生产資料的！

似乎可以肯定地說，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官僚机构和一些农业經济学和政治經济学的专家們在那里进行关于改革的討論和实验，一方面国内許多地区的最富有的集体农庄掀起了一个“自发的”获得农业机械的运动。明斯克讲话，远远不能算作是发起一个运动的序幕，倒仿佛是給这一运动作出总结。在这篇讲话中所用的詞句（“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主人”）实际上是从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和“改良主义”的經济学家們的报告中，一字不易地搬用过来的，对他們的讲话，費尼琴科曾有过詳細的报道。

另外，我們必須注意到，这些“改良主义者”，对于作出一般的結論的問題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他們一般总只限于主张“取消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之間的双重领导，”或者大力提倡“把拖拉机完全交給集体农庄。”至于所有权問題，他們一般都避而不談；那些提出这一問題的人們也大都采取吞吞吐吐的方式：他們說，要让集体农庄事实上可以任意使用这些劳动工具，“也并不一定需要”讓他們具有拖拉机的所有权。一位冒失的作家甚至肯定地說：“既然国家可以把几百万噶的土地交托給集体农庄，那又为什么不能把拖拉机交托給它們呢？”特別是在尼基塔·赫魯晓夫，完全不顧理論上的考虑，在只需要使用权就足够解决問題的地方，却还要賦予所有权的时候，提出這個問題也真算是冒失吧。明天，关于土地

本身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問題……

### 改革的目的：提高生产和生产率

有些人对于改革所牵涉到的对农民阶级让步的問題表示怀疑。1958年3月5日，維克多·佐尔薩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評論，他甚至說，这次改革可能“将結束赫魯晓夫和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他以拖拉机的卖价作为根据，肯定国营农业机器站的取消将会使赫魯晓夫受到很大的損害。对于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还要談到。但是在这里讓我們明确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談論這個問題，实际上是忽略了构成这次改革的具体条件：那就是，赫魯晓夫所作的努力是要提高苏联农业的生产和生产率，或者，像他自己常爱用的一种說法，“要在按人口計算的奶类和肉类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如果我們相信，在开发生荒地的运动遭到部分失败以后，他还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我們显然是在相信一种绝对不可能的事。

克里姆林宫力求增加生产和收益的愿望是不容怀疑的。赫魯晓夫在他的論文中引用列宁的公式：“为面包而斗争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那显然决不是偶然的。可是，正像经济学家万格尔对費尼琴科說过的，“农民是会計算的”（见《十月》，1957年第11期），这一点也同样是不用怀疑的。他們很清楚从国营农业机器站租用拖拉机，每年需要花費多少租金。如果现在出售拖拉机的价格很高，結果使他們的生产成本不是降低，反而增高了，那么赫魯晓夫的改革就只会导致生产停滞，而不是使生产提高。因此問題并不在这里。

万格尔坚持說，农民們自己会算賬，他的話当然是对的。尽量以真正的、并非任意确定的价格作为基础来建立城市和农村、国家

和集体农庄的交换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有助于使苏联农业最后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改革措施,就其更广泛的作用来讲,显然是进步的。可是这种需要较长时间的纳入的过程和这一改革目前引起的直接反响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一点却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过去的。不管怎样,如果要判断改革的具体效用,我们就必须以这些反响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必须研究一下这一改革的特殊形式。要估计这次改革将使计划经济遭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就必须以今天的现实,而不是以对未来的展望,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至少,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貌,我们必须对它所产生的动力作一番分析,那也就是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出现的经济上的变化。

所谓今天的现实,首先就是,农业生产一直未能,现在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根本的问题,并不像某些大胆的评论家所提出的,“在卖价上施加压力”,也就是,拒绝购买“价钱过高的”生产品。十年之后,毫无疑问,人们将可以这样作,可是明年还不行,再过两年也还不行。

所谓今天的现实,其次是,看看目前积累资金的速度,目前这种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它必然产生的庞大的完全不必要的管理费用,再加上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军备竞赛,我们可以肯定说,国家决不可能以相当低的价格对农村供应足够的消费品和“小”生产资料(特别是建筑材料),以求在农民的作风上引起真正的革命。一个农民只要他有一天可以看出,如果使集体农庄的生产增加一倍,他就可以肯定在三年内弄到一所小石头房子,或者在两年内弄到一辆车子,那他就肯定会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可是对三千万农民家庭来说,那一天还遥远得很。

今天的现实的最后一点,是集体农庄彼此之间和各个集体农

庄內部出現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赫魯曉夫在他的明斯克講話中曾舉出莫希萊夫區的“情報局”集體農莊作為例子說，這一農莊的生產比該區的平均產量高出五倍，而比全省的平均產量要高出六倍。根據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想像，這一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也一定相應地要比這一區域的農莊莊員的平均收入高得多。赫魯曉夫對於魯山利亞的“曙光”集體農莊的主席沃爾洛夫斯基大加贊揚，因為他是這次改革的“倡議者”之一。（見1957年第十二期《十月》所載一文。）現在這裡的問題是，全國中最富有的一个集體農莊，共占有九千公頃可耕地（蘇聯全國集體農莊擁有土地的平均數只是一千公頃或者稍多一些），而它在一年之內却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一千七百萬盧布（蘇聯集體農莊的平均收入是三十五萬盧布）。至於莫斯科區的“高爾基”集體農莊，或庫班區的“俄羅斯”集體農莊，一如敖德薩地區的“布瓊尼”集體農莊一樣，在那裡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具有特權的特殊分子，他們是集體農莊莊員中的“富農”。他們由於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流動資金，可以隨時買下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農業機器。

### 生產工具又一次變成了商品

可是另一方面還有四萬中小集體農莊，它們的耕種面積大約平均七百五十公頃，每年的生產和收入常常不到富裕集體農莊的20%，或甚至10%，對它們來說，要自己買下拖拉機那就必然是個非常沉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負擔。中央委員會已經通過的決議，容許這些集體農莊，在一個過渡時期中仍繼續從國營農業機器站租用拖拉機，他們同時還看到將來可能必須供給他們一些低利率的貸款。可是，在整個這一段時期內，富有的和貧窮的集體農莊之間的不平等現象肯定將會更趨嚴重。

除此之外，这里还必然会产生新的司法上的問題。如果拖拉机已經变成了集体农庄的财产，那它們是不是有权把自己的拖拉机轉租出去呢？特別是在它們依靠自己的正常生产已經通过折旧把机器的全部买价报銷，因而可以以較低的租价出租这些拖拉机的时候，它們是不是一定会极願意这样作以求得到一些額外的收入呢？等到折旧全部完成以后，这些拖拉机将“不再有任何价值”，那它們难道会不願意把那些机器卖给附近較穷的集体农庄？反正不管卖什么价錢，它們都可以得到一笔“純利”。

我們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是不是已經預见到这种变化的可能，采取了預防的措施。看来赫魯晓夫最主要的是要依靠各集体农庄的主席，在打破农业生产的停滯现象的同时，更大力防止这种傾向。毫無疑問，近些年来差不多所有集体农庄，或至少絕大部分的农庄主席都是党员，他們大都是来自城市，由他們“从内部”来控制农民肯定比国营农业机器站“从外部”来控制要有效得多。可是我們要完全相信这些主席都有舍己为人的精神，那恐怕显然是要落空的。赫魯晓夫对于国营农业机器站大大妨碍农业生产的官僚主义作风談得非常多。可是他忘了，在大队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轉移到集体农庄去以后，即使管理这些机器的不再是从前国营农业机器站里的那一批人，而是将机器交到一批新的管理人員、會計人員和工作人員的手中，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也会跟着完全轉移过去。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现在共同采用的那种著名的下放經濟管理权的政策，其結果就完全是这样：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轉移到各个地方去，而它对經濟的压力和危害也絲毫並沒有减少。

集体农庄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发展成比例的。克拉斯諾达尔区的共产党書記曾經在 1958 年 1 月 7 日的

《农业經濟》上告訴我們，某某集体农庄的間接(非生产)开支現在已經比直接开支还要更大一些，某某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領導每月自己分到的一部分收入，要比一个最好的农民高出五六倍之多。这些材料如果拿来和 1951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納薩尔澤夫的一本书(《集体农庄的工作单位》)互相印証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这种傾向在苏联农业中是很长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最近，“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分子們在莫斯科举行會議，他們所談到的开支庞大的情况已經使得莫斯科大为震惊。

如果集体农庄的最上层一直像一个特权的阶层随时維護着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那我們真看不出他們为什么会拒絕利用赫魯晓夫賦予他們的財產权以从中取利。一点不錯，苏联的农民今天已經不像在二十年代末期一样，对社会具有举足重輕的作用。因而赫魯晓夫的改革方案現在可能遇到的风险肯定要比那个时期小得多。

但尽管如此，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所有权轉移給集体农庄，仍然肯定是在国家对巨型生产資料所有权的垄断方面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在整个生产資料的領域中就必然会出现**商品关系**。汽油和机器零件也一定必須在市場上出卖。可是使生产資料变成了商品，那么生产資料就必然得服从市場法則。如果国家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速度太快，那就会在这个領域中出现生产过剩的威胁，因而迫使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出卖那些机器(也就是以牺牲工业的办法来扶助农业)，要不然国家就必須減緩工业化的速度和降低农村的生产<sup>①</sup>。另一方面，如果拖拉机

---

① 赫魯晓夫在他的报告中显然已經看到这种情况，他写道：“許多机器厂現在在生产着质量很坏、在农业上不能很好地利用的机器，这些机器全都[在国营农业机器站里]閑置着，許多年也沒有拿来使用，最后显然都要变成废鉄了，在新的情况下，这些工

的生产量的增长仍然赶不上需要，那么那些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的集体农庄则将有可能抬高价格，从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中再把那些机器买回来（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看到可以从中得到一份额外的收益，也会很愿意这样作），这样把超过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們再說一遍：这种作法，如果在二三十年前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危险，而今天这种危险性已经不是那么大，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已经比从前更为强有力和富有得多，它能够很容易地调整不同等级的价格、工资和货币，借以限制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市场”的这种自发的倾向。

可是不管谁只要一提到“市场”，就一定也会提到“自发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这种倾向在它已经被根除的这一领域中又开始抬头了。附带说一句，正是这种情况给斯大林的在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这种情况也使得那些已经遗忘的人现在又重新想起来，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它现在还远远没有能够克服过渡时期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是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产生的矛盾全然无关的。

### 这一改革在反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

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 1952 年是四百二十亿，到 1956 年增加到了九百四十六亿。在这五年中这样分散出去的多余的购买力毫无疑问估计总在一千五百亿卢布以上。这一部分购买力中有相当

---

厂就会看到情况完全变了。集体农庄将不会愿意购买它们的产品，那么这些工厂就必然得尽快改进它们生产的农业机器。”

大的一部分将会用来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建筑材料。可是仍有数量不小的一部分购买力在社会上存在。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拿出生产工具来作为交换，把这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全部吸收过来。

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曾说拖拉机的卖价将比生产成本“略高一些”。但是他的这种曾经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大感兴趣的算计，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另有他自己的算计。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为了使用拖拉机必须付出一定数目的代价；如果一架拖拉机的使用年限我们假定它是十年，那么，如果拖拉机的卖价少于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付出的租金的十倍，那他们就会感到买下拖拉机是一件合算的买卖，这一点他们是决不会弄错的。

不管怎样，赫鲁晓夫肯定说，在经过他的改革之后，国家能够得到的麦子，将比通过国营农业机器站收取租金所得到的，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他凭什么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在他的明斯克讲话中，他解释说，由于拖拉机转入集体农庄的手中，麦子的生产成本就必然会降低，那么国家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得到这些产品。他忘了，直到现在为止，国营农业机器站在把机器租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时候，是要农民以实物支付租金的。可是出卖拖拉机所得到的将只能是货币。在这以前，国家和城市可以从集体农庄生产的任何数量的增长中直接得到利益，因为集体农庄付给国营农业机器站的租金是按照固定的生产总量的百分比支付的。如果把拖拉机卖给了集体农庄，那么国家和城市就只能从农业增产中获得间接的利益，那也就是，可供交换的物资数量会更大一些，价格也可能更低一些，而这些正是改革所预期的目的。因此，赫鲁晓夫的这个改革计划，事实上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农业的增产，希望这

种增产的速度能够使国家降低向集体农庄收购麦子的价格，而不会因为麦价的下降引起生产的停滞和新的粮食不足的危机。

他的这种愿望是否全然荒诞无稽呢？我们还不这样说。以现在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情况来看，苏联农业共拥有一百七十万台拖拉机和四十五万台联合收割机，为了迅速增加生产，可供挖掘的潜力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这些潜力，只有在农民感到有足够的刺激使他愿意在生产上加倍努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发动起来。这关系到耐久和半耐久的消费物资（和建筑材料）的卖价问题。说一句听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话，赫鲁晓夫的打算能否获得成功，其有赖于农业的程度至少和有赖于工业的程度是完全相等的。整个这一套增加农业产品的商业性的政策，只有在有愈来愈多的工业消费品流入农村，借以换取愈来愈多的麦子流入城市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流入农村的消费品的数量不足，或甚至完全停顿，那么唯一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办法，就只可能是像斯大林时期一样，由国家采取专断的措施。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万格尔的那句说得很有趣的话：“农民是会计算的。”这种专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会是农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在城市里将缺乏质量较好的商品粮食。

此外，很有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也考虑到了集体农庄**希望得到商品的愿望**（不管集体农庄官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农庄成员的愿望是什么）。他建议在每一个区（在每一个州）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同国营农业机器站商讨购买机器的价格问题，并建议把决定出卖机器的数量问题也交由这一类的委员会去考虑。这就是一个对农民阶级和集体农庄官僚机构**增加权力的要求**大大让步的问题。这种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前就已经提出的集体农庄实行自治和自行管理的要求实在具有无比巨大的重要性。其总的

傾向是要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生活上形成社会差异(《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和《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两文<sup>①</sup>都曾強調指出这一傾向)。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有些人相信国家的(多少帶有“恐怖性质”的)力量已足以消除赫魯晓夫的改革方案可能遇到的风险，实际是如何的錯誤。自从新經濟政策取消以后，克里姆林宮现在是第一次面临一种最純粹的，也就是商业形式的农民問題。只有在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不会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不利于农民和不打击他們的生产热情的时候，这种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 合作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赫魯晓夫对待斯大林在他最后的一部作品中所提出的“理論性的警告”采取那样一种完全漠視的态度，决不只是使得西方的观察家們觉得茫然的。这位第一書記自己，在他准备提交最高苏維埃的“报告”中，也認識到，“某些同志”始終坚持反对把生产資料卖给集体农庄。他的回答所采用的“辯証”的形式是和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的：恰恰就是因为〔！〕国家所有制同合作社所有制比較起来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所以就必須首先加强〔！〕合作社所有制，以便将来并入国家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更精确地說：国家所有制(笔者)〕是社会主义經濟的最高形式，而集体农庄所有制只代表社会主义經濟較低的形式。因此现在的問題是如何逐渐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以使最后达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使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得到加强〔！〕和逐步的全面的發展〔！〕(赫魯晓夫在最

<sup>①</sup> 这两个文件已譯載于《托派第四国际資料》第一輯。——編者

高蘇維埃會議上報告的提綱。)

不管從形式邏輯還是從辯證邏輯的觀點來看，這一“提綱”所包含的錯誤簡直和它所用的字數相等。國家所有制並不是社會所有制的最高形式，而是它的最原始的形式。集體農莊所有制根本不是什麼社會所有制的形式，而只是從個人所有制變成社會所有制的一種過渡形式。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完全消滅財產所有權的最後形式將不是什麼“集體農莊所有制將會併入的國家所有制”，而是按照其歷史意義的合作社所有制，是恩格斯所說的，屬於“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組成的自由公社”的所有制。

某些“理論家”甚至比他們的主人還更為大膽，他們竟毫不猶豫地把明天的這種“公社”和今天的集體農莊混為一談：沃爾洛夫斯基在我們上面已經引用過的發表在《十月》（1957年第十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是這樣作的。這種比喻完全是荒唐可笑的。恩格斯所談到的“公社”將不只是一個“農業”公社，而是一個社會集體，在這裡城鄉差別已經不復存在，在這裡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已經進入了逐漸消失的過程。拿這種明天的共產主義的理想來同今天蘇聯的才剛剛計劃修建第一個劇院的最富有的集體農莊相提並論，是在蘇聯人民的眼中污辱了共產主義。

從現實的意義來講——在這方面赫魯曉夫是對的——他的意思是，與其空談“集體農莊的逐步消亡”，不如設法保證蘇聯工人的麵包、牛奶和肉類的需要。如果為了這個目的，就必需把拖拉機賣給集體農莊，那無可懷疑顯然是一種無法逃避的讓步。可是為了在這種形式下提出他的論點，他就必然不得不承認，不但說不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現在離開階級的消滅，離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還遙遠得很。

一點不錯，沃爾洛夫斯基曾經談到從雙方面來增強集體農莊

所有制，即牺牲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和牺牲集体农庄的私有财产。在明斯克讲话中，实际也有类似的论调，不过是以一种更为谨慎的形式提出来罢了。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对自留地增加压力的迹象，而且赫魯晓夫和沃尔洛夫斯基都提出过希望农民“自願放弃”他們私养的牲畜問題。赫魯晓夫引用他自己的家乡，卡林諾夫卡村的一个例子，說明农村妇女所需要的是牛奶，不是奶牛；如果集体农庄能够保証她們在参加較少的劳动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牛奶，那她們又为什么会拒絕交出自己的奶牛呢？沃尔洛夫斯基甚至描繪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的图景，集体农庄对它們的庄員說：“你需要粮食、蔬菜、水果嗎？去拿吧，你可以要多少拿多少。”

这幅图景是挑选得很好的，它事实上表明了在农村从心理上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的思想）的道路：现在需要作的只是进行实际的体驗，养成富裕生活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习惯以便保証它們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消灭。

可是如果我們把这种图景和赫魯晓夫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它們彼此之間是沒有关系的。这种改革并不是朝共产主义分配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而是朝着农村生活进一步商业化的方向后退了一步。如果有誰相信我們能够同时朝着商业化的方面改变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关系，而又能够（且不說真正消灭）渐渐减少集体农庄庄員独自发家致富的愿望，那实际就是否认一切經濟法則。如果集体农庄可以按照市場竞争的价格（这是赫魯晓夫的新的理想）把麦子卖给国家，那么“按需分配”的原則对它就不能实用。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农民都会有兴趣創造一条通往城市的小小的商业通道，因为城市对于奶类和肉类食品仍然还有很大的胃口。因而赫魯晓夫的目的在于掩盖改革的后退性质的

辯証論調，由于沒有說明为什么必須作好准备以便对付这种后退将产生的危險，就显得含有更大的危險性。

我們很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会因为赫魯晓夫对农村让步而感到恐惧：苏联的无产阶级和第一書記自己一样，更关心的是面包、黄油和肉类，而对于向社会主义（还不要說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辯証法則是并不那么关心的。可是年輕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一让步所引起的理論上的問題，是决不会完全漠不关心的。这一改革所引起的新的討論的浪潮，一定会在工人阶级的先鋒队中，半公开半秘密地繼續下去，一直到形成一种政治生活的新生。从拖拉机所有权的轉移到計划化經濟的問題，从“向共产主义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的問題——所有这些由苏联今天的现实提出的問題，都将进一步使官僚主义統治集团已經钻进去的死胡同更完全失去出路。尽量闡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失敗的原因；闡明在一个較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工农联盟的必要；闡明重新組織以城市和农村的消費需要为基础的計划經濟的必要——这就是先鋒队的思想意識應該采取的道路，这样他們就会得到一个无法逃避的結論：为了使苏联經濟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能完全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就必須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来重建苏联的民主！

1958年3月20日

（譯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8年春季号）

## 十八、赫魯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机构已经四次改革他们的农业政策。第一次改革——由馬林科夫提出——是在1953年9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宣布的；第二次（赫魯晓夫的第一次改革）决定于1955年；第三次是1958年1月22日赫魯晓夫在明斯克的讲话的直接结果；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的改革，则是1961年1月10日到18日，经过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辩论之后决定下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新的改革？这是因为苏联农业，在经过前几次的改革之后，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就，但总的发展的速度仍然很不够。第六个五年计划所决定的指标（在哪个部门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下面的数字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95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为1960年所定指标	1960年实际生产量
谷物收获量	180,000,000 吨	133,000,000 吨
牲畜	13,000,000 吨	8,700,000 吨
羊毛	465,000 吨	355,000 吨
蛋类	45,800,000,000 个	26,400,000,000 个

这里的差距显然是相当大的，按其平均数来讲，农业生产量比1955年的计划低了25%，比1959年至1960年所定指标还要低15%。由于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增长比拟定计划的人所预见的要快

得多(特别是在肉类、黄油、牛奶、谷物和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方面),苏联农业的缓慢的发展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安和政治紧张情绪的永远存在的根源。

苏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比方像火箭的发射和加加林的壮举——丝毫也并没有减缓这种紧张的程度,虽然,这些成就无疑增强了苏联社会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可以拒绝在社会制度方面作任何改变)。相反的,和这些成就比较起来,人民所需的粮食的缺乏以及其他农产品的缺乏,越来越变成了经常为大家所指责的目标。针对着这种情况,苏联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残酷的以警察为依靠的独裁政治,使这种农业政策方面的缺点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群众和统治集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因而使得政府,在看到生产指标显然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就不得不经常改变他们的农业政策。

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苏联的最大的一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主席波里扬斯基承认“对人民粮食供应(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令人不满的情况,在许多城市和市镇中都是存在的”。(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1961年1月17日,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一次报告中,也承认农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国的农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农业的发展速度没有工业发展的速度那么快,可以说,它赶不上我们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的迅速增长的需要……虽然,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我们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它与人民业已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见1961年1月21日《真理报》。)

1960年，赫魯曉夫肯定地說，蘇聯薪金人員（包括年老退休的在內）的收入將比1955年增加二千四百二十億盧布。同時，在1953和1959年之間，按照人數計算的食物消費量已經頗有增加，肉類增加了42%，黃油35%，牛奶和奶製品74%。以這個數字為基礎來計算，那麼蘇聯人民按人口比例的肉類消耗量比美國要低50%。因此要在按人口比例的肉類消耗量方面趕上或超過美國，顯然不是短期能作到的事，在農業產品的質量方面也是如此。

### 集體農莊供應城市的糧食愈來愈少了

斯大林死後由馬林科夫推行的第一次農業改革，由於集體農莊對國家提供農產品能夠增加本身的收入，一般集體農莊的產量的確有所增高。第二次改革——由赫魯曉夫直接負責推行的第一次改革——發動了對大量生荒地的開發。我們在本刊的前一期曾經解釋過這種生荒地的開發工作，完全是由國營農場擔任的。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取消對集體農莊（由農民組成的集體組織）生產的依賴，自行解決城市糧食供應問題，也就是說要借此降低農民的地位以方便於把他們爭取過來。

第三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把農業機器、拖拉機和其他形式的國家財產賣給集體農莊，目的是要借此刺激集體農莊的生產，因為國營農場開發生荒地的生產情況，看來波動太大，不可能變成城市糧食供應的可靠基礎。

1961年中央委員會的“農業會議”所決定的第四次改革又是什麼樣的性質呢？和前面的三次改革不同，第四次改革是不容易用幾句話來概括的。主要的步驟特別是為了：

1) 改善對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的供應並通過“農業機器維修和出售聯合會”的建立來減少對農業機器的損害，這種聯合會將有權管

理和調整农业机器的需求和供应,并对这种机器的生产、重新分配和在整个苏联境內的調度直接負責;

2) 重新改变国家向集体农庄收购产品的办法,由集体农庄作为一方,巡迴視察員作为另一方,事先簽訂合同;

3) 通知国家合作社拒絕购买集体农庄剩余的产品,特别是庄員私人的剩余产品,借以窒息私人农业市場的发展;

4) 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集体农庄官僚机构或个体农民騙取、偷窃和侵吞集体农庄的财产。

这一改革是否还包括第五种因素,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是,国家对待富有的集体农庄所兴办的商业和工业究应采取什么态度,因为这种企业实际是对农民进行剝削的一种形式。中央委员会在辯論后提出的报告,对这个問題并没有作出答复,虽然某些意义上的不一致似乎曾引起爭論,而爭論的内容却一直严守秘密的。可是不管怎样,我們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一定会有某种新的決議的。

要了解进行这次新的改革的理由,我們必須更仔細地研究一下1961年1月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的收支平衡表。很显然,尽管1958年曾經采取了种种措施,这一制度中的两个重大缺点却依然存在。集体农庄的生产停滞不前,“生荒地”的生产,根据中亚細亚的气候情况的不同,經常发生极大的波动。

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在进行辯論时所提出的某些集体农庄的生产数字的确是非常惊人的。赫魯晓夫的結束报告,以及他針对这一決議所作的演說,都表明从1953到1960年,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从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五十万吨。可是,在上面已經引用过的一篇演說中,波里揚斯基指出,“仅只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生荒地,1960年卖给国家的谷物就在一千六百三十万

吨以上。”(见 1961 年 1 月 12 日《真理报》。)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1960 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比 1953 年危机时期还要更低一些。赫鲁晓夫很不愿意引证全部的事实,可是他所引用的数字也已经足够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了。在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十三个在 1960 年提供的谷物少于 1953 年,而第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完全没有“生荒地”的地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完全相同。在这十三个共和国中,足足有七个共和国(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塔吉斯坦、阿尔明尼亚、土克明尼亚和爱沙尼亚)连一颗麦子也没有卖给国家,而 1953 年,它们提供的粮食差不多将近五十万吨。

乌克兰 1953 年提供的麦子差不多等于整个苏联卖给城市人口的总数量的三分之一,而 1960 年乌克兰卖给国家的粮食却从 1953 年的九百万吨降到了五百八十万吨;苏联的谷仓所存的粮食几乎不能满足苏联人民需要的 15%。至于白俄罗斯共和国对国家提供粮食的数量,如果以 1953 年的水平作为基础,减少了 50%,如果以 1950 年为基础,则减少了 65%。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如果把“生荒地”卖给国家的粮食数量计算在内,1960 年提供的数量也比 1953 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吨。

赫鲁晓夫在某一次报告上曾经明确指出,“生荒地”的生产的总数几乎超过了国家所掌握的粮食总量的 40% 以上,从这里我们可以估计到,和 1953 年相比起来,其他一些农业区对国家供应的粮食数量差不多减少了六百万吨。

赫鲁晓夫引用的某些数字,使我们想到一种一般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乌克兰向国家出售谷物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8 年,一千万吨; 1949 年,八百七十万吨; 1953 年,九百万吨; 1958 年,九百万吨; 1959 年,七百四十万吨; 1960 年,五百八十

万吨。

在某些地区，特别像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西部地区，大量缺粮的情况是很显著的，那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供应这些地区的粮食，比它从这些地区所取得的还要多得多。1960年，仅是白俄罗斯共和国缺少的粮食就差不多是三十万吨，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西部地区缺少的粮食则将近六十万吨。

### “生荒地”的試驗結果如何尙不得而知

尽管在“农业會議”上赫魯晓夫和其他一些发言人不停地吹嘘在西伯利亚和哈薩克斯坦开发“生荒地”已获得何种成就，根据偶尔透露的某些事实，我們仍可以看到这一試驗至今还没有得出肯定的結論。赫魯晓夫自己也認識到他們不可能真正严肃地坚持說，“生荒地”的开发是最后的一个解决苏联农业問題的有效办法。他在1961年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結束报告中，只作了一些大致的估計。在1954—1960的七年中，国家在这些地区所作的投資共計四千四百亿旧卢布，而在这七年中，这些地区谷物产量的总植却达到七千六百亿。这就是說一共获得了純利（这完全是第一书记的原話）三千二百亿。

可是赫魯晓夫还應該对这个問題更深入、更严肃地分析一下。他并没有能够回答下面的这个問題：如果这四千四百亿的投資被用来发展草地以繁殖牲畜，用来生产更多的农业机器，那么这笔投資所产生的利潤是不是会远远不止价值七千六百亿卢布的谷物呢？

- 他在这里还完全没有計算多少万年輕的共青团員和工人所遭受的可怕的苦难和蒙受的巨大的牺牲，他們被派去开发这些土地，簡直是在一种绝对不人道的条件下过着生活。他在这里还没有包

括由于大量开发“生荒地”引起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損害。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曾經談过可怕的“黑色的风暴”已經直接侵入了他的共和国的边区（这是从遙远的西伯利亚的田野上吹来的尘土），更不用提将来还会发生的更大的灾害了。三十年代在俄克拉荷馬出現的那个令人胆寒的巨大的“尘土网”今天正在苏联慢慢形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須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灌溉系統。哈薩克斯坦的第一書記已經在中央委員會上公开承认，按照命令應該施行灌溉的七千三百英亩土地，今年一畝也沒有完全解决灌溉問題。（見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已經开发的“生荒地”的产量数字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苏联谷物平均产量每畝略多于一千磅，对于大面积农地來說这个产量是极低的。可是在哈薩克斯坦，农业平均产量更降到每畝八百四十磅，这个数字还包括施行人工灌溉的土地的产量在內。波里揚斯基所提供的数字表明，西伯利亚“生荒地”可以希望的产量大致如此。这和苏联其他部分已經开发的土地的平均产量比較起来，差不多要低20%以上。

赫魯晓夫的总结报告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派去开发“生荒地”的年輕工人們感到不滿的問題。誰都知道这种不滿已經引起了公开的而且是頗为激烈的罢工运动，那也就是說，从“生荒地”上逃走的风气非常盛行，这已經严重地威胁到許多地区的，特别是哈薩克斯坦的收成。最近有好几本书和好些文章反映了社会輿論在这个問題上所表现的不安，可是苏联官僚統治集团的領導人却只是在談到最好“創辦季节性的地方企业，以便到了收获时期停止生产，使工人們可以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去从事农业工作”的时候，間接地談到了这一点。

这种方法較之到了收获时期派遣不習慣于农业劳动的人前去

协助收获，将更为有效得多。这话的意思是否表明此后将不再派遣共青团员去开发“生荒地”呢？

### 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官僚机构

“农业会议”的辩论有许多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之一是赫鲁晓夫对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以及对下级机构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强烈的攻击。他列举了这些领导人的种种罪状：虚报数字和虚造统计；使虚报成为合理的罪恶作风；“胜利的公报”，特别是大量屠杀小牛和小母牛以求“完成”肉类供应的指标；在市场上公开购买黄油或牛奶以求“完成”奶类生产的指标等等；不折不扣的盗窃行为。这些辩论是当着许多“专家”——农村经济学家和集体农庄主席的面进行的。这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越来来越变成了官僚机构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议会；官僚机构核心因此使自己的权力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点是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们早就料到的。

赫鲁晓夫几次打断别人发言的情况、会上的某些对话和透露的某些事实，都使人感到可悲亦复可笑。这里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赫鲁晓夫(打断乌克兰集体农庄主席特卡楚克的话)：那么乌克兰人为什么不颁布一项反对偷盗(原文如此)的法令？这可能不可能呢？(掌声)

特卡楚克：那当然是可能的。

赫鲁晓夫：而且反对私自酿酒的人和醉汉呢？(会场骚动)

特卡楚克：当然。任何人喝酒喝得太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处分(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另一个例子：

拉扎科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严厉地但是也完全正当地批评了吉尔吉斯的共产党的中央

委员会……简单地說，梁贊州委会的前第一书记伊薩耶夫，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的主席，向店鋪购买黄油轉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牛奶产量的指标，这种作法实在是一种犯罪行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經根据他的这种反党行为，决定将他开除出党，并免除他的内政部部长职务。

赫魯晓夫：你們什么时候这样作的？是在收到了我的公开信之后嗎？

拉扎科夫：是的，是在收到那封信之后。

赫魯晓夫：你們所了解的情况就只限于那封信里所提到的那些嗎？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經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魯晓夫：在那以前，你們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嗎？

拉扎科夫：我們知道，可是我們沒有十分严厉地对待他的問題。

赫魯晓夫：可是后来你們又任命他当了部长！难道你們竟认为对一个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派他当部长嗎？（会场騷动并发出笑声）

拉扎科夫：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我們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

可是赫魯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严厉地攻击了乌克兰的部长會議主席卡尔申科，他借口庄稼已經在干枯，决定在高粱和向日葵还没有成熟以前提早收割，使国家遭受到严重的損失……“而今天他仍然是我們最大的一个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的部长會議的首席代表，他看待自己的錯誤，簡直像——鴨子对自己背上的水一样完全不在意。”（见1961年6月21日《真理报》。）

尾声：卡尔申科在 1961 年 1 月被免除职务，可是不久以后他又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會議的副主席！

这些对个别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行为所作的、有时很严厉但一般都頗为圓滑的攻击，在苏联官僚机构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在斯大林时期这情况就已經很普遍；在他死后，更是屡见不鮮。赫魯晓夫的攻击和过去的那些攻击的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們所涉及的范围<sup>①</sup>，另一方面在于，攻击之后，被攻击的人并不一定会受到紀律处分。这很显然是一种古典式的寻找替罪羊的办法。此外，赫魯晓夫以攻击官僚主义为名而发出的某些攻击，事实上是針對着农民的。所以赫魯晓夫发出的一次最激动的叫喊，正是他外表上是在拜訪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內的时候。

赫魯晓夫：波德戈尔內同志，我肯定地相信，你所提出的玉米的产量，还不到实际的收获量的一半。其他那一半还在快成熟的时候就被偷掉了。

波德戈尔內：的确是这样，尼基塔·謝尔盖維奇。

赫魯晓夫：那么你能說农业减产是因为气候不好嗎？庄稼被偷掉了，可是你說产量不高是因为气候不好。实情是不是这样？

波德戈尔內：是的，一点不錯。（见 1961 年 1 月 12 日《真理报》。）

必須強調指出，波德戈尔內在作过这一番解释之后，极力想减

---

① 正如人們可以預料到的，这些攻击所涉及的范围对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工人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领导国家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在各个方面都和领导农业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是不考虑什么誠实問題的。最近《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宣称，該报每天（原文如此）都收到几千封信，揭发各工厂虛报产量的具体細节。

輕赫魯曉夫的指責可能产生的实际意义，他公开宣称說，赫魯曉夫所揭露的那些事实，对他們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們的工作更为复杂化了。可是赫魯曉夫提出的这种令人无法相信的指責，說什么“……几百万噸麦地里的庄稼有一半被人偷去”，使人对于真正的罪犯究竟是誰自然感到无可怀疑——那就是，农民群众自己。事实上，誰都很难相信，是那些官僚把需要几千几万列火車或几十万輛貨車装载的粮食全部“偷去”，运到集体农庄去了。只有农民自己有可能犯下这种大量偷窃的罪行。再說最近宣布的惩治經濟罪犯的条例更使人对这个问题感到无可怀疑：这些条例惩办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的农民，和“私人企业主”，而不是犯罪的官僚。

### 搖摆于荒歉和原始积累之間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赫魯曉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說，去年他在乌克兰休假的时候，曾經遇到一群生活愉快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从八百公里以外，差不多已經接近白俄罗斯的薩波罗希运来了一些苹果；他并且說有人甚至用飞机从远东的恰巴罗夫斯克运苹果来。

1961年5月4号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的公报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法文的《世界报》5月4号曾經轉載过的《苏俄报》所发表的一封信也曾經提到，某些冒险的个人，只要抓住适当的时机，以投机的价格私卖自己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丰盛的收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們不是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而是同时从它的**經濟根源**来看，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由于粮食供应的缺乏而**不断恢复小零售商的**問題。

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苏联官僚統治集团的农业政策，在这个問

題上，始終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究竟是盡一切努力刺激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的生計積極性，甚至把他們的自留地也包括在內——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助長原始積累時期必然出現的傾向；或者是利用種種規定和法律的限制來同私人零售商進行鬥爭——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將導致農業的減產，而使城市人口的消費品的供應愈來愈欠缺。

在 1953 和 1959 年之間，集體農莊莊員的主動性和私人利益從各个方面受到種種的鼓勵，而特別是價格政策起了最大的作用。其結果是，積累大量流動資金的情況出現了。這筆資金主要被用於購買農業機器，特別是拖拉機，以及用於購買工業生產資料和運輸器材。某些集體農莊莊員的工廠（特別是食品工業和建築工業）先後建立起來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是在同國家企業競爭。有些集體農莊的商店同農莊上的國營商店和合作社是肩並肩地開著的。

與這一發展同時，一部分個體農民發現他們依靠在“集體農莊市場”上私銷產品的收入，也有辦法聚集與此相等的大量財產，而這種市場有一個時期是得到政府當局的容許，甚至鼓勵的。

到了 1959 年反對這種傾向的活動彷彿慢慢開始了。早在 1960 年 1 月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減少自留地和強迫農民賣掉私有母牛的傾向已開始露頭了<sup>①</sup>。我們當時就曾經說過，農民對這些措施的反映必然會是農業產量的下降。1960 年的生產數字就完全証實了我們的這種預見。

我們已經詳細論述過的“貧困的集體農莊”對這種困難情況的抗議——（見 1958 年 4 月號《第四國際》所載專文<sup>②</sup>）加上集體農

① 波德戈爾內在 1961 年 1 月的中央委員會上宣稱，在烏克蘭，1960 年牛減少了一百七十萬頭，豬減少四十萬頭。

② 即本文作者所寫的《蘇聯農業的新改革》一文。——譯者

庄在工商业范围内愈来愈大胆的活动，使得政府当局不得不出面加以公开制止。在1960年整个一年中，党的领导集团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具体情况，我们根据后来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在农业组织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来看，是大致可以理解的。

1961年2月底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一个公报，规定合作社可以收买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的剩余产品，价格可以比国家规定的价格稍高一些，由消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或集体农庄庄员）“协商决定”。1961年3月18日的《真理报》讲到在克拉斯拉多尔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合作社市场”，它将代替旧的“集体农庄市场”，并比旧的市场更为优越。同天的报纸也提到粮食的供应又一次感到“不十分充足了”。

与此同时，苏联部长会议的另一公报又强调说，集体农庄有义务同国家签订交售粮食的合同，这种合同应由“巡回收购委员”和集体农庄协商决定。

这两种措施似乎具有共同的目的：通过新的官僚主义中间人的机构，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前一时期趋于分散的——农业生产的控制。可是在粮食缺乏的情况之下，官僚机构决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完全抹杀供求律的作用，如果这样作，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同时，我们有一种印象，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将采取妥协的办法，而且官僚机构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将会继续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农民肯定会认为极其可厌的那些措施之外，政府还决定降低农业机器配件的价格，决定通过“农业机器维修和出售联合会”的建立以便利对集体农庄生产工具的供应。官僚机构在这期间还采取步骤防止直接出售农业机器。这是另一个令人

不安的証明，說明集体农庄在工商业方面愈来愈大的积极性已把分散主义和原始积累带进了苏联的經濟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官僚机构一方面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間，一方面又断然采取一系列投机取巧的措施，因而决不可能解决苏联的农业問題。問題迟迟不得解决，苏联人民中的某些阶层的不滿情緒正在一天比一天增长，这就必然地打击了赫魯晓夫的威信和官僚机构自 1957 年以来享有的相对的和暫时的稳定。

1961 年 6 月 5 日

(譯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 年春、夏季合刊)